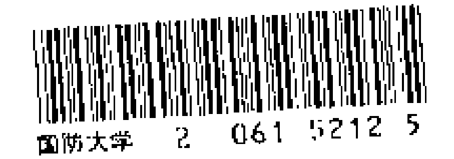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觉醒的德意志

——马丁·路德与托马斯·闵采尔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觉醒的德意志

——马丁·路德与托马斯·闵采尔

张庆海 董昱梅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觉醒的德意志

张庆海　董月梅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肇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8.25　插页:4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6 000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9.00 元　(全 32 册)358.00 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
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
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
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
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
资产阶级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
是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相反
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
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
路德就是这些巨人之一，闵采尔
也是这些巨人之一。 ……………… (242)

第一章　虔诚的教徒

15至16世纪，德意志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资本主义的幼苗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却逐渐发展起来。罗马天主教会成了德意志新兴资产阶级发家的绊脚石。

16世纪初，西欧封建制度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以英国、法国、荷兰最为突出。而德意志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它的资本主义幼苗却破土而出，向封建制度提出了挑战。

15至16世纪，德意志的工业，尤其是矿冶业和纺织业发展异常迅速。手工工场遍布于整个德意志，而其西部和南部尤为集中。在商业领域，许多城市日益繁荣起来，如南部的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等，城市中商店林立，商人在

社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在国际贸易方面，德国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地处东西欧交通的要冲，是欧洲国家商业联系的重要环节。

但是，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幼苗在刚刚破土时就遭到了强大的阻力。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国内经济的分散与政治上的分裂。德意志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且比较分散。当时，城市虽已繁荣起来，但大部分都分布在边境，而且均面向国际贸易，与国内联系较少，所以直到16世纪初，德意志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上的分散和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分裂。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表现为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诸侯割据状态，全国有7个大选侯，10几个大诸侯，200多个中小诸侯，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300多个大小不一的“国家”。

德意志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大者有数十万人，小者只有数十人，他们各霸一方，混战不休。而德意志的皇帝，仅仅是这些诸侯的老大哥而已，只是一个空洞的称号，根本无权支配这个破碎的国家。

由于国家政治上的分裂，政令不统一，致使交通梗阻，币制繁杂，关卡林立，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反过来又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德意志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关障重重，除去政治与经济上自身的原因，罗马天主教会也是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罗马天主教会不仅是一个宗教中心，而且是西欧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和剥削者，它与西欧的封建制度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这时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反动堡垒。它占有1/3西欧的地产，直接剥削广大农民，征收沉重的“什一税”，强迫农民纳租服役。此外，天主教会还经商、放贷，牟取暴利；利用宗教迷信骗取钱财，例如出售“赎罪符”和“圣物”。教会最卑鄙的聚财之道是出售神职和开设妓院。如德意志的科隆大主教被认为是肥缺，出售价格高达3万金币；而教皇每年仅从罗马城所得妓院收入竟得2万杜卡登。

罗马天主教会如此败落，但却受到落后的、黑暗的封建农奴制所保护。因此，罗马教会极力维护、万般美化农奴制度，对经济、社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采取扼杀态度，“给

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进而成为西欧封建的卫道士、保护神。

罗马教会作为西欧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将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无所不及。它不仅垄断了西欧的文化，而且残酷迫害异教士。西欧当时的学校和人们的精神生活被其牢牢握在手中。教会把社会各个方面都罩上一层神秘的宗教灵光，进步思想被窒息，学术活动被禁止。每个人，包括国王在内，从生至死均受教会支配。

罗马教会将各国封建势力集中于自己的周围，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抗。因此它也就成了西欧资产阶级兴起所要消灭的第一个敌人，达到他们发展史上斗争的第一站。

德意志在宗教改革以前，是罗马教会最忠实的奴隶，以致整个德国都受教会的压榨最深。罗马教会每年通过德意志教会从德国搜刮的财富多达 30 万金盾，德意志也因此而得了个绰号“教皇的奶牛”。

德意志政治的分裂给教会创造了有利的剥削机会。教会为了加紧压迫德意志人民，千方百计地阻挠德意志皇权的强大，极力扶持德

意志教会和世俗诸侯的势力，企图长期地维持德意志的分裂局面，以利于自己的统治。

教会是封建势力的堡垒，也是维护农奴制度的急先锋。因而要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就必须反对罗马教会的统治，打击教会就是打击封建势力。而在当时，任何反抗封建社会的斗争均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罗马教会也就成为德意志市民阶层打击的首要目标。

在反封建、斗教会的过程中，世俗的诸侯与骑士公然站在市民一边，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看中了罗马天主教会的财产。他们在反对教会统治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不是这场斗争的主力。

反教会的中坚力量是那些倍受封建剥削、教会压迫的急待摆脱被奴役、被剥削地位的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的地位低下，生活困苦，对封建势力极度仇视，城市中如手工业帮工、短工等纷纷举起反抗封建神权的大旗。

罗马教会作为封建保守势力的堡垒，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严重地阻挠，使新兴的资产阶级把它当成了首要的攻击目标，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首先同教会展

开了斗争。

真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的是一个历史方向，它的力量逐渐壮大。但在其发展初期，它的目标是推动自己经济的壮大，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封建势力，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

这一时期，以手工工场工人为主的城市平民及农民，也由于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加入了反抗教会的斗争，并成为主力，但不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

世俗封建主也不满于封建神权的压迫，加入了反教会的斗争。

这样，罗马天主教会成了众矢之的。

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大胆地揭露教会的腐败与黑暗，辛辣地讥笑僧侣们的贪婪、虚伪与无知。在《列那狐的故事》中，主人公借狐狸列那之口讽刺神父等神职人员：“一心追求吃、穿，醇酒、美女。至于那些修士也毫无二致。他们之中，越是无耻，就越能爬上高位。教皇特使、修道院长、主教、修女等等，不论他们叫什么名字，都异口同声地说：‘把你的一切给我，而我的还是我的。’”

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约1469～1536年）在《愚人颂》中讥讽教皇、主教、修士、神学家们无一不是贪婪淫荡、不可救药的愚人，教会的罪恶、教会神职人员的丑态在人文主义者的笔下昭然若揭。

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作为反封建与天主教会的先锋，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种下了反抗神权的种子。正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对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一样，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为德国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上的准备。

德意志人民受到人文主义者思想的启蒙，对罗马天主教会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德意志阶级矛盾这时愈趋尖锐，德意志反封建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日益尖锐与激烈。

到16世纪初，分散的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渐渐地发展为广泛地宗教改革运动。

这一壮阔的运动领导者就是宗教史上著名神父马丁·路德。

1505年7月16日，爱尔福特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中多了一名年轻的修士。修道院长在举行入院受戒仪式时，问他："路德，你为什么要做修士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要寻求天主的仁慈并要与你们结成亲密的道友！"

德意志哈尔茨山东南，有一片叫做曼斯菲尔德的伯爵领地。这些伯爵靠压榨当地农民和矿工过着奢华的贵族生活。他们比同等级其他领地的伯爵更为优越，因为这一地区有许多铜矿。

为了满足对铜的需要，页岩的开采量越来越大。"山之呼唤"吸引了大批的矿工、手工业者、农民、帮工、短工，他们纷纷来寻找幸福。吸引来的这些人中便有马丁·路德的父亲，汉斯·路德。

汉斯·路德于1483年春离开土地，来到矿山。他的妻子名叫玛格丽特，也是祖辈都为农民。

1483年11月10日将近午夜时分，汉斯家添了人丁。翌日早晨，邻近彼得教堂里的神

父以当天纪念的圣者之名——圣马丁，为他洗礼。圣马丁是一位虔诚的主教，有一次，他出于基督教的慈爱，曾把自己暖和的大衣披在一个受冻的乞丐身上。

于是，路德家的新生儿取名为马丁。随着家庭的扩大，汉斯·路德的忧虑也在增加。他在艾斯勒本很不成功，第二年夏天，带着全家赶到曼斯菲尔德去了。

在曼斯菲尔德，汉斯·路德当上了矿工，后因家中贫困，便向矿业主租了一个不大的熔炉，做了冶炼工。他凭借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又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不久便又租了3个熔炉，开始雇用工匠，靠着剥削工人逐渐成为富裕的业主。

数年以后，他加入了矿山协会，这是当地许多小型组织之一；1491年成了村议会4个成员之一。

路德共有7个兄弟姊妹，马丁·路德是长子。马丁·路德的母亲玛格丽特持家很是节俭，但对子女却很严厉，有时打骂他们。马丁·路德后来回忆道：

“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小事，把我打得

流血。……那就是我出家修道的原因。”

马丁·路德在学龄前，母亲就对他实行严格的宗教教育，教以天主十诫、教理问答、圣教四规和一些祷文。他母亲甚至在他幼小心灵中灌输避世宗教思想。

1488年春天，马丁·路德仅4岁半就被送到离乔治教堂不远的曼斯菲尔德市立学校。马丁·路德在那里学习写字、算术、唱歌和拉丁文入。由于教师只教学生准确无误地背诵，对培养记忆力很有益处，但很难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马丁·路德在这所学校中，时刻担心的是悬在头上、随时可能落下的教师的鞭子。只要出点小小的错误，就会受到鞭打。路德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逝世前3年时回忆说：

“有一次，我挨了15鞭，因为不懂还未学过的变格和变位。”

他抱怨道：“这样的教师和师傅肯定到处都有，他们自己一无所知，又不想学习任何好的和正确的东西，连起码的学习和教学方法也不知道。”

这种不公平在他心灵中埋下了多么深刻的痕迹。后来，他曾深入地研究学制改革问题。

1497年春，汉斯·路德把马丁·路德送到马格德堡的一所学校学习。汉斯·路德虽然自己在社会等级的攀登中成绩甚佳，但他也看到了自己的限度。那时，城市的政策仍然由市政厅与老资格的上层市民决定。汉斯·路德希望他的儿子冲破他的限度，将来也成为这个上层社会的一员。

在马格德堡读书期间，有两件事在马丁·路德心灵中刺激很大：一件是他看到一个行乞路过马格德堡的托钵僧（又称乞食僧或游方僧）。那个僧侣叫安哈尔特，原来是一位王子，但为了使灵魂得救便当了托钵僧。十分明显，那幅劝世图画就是宣传罗马天主教"因行称义"教义的骗世图画，安哈尔特正是这一教义的牺牲品。

另一件事是他在教堂里看到的一幅劝世图画：图上绘着一只帆船，正驶向天堂，虽然海上波涛汹涌，而船上的人却安然无恙，他们全是修士、神父、主教一类的神职人员，而没有一个世俗人。船上的人正在救护将被淹死在

水中的有罪的世俗人，那些世俗人在海上飘浮着、沉溺着，但也有几人抓住了从船上抛下的绳子，喘息着、挣扎着……。

由于当时整个社会都为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路德在家庭和学校所受的都是严格的宗教教育，马丁·路德受那幅劝世图画及安哈尔特王子的苦行的影响很大，他完全接受了“因行称义”的宗教信念，并坚信“因行称义”的捷径莫过于出家修道。但因为他年龄幼小，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马格德堡的现状为马丁·路德扩大了视野。城市的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他们不再是纯粹的旧贵族，其中也包括经济上崛起的新贵族。他们的成员在市政厅中，占据所有重要的职位。他们所起的作用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是最发达的早期资本主义企业主，对城市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运用手中的政权，去压制城市人民和城市周围农民的进取心，从而支持了旧的封建制度。于是，平原地区日益频繁地爆发了抑郁很久的愤怒举动，农民与城市中的人民均加入了这一行列。

但是，在马格德堡的路德并未太注意，这一切只是在他眼前浮现而已，他见到的马格德堡是一个表面秩序井然的大都市。只是后来到了爱尔福特，他才成为城市内部阶级斗争的直接见证人。

1498年，汉斯·路德准备把马丁·路德送到爱森纳赫乔治教区中学读书。因为那里有他们的亲戚。在圣尼古拉教堂当差的康拉德·胡特尔及其妻子也许会接受这个小孩子，并给他提供食宿。

不久，这位年仅15岁的孩子背起行装离开曼斯菲尔德到爱森纳赫去了。

爱森纳赫的情况与汉斯·路德在曼斯菲尔家中想象的不一样，他很穷，自己尚且难以糊口，能给马丁·路德就更少了。

于是，马丁·路德不得不作为“求布施者”而四处乞讨过活。他和其他学生一样走家串户，在教堂里唱赞美诗，在别人家门口要一小块面包。路德的嗓音优美，特别引人注目，因而不久就在科塔家找到了一席栖身之地。后来又经过这家介绍，他成为商人海因里希·沙尔贝家常来常往的食客。由他来监督沙尔贝的

儿子完成作业，并帮助他掌握教材。

这是马丁·路德第一次接触到属于新贵族的市民阶层，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他父亲，生活方式与思想也与他家里的习惯完全不同。路德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沙尔贝一家是比较虔诚的家庭。这种虔诚程度是路德从未在曼斯菲尔德见过的。很有可能在这里，唤起了他的感情，使他萌生了加入僧侣集团的思想。

沙尔贝不仅是个有钱的大商人，学问也很渊博，经常和路德讨论社会与人生问题，有时也给路德讲一些他从未见过的新鲜事。

年轻的路德从沙尔贝那里听说到，被弗兰西斯派僧侣用链子锁在寺院墓地的一个囚徒，名叫约翰内斯·希尔顿，人很奇怪。他究竟是个疯子，还是异教徒呢？

原来希尔顿在布道时曾以激烈的言辞批判过教会的某些做法。教会因为他的繁冗的不利于他们的讲演而不快，于是对他进行审讯，派人硬把他囚禁起来，押在死囚牢中。

路德在同罗马天主教会斗争很久以后才知道，希尔顿也曾预言，1516年将出现另一个

人，“他将猛烈地攻击你们这些僧侣”。

路德后来回忆说：

“我想，当我在爱森纳赫学习头几门学科时，那个人还活着或刚刚死去。因为我记得，房东海因里希·沙尔贝曾满怀同情地说起一个被囚禁在监狱里的人。”

在爱森纳赫学习期间，路德经常去找附近默拉的亲戚，从而了解到农民的生活。但在森林后面的村庄里，还觉察不到时代的变化。这里的人们仍然象以前一样生活，对法律、财产和行业保持着传统的观念。

所有这些印象以及他对早期资本主义和农村宗族制生活方式的了解，对路德的个性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深深地体会到自己不仅与沙尔贝那样富裕的市民的有着联系，而且也与他幼年所接受的、在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正直诚恳和正派的观念休戚相关。

在马格德堡和爱森纳赫所受到的教育，只是路德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一方面则是他的视野开阔了，了解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矛盾。在城市中，贫富处于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并且分化趋势愈来愈大，社会矛盾极

为突出。这一切，在年轻的路德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印痕，他开始思考人生、社会等重大问题。

1501年，路德离开了爱森纳赫与圣乔治学校，到埃尔福特大学学习哲学与法律。

埃尔福特市中心耸立着大教堂和泽维里教堂，构成了一个城堡式的建筑群，其内是妓女猖獗的大本营。市民们并不以这个“图林根的罗马”而自豪，他们认为，所有的修道院和教堂的房地产都是异物，憎恨教堂和教会基金会的首领以及主教统治集团的代表。这些人多数是外地的贵族，他们靠这座城市的收入过着丰裕的生活。

城市中直接掌握政权的是旧贵族代表人物。富商靠经营菘兰赚钱，但这种生意障碍很大，因为所有商业要道都要经过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如果萨克森的选帝侯关闭了这条通道，埃尔福便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孤立之地了。

当路德于1501年4月来到埃尔福特时，在他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不同马格德堡和爱森纳赫，统治阶级与政治无权的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已经激烈到一触即发的

程度。

路德一进城市，迎面而来的是紧张的氛围。

这所大学是欧洲当时闻名的大学，由经院哲学主宰着教学大纲。路德学习的是现代道路——德国弗兰西斯派学者威廉·冯·奥卡姆的现代道路，它是经院哲学的一个流派，主张唯名论，产生于经院哲学内部的一场争论。

奥卡姆教导说，理智是不能表白的。教会的教义是可靠的真理，即使教义中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仍然是可信的。

这种信仰与知识的分离虽然是不科学的，但却为获得知识获得了新的可能性。在这里，理性和知识均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因而有可能在不损害教义的情况下而又获得新的自然科学知识。

路德首先投入了7门人文学科的学习，这7门课是：文法、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学、修辞学和音乐。他这时获得的知识完全符合时代的水平。他读到了关于热那亚人科隆从伊斯帕尼亚出发向西航行，不久前到印度的报道；他知道地球是个球体，而不是什么圆盘；

他也知道潮汐形成的原因；至于他讨厌星占学和炼金术，也是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学习。

这个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潮传遍整个德意志。经济上强大的市民阶层很自信，他们创造了新的世界观，与经院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抗。他们的观点可以在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中找到，中心不再是上帝，而是有教养的、富有创造性的人。

人文主义学说也波及到了德意志，但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仅限于教育事业的改革，几乎没有触及社会问题。

15世纪中叶，在美因茨，古腾贝格的约翰·根斯弗莱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由于这一发明，书的价格降低了，上市周期缩短了，印刷品的发行范围扩大了。一个新的市民教育阶层正在形成，他们用所获得的知识日益巩固、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且也越来越清楚到统治关系的弊端。

人文主义者通过论战性文章与小册子与经院哲学进行了斗争。几乎没有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退却，他们的时代精神鼓舞他们努力向前。

但是，路德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并不多，他仍然忠于他的“亲爱的大师”奥卡姆的学说。他认真地听课、做练习，参加每周举行的辩论会。路德认为，学生辩论会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最佳方法。在辩论会上，他显示了非凡的才华，被公认为“哲学家”。

在 1502 年秋天，路德通过了学士学位考试，从而获得了第一个学位，成为人文科学学士。与他一同获得这一学位的还有 56 人。

路德仍然留在学校里，准备通过硕士学位考试。这时，这个地区发生了农民以鞋为旗号举行的起义，即施佩耶尔教区农民起义。早在 1493 年，埃尔萨斯的农民就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联盟，其标志是农民的粗鞋，也称绷带鞋。他们积极反抗教会的压迫。

统治者摧毁了这一联盟，并且更为专横，变本加厉地征收赋税、什一税、地租和利息。

农民生活在社会最下层，处境很悲惨，日益加重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拿起武器，1502 年，他们又一次聚集起来进行斗争。

施佩耶尔教区的鞋会提出一个口号：

“现在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回答是："有神甫和贵族，我们就休想过好日子。"

这个联盟起义的计划被泄露出去了。人民原指望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统一全国并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但他却下令，凡在鞋会宣过誓，只要年满16岁而且是自愿参加者，一律处死，为首者肢解，头领绑在马尾上拖死。

施佩耶尔教区的镇压是残酷的，当局实行烧杀和刑讯。

但路德对于这一切似乎充耳不闻。1505年，他结束了人文科学系的学习，通过了硕士考试，成绩优异，17人中列第二名。

路德并没有因为得了硕士而沾沾自喜，那时，他的心情异常苦闷。普遍的社会危机触及人们的思想感情，破坏了他们安定的生活，令人痛苦的疑虑萌生了。路德心中的疑虑越积越多，汇小流而成大海，逐渐汇成一个问题：他如何取得上帝的宽恕，以享永恒的幸福？

路德敏感的心中上帝严厉法官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他认为，只有通过忏悔，履行教会义务和取悦于神，才会得到宽恕。上帝的威严高于一切。

一种巨大的、捉摸不定的畏惧困挠着他。当他的一位朋友死于瘟疫时，他更是惊惧万分地扪心自问，为了取得神的宽恕，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

1505 年春天，与春风一同俱来的是可怕的瘟疫。人们在街头巷尾燃起了大火，企图以此来净化空气，赶走瘟疫。但屋顶上方丧钟的回音震荡着，教堂里不时传出低沉的祈祷声。收尸车每天 3 次从街上走过，伴随着“把你们的死人送出来！”的喊声。

马丁·路德在学期结束前离开此地去曼斯菲尔德，他此举至今无法断定其原因，但多半是为躲避瘟疫。

他在家并没有呆很久，7 月初就返回了埃尔福特。当他路过一个名叫施托特恩海姆的小镇时，恰巧遇上了大雷阵雨，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打在他身边，他顿时魂不附体，立即许愿说：

“圣安娜，救救我吧！我要去当僧侣！”

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马丁·路德愈加信仰上帝，终于在大雨中许愿去当僧侣。1505 年 7 月 16 日，即那阵大雨过后两个星期之后，他

终于叩开了奥古斯丁隐修院的大门，请求修道院接纳他。

在此之前，他变卖了所有的书籍与家什，并请朋友们吃了告别饭，而后毅然踏上了去爱尔福特修道院的路。

修道院长同意了他的请求，在给他举行入院受戒仪式时，修道院长问他：

“路德，你为什么要做修士呢？”

路德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要寻求天主的仁慈并要与你们结成道友。”

修道院长于是给他讲了安盆、守贞和顺服的所谓“修士之戒”。

进入寺院后，马丁·路德尽力治疗自己的心灵，而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后来路德说：

“我进寺院是为了使自己不致迷路，并且得到永生。”

然而，十分有趣的是，正当路德背向俗世，走进寺院时，另一个人却象他一样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只不过是逃出寺院，想进入尘世。

这个人就是乌尔利希·冯·胡登，弗兰肯骑士的儿子。胡登 11 岁时被送到富尔达的寺院学校，为成为神职人员作准备。但他不甘心寺院生活的无聊，17 岁时逃到了科隆，并且在当地大学注了册，进入大学学习。后来由于大学中多米尼克斯会的势力扩大，赶走了几名不合他们口味的教师，胡登便是其中的一位，于是胡登来到了埃尔福特。

胡登在这里与人文主义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本人也成为人文主义者。

路德与胡登这两位伟人，同时住在埃尔福特，却互不相识，而且他们的名字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晓。

“我从未想过离开寺院……”

在马丁·路德进入寺院以后，他被安排在寺院招待所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必须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以便重考虑自己的决定；同时还要受来自寺院方面的观察，以考验他是否配当一名僧侣。

路德静静地等待着，恪守教团一位教师的

格言：

“僧侣的事业就是哭泣、沉默和静养。”

马丁·路德的父亲汉斯·路德对于他此举异常震怒，但最后终于在马丁·路德大病时赞同了他的行为。

两个月过去了，修道院院长维南德·冯·迪登霍芬和教士会议认为，路德适于过寺院生活。

在修道院大礼堂举行的修士大会上，路德平静地躺在圣坛的阶梯上，等待院长的问话，等待正式入院仪式的开始。

修道院院长庄严地问路德道：“你渴慕什么？”

“上帝和你们的怜悯！”路德平缓而又坚定地说。

马丁·路德跪着回答修道院院长的问话。问题都是教会习俗所规定的：是否与女人有联系，是否负债，是否体内隐藏着秘密和疾病，是否有奴仆。

在所有问话满意地结束后，院长再一次恳切地发问：

“你渴慕什么？”

路德仍是那句老话：

"上帝和你们的怜悯。"

院长给路德一个和平吻。给他剃去了头发，脱掉世俗的衣服，最后穿上奥古斯丁隐修士的装束：一件白毛衬衣作为内衣，外面披一件带风帽的黑色僧衣，系上黑色皮带。

院长说："主给你穿戴成新人，你就是按上帝的形象，在正义和真理的光照下创造出来的新人。"

路德作为见习修士被奥古斯丁隐修教团接纳。这个教团历史悠久，建团250年来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与权力，它的意见在梵蒂冈都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

路德的见习师傅约翰·冯·格雷芬施泰因是一个十分开明的僧侣，不仅非常了解教会的弊端，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敢于面对现实，说真话。

从他那里，路德第一次听到了扬·胡斯的一些详细情况。一天，他们在"胡斯战胜者"察哈里亚厄墓旁的寺院教堂中，格雷芬施泰因告诉路德，胡斯并没有给任何人驳倒，但他却被处死了，本教团大多数人都有这种看法。而

胡斯的道理既然驳不倒，那么他的改革思想或许是对的？

胡斯是100年前反抗教会统治与反对教皇的英雄。他是波希米亚的一个神甫，他的想法在波希米亚被迅速地传播开来。胡斯也很快成为天主教反对派的头领。他公然提出要没收教会的财产，同时也攻击了榨取民脂民膏的德国统治者。胡斯的主张完全符合德意志人民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

1414年，罗马天主教会在康斯坦茨举行宗教会议，当时宗教会议的权力还很大。人们也邀请胡斯来到这里，以便当场驳斥他的异端思想，并迫使他收回自己的观点。西基斯蒙德皇帝则保证他会安全返回波西米亚，不会加害于他。

但是，胡斯一到康斯坦茨，教皇就下令将他逮捕。人们想使胡斯收回自己的观点，但胡斯拒绝这样做。于是教会把他当成异教徒处以火刑。

许多人始终如一地怀疑：胡斯对吗？是否烧死的是一个正直的人？难道教皇和宗教会议也会犯错误吗？

在这段时间里，胡斯的事对路德震动很大，他也认为这个波希米亚人在很多地方是对的，不应该处死。

按照教团的习俗，路德与世隔绝了一年，终日祈祷、唱诗、斋戒。在孤独的寺院生活中，他又开始终日惶恐不安，害怕自己经受不住上帝如此的考验。当初，正是这种恐惧感使他走进寺院，但恐惧并没因他进了寺院而离开他。不过，他这时的恐惧来自对教会的赦免手段及其效力的初步怀疑。

不久以后，马丁·路德被封为神甫，但他的心理并未产生多大的改变。后来，路德对他当时内心的矛盾作了如下描述：

恐惧驱使我走向绝望。

上天无路只有死亡，

阴司地府也不得不前往。

1508年，路德以神父身份接受了威丁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职务，从埃尔福特移居威丁堡。1509年9月，路德被召回埃尔福特寺院，其原因不明。

在埃尔福特，路德仍给教团寺院成员讲授一般的课程，他开始研究奥古斯丁，并深化自

己的希腊文和希伯来语的知识。

在埃尔福特，路德第一次正式面对社会冲突。

这场冲突首先是从税务问题开始的。埃尔福特的税率很高，几乎没有不收税的东西。城市负债累累，企图通过税金弥补财政赤字。市政厅的先生们很自信政权的威力，对城市市民与平民的行动不很注意。

终于有一天，一个由数百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到市政厅，要求过目市政府的帐本。市政府被迫同意。

很快，这个委员会公布了查帐结果：埃尔福特负债累累，钱库里短缺50万古尔登。这令市民们瞠目结舌。

正当委员会审查帐目时，美因茨与萨克森两大选侯国正在注视埃尔福特事态的发展。于是埃尔福特市内不久就出现了两派，其中一派主张与美因茨加强联系，这一派主要是贫穷的阶层，如行会手工业者和短工；另一派主张靠近萨克森选侯国，市政府中的大多数已倒向了这一方。

"美因茨派"中的激进分子拉来了各方人

士举行集会，他们要求在市政府选举时有发言权，并派自己的代表任职。

市政府的官员们一致行动起来，黄昏时分，派兵抓来了参与这场行动的所有人。

1510 年 8 月，路德所在的埃尔福特大学遭受了良久难以恢复的打击。大学被士兵用火炮轰击，大学生们匆忙逃到格拉地区避难。

埃尔福特人民对这所燃烧着的大学恨之入骨，它是可恨的当局的一部分，是培养市政府未来的主宰、文书、法官和神甫的地方。这些人都靠压榨百姓度日。

路德茫然失措地望着大学上空的烟雾，看到众多无价之宝毁之一炬，万分难过。他对人民群众的不相信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尽管马丁·路德在这次斗争中身处现场，但他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其深刻的内在联系。他对事件完全不了解，但他却看到了一点：必须推翻这个制度。

萨克森选侯国与美因茨选侯国为争夺城市统治权而斗争不息，可两派均不向人民群众让步。对于这一斗争的阶级背景，马丁·路德始终不明白。

当时，类似埃尔福特这一事件的事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发生，这是城市中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反映，平民阶级日益成为斗争的主力。

路德面对这一切，得出的结论只是："我从未想离开寺院。"

一个虔诚的僧侣最后终于走向了他的彼岸。上帝的宽恕逐渐由怀疑而变成否定。

1510年11月，两名奥古斯丁僧侣从纽伦堡出发向南徒步去罗马。其中一人是马丁·路德，另一人是约翰·冯·梅歇尔恩，他是科隆某寺院的院长。

这次旅行路德负有极其重要的任务，他是受奥古斯丁修士教团的委派前往罗马的。

1510年9月，萨克森的大主教和教团总管约翰·冯·施陶皮茨在罗马总部接教皇谕旨，说：

"在20个改革的寺院中应加强戒律，并将其划归萨克森修道院联合会。"

奥古斯丁寺院修士大会同意联合，但纽伦堡方面却首先表示反对，埃尔福特随声附和。22所寺院站在施陶皮茨一边，7所反对。反对者担心这种合并将有损于他们的特权与优势。反对者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打算上诉罗马，于是派埃尔福特的纳廷博士和路德前往哈雷，力争让马格德堡大主教向他们颁发向圣父上诉的许可证。但他们却遭到了大主教的回绝，二人两手空空而归。

数日以后，反对派在奥古斯丁寺院里商议下一个步骤，决定求助于罗马，去找教团总管，或必要时直接面求圣父。

路德按照指示，与教团代表同行。这位代表是路德的助手，协助他完成此次罗马之行的任务。

意大利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寺院与德意志也不一样。意大利人友好地欢迎这两位来自远方的同教兄弟，可暗中却嘲笑他们的虔诚与狂热。

路德一路发现，意大利寺院的规章制度不能很好地执行，这与路德所在埃尔福特寺院的严格管教相反，正如俗语所说："离罗马越近，

基督教徒越坏。"

1510年底，他们来到罗马城。路德跪在地上，虔诚地说：

"神圣的罗马！向你致敬！殉道者所流的血使你变得三倍神圣。"

路德二人在罗马城门附近的德尔波波洛圣玛丽亚修道院下榻。他们在罗马办事期间，路德一直住这的寺院，以适应寺院生活。

当随行的教团代表出去办事，力图从教团总管那里得到向教皇上诉的许可时，路德就在罗马城里观光。马丁·路德对现代的、古代的罗马一概不感兴趣，他要寻览的是殉道者的神圣的城市。但他后来说：

"跑遍所有的教堂和深谷，方信一切纯系谎言。"

路德在罗马的所见使他大吃一惊：他们能有把握地迅速做完弥散，就象变戏法一样。当路德还没有读完福音书，旁边的神甫已经做完了弥撒，并且催促路德道："走吧，走吧，远远走开，朝前走。"

更令路德吃惊的是，在罗马做弥撒也要花钱。罗马人总是缺钱，因为他们要太多的游手

好闲的人。

罗马之行在路德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但他对罗马教廷的种种不满并没有同教皇联系在一起，他对教皇的忠诚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也没有对教皇产生任何怀疑，他一如既往地是罗马天主教忠实的教子，谁也不会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现异教徒的端倪。

1511 年 1 月，路德和教团代表离开罗马。他们在寺院事务上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教团总管拒绝向教皇上诉，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支持对手。反对施陶皮茨和他的计划就是反对施陶皮茨的支持者教团总管。

1511 年 7 月，反对联合的寺院代表再次与施陶皮茨会晤于耶拿。埃尔福特方面拒绝与他联合，但全院却有两票同意联合，即路德与他的朋友约翰内斯·朗格。他们认为，如继续反对施陶皮茨就是粗暴地违背服从的誓言，有损于教会的事业。

出于对罗马天主教的忠诚，路德首次采取了与大多数不一致的行动。因此，他与他的朋友朗格，被埃尔富特的寺院兄弟所抛弃。在那里，他们已不受欢迎。连老朋友和恩人纳廷博

士也直接指责他说：你背弃了修士大会！

路德与朗格在埃尔福特受到打击，在施陶皮茨的支持下缓解了。他把路德接到维腾贝格，安排路德作为自己的继任人，任命他为寺院教士，并让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有一次，他与施陶皮茨一同在寺院花园的梨树下歇凉时，施陶皮茨对他说："硕士先生，您必须成为博士和传教士，这样，才与您的才能相配。"

但是路德胆怯地拒绝了，他感到自己不能胜任这种双重的任务。施陶皮茨并不甘心，接着说：

"您难道不知道，我们主要的伟大工作吗？它需要聪明人给它出主意，您死后在天上也会进入它的议会，因为它肯定需要几位博士来帮助。"

作为僧侣，路德两袖清风，甚至连书都属寺院或学校，晋升博士所需的大笔费用无处可出。博士学位对他一个穷僧侣来说确实是十分遥远的。

施陶皮茨为了报答路德支持过他的恩情，恳求智者腓特烈给了他50古尔登，其先决条

件是新博士要终身在维腾贝格大学讲授圣经课。这样，路德被选帝侯用50个古尔登买来做他的终身大学教授。

在维腾贝格这段时间，路德十分紧张，身兼修道院副院长、大学教师和城市教堂传教士等数职，又要攻读博士学位。图林根和迈森地区11个奥古斯丁寺院归他管辖。他的名望越来越高，他的话也很有分量，人们都重视他的意见。他解除了玩忽职守者的职务，同时提拔他的朋友朗格为埃尔福特的院长。

在路德的监督下，寺院的戒律抓得很严。正因为如此，他对教会内部的腐败越来越明了，他在著作中写道："教会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不幸。"

教会的腐败促使他又想起了他往日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何得以上帝的宽恕。他怀疑教会的赦免手段的效果，孜孜不倦地寻求得到上帝宽恕的途径。

在学习使徒保罗达罗马人书时，他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首先是犹太人，后是希

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路德心中豁然开朗，获得上帝的宽恕只要通过信就可以完成。他坚信：只要人们深信不疑地接受上帝的赦免，就肯定可以获得解放。

对于教会，路德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所有圣人和在上帝面前说情的救苦救难的人，都是一无作用的，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纽带的教士与作为媒介的教会，都应剥夺其权力。

但上述理论并不是路德当时直接说的，而是他对上帝新理解的直接结果，尽管路德本人没有意识到他所做一切的后果。“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成了他理论的基础，也是多年来寻求的获赦之路。

路德心中已驱散昔日的苦闷与烦恼，他很自信自己的结论。

路德不断扩大他的思想。自从1516年起，他在大学讲课中出现了批判的口气，不过，这时他是小心翼翼地，并做了许多保留，往往只在讲稿吐露一些自己的想法。

“罗马教会完全堕落了、污染了，它是一

个集所有可以想象的淫乱、荒唐、奢侈、野心和亵渎行为之大成的大杂烩。今天，罗马象皇帝时代一样花天酒地。看来，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使徒。”

就在这个时期，路德提出了第一批改革建议：教会权力要修改；教会节日要减少；取消宗教仪式的一切排场；斋戒日毫无意义。

路德对于教会的批评丝毫不回避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甚至他攻击了国君智者腓特烈。他写信给其枢密顾问说，在世俗方面，国君可能是最有智慧的人，但要从上帝和灵魂得救的角度看，选帝侯却7倍盲目。

腓特烈对圣物十分崇拜，路德也同样不客气地表示了自己的反感。他指责这位侯爵说，由于他过分重礼而忽略了作为国父的义务，而这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上帝希望众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侍奉上帝。使上帝喜悦的行为要见之于日常生活，见之于愉快的上帝的创造。他对僧侣生活和那种禁欲主义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表示反感与厌倦，把取悦于上帝的行动转移到了劳动领域。

路德新神学形成过程中，必然要对经院神

学进行攻击，其始端就是他信仰已久的奥卡姆的赦免学说。他开始攻击奥卡姆的最大靠山——亚里斯多德。

他写道：

“我的心从未如此炽热，要去揭露这个戴着神甫面具，欺骗教会的演员，要向全世界指出他的耻辱。是的，如果亚里斯多德没有血肉，我就不会为这种说法感到羞愧了。他是个有血有肉的魔鬼。”

路德以教会会父奥古斯丁来代替亚里斯多德。卡尔施塔特教授经过短暂的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观点，并帮助他把这个观点在维腾贝格神学系取得了突破。

路德对经院哲学所持有的半反对态度，以及他反对亚里斯多德和对古典语言的偏爱，使得这位新神学家与人文主义者有时站在一边。但最终他与人文主义者还是分道扬镳了，因为他与人文主义者有着太多的区别。路德把圣经作为考虑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人文主义者则要学习古代经典作家。路德心中只有上帝，人文主义者则把人和人的意志看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路德在人文主义的著作中发现：

人的地位远远重于上帝，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人文主义这条路他不能走下去，也不愿走下去，而去破坏他心目中的上帝。

路德的思想与历史时代的节奏是合拍的，符合社会的需要，增强了市民的自信心。路德以他的新神学为根据，在改革建设中指出的一切，本质上是新兴的市民反对阻碍进步的教会和教皇的政治、经济斗争在神学上的反映。

路德主张逆来顺受，听从于命运的安排。"义人必因信得生"是路德的斗争纲领，它的局限性与进步性同样显著。路德实际上是主张用一种内在的枷锁来代替罗马教廷给人们施加的外在的枷锁。

这时，尽管路德非常大胆，震撼了社会，却仍然没有摆脱经院神学的范畴。他虽已驰名教团，但却又不为教团之外的人所熟知。

1517 年 10 月，路德公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从此，一切发生了改变。

第二章　德国宗教改革

95条论纲——新世纪的宣言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是从1517年路德公开反对教皇出售赎罪符一事开始的。

天主教会宣称：人们生来就有“原罪”，人一生之中还会犯有其他“七罪”。基督徒必须想方设法祈求上帝的宽恕，免除这些罪行。否则，死后灵魂是难以上天堂的。

赎罪，原来是指教会根据信徒所犯罪过忏悔的程度所给予的减免。此事在十字军东征时十分盛行。那时，如果想完全免于惩罚，就必须随十字军去攻打巴勒斯坦。如果没有死在那里而活着回来，他的罪过就可以全部获赦。后来，每当教廷缺钱时，只要为十字军东征募捐，就可以赎罪。

经院神学对赎罪的解释为，教会靠基督以及所有圣者和殉道者的功劳而拥有一笔丰富的恩赐财产。教会可以自由支配这些财产，并从这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向众人布施，这笔财富由教皇管理。

早在1300年，在教皇波尼法八世的支持下，举行了所谓的庆典年。在这一年内，只要在罗马连续逗留15天，并朝觐了使徒的墓，谁的罪就可以完全免除。当时计划每百年举行一次庆典，后来又缩短至50年、33年、25年。

不久以后，人们不用再去罗马朝圣了，因为做赎罪买卖的商人无所不在，甚至在某些地方建立了合法的代理行。人们付钱后，得到一张表示他虔诚的证书，为赎罪而做忏悔就算完成了。

教会厚颜无耻地欺骗人们说，人们不必为赎罪担忧，因为教会有权力代替上帝赦免人们的罪行，只是要用钱来赎买。

教会印制一种赎罪符，从罗马运往西欧各国，由修士四处出售。有罪之人买了它就能洗清一切罪孽，不仅可以免除已犯的罪过，而且还能防患于未然；既可以为活人免罪，也能为

死人赎罪。赎罪符功效的大小要由出钱多少来决定，教会还特地列出价目表。其中赦免杀人罪要用 7 个古尔登，赦免抢劫教堂罪要 9 个古尔登。

出卖赎罪符是教皇收入的重要来源。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朱理亚二世为搜刮自己钱财以供自己享乐，在 1500 年、1501 年、1504 年、1509 年先后 4 次在西欧各地出售赎罪符。

1517 年，教奥利奥十世更加变本加厉地大肆贩卖赎罪符。这次出售赎罪符，实际上是用来偿还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勃雷西特的债务。

专门负责在德意志出售赎罪符的是教皇的“特使”、多米尼加修士特策尔。他说，只要买赎罪符的钱一敲响钱箱，人们的罪过顷刻间就会得到上帝的赦免，灵魂顿时比出生时还要纯洁。最后，他叫喊：“买吧！买吧！天堂的门已经开啦！”

有了赎罪符，同恶行和恶习斗争便显得毫无意义。通过一次性的忏悔，即购买赎罪符，就可以洗清自己的罪过，于是忏悔不再发自人们的灵魂深处，而不过是畏于上帝的惩罚而已。

随着赎罪符大量出售，教会的威信每况愈下。人们也因此而不担心犯罪，也不再忏悔。甚至有人公开说，获得赎罪符就等于赎清了自己的罪过。

路德震怒了！

他对于忏悔的理解与教会全然不同。“我们主和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路德把它当作他论战的中心，并把这一点列为95条论纲中的第一条，作为基本原则。

1517年10月，路德接到一篇以美因茨大主教名义颁发的对赎罪符商贩的指令性文章，越读越气，他的目光越深邃。作为一个神学家，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写一篇文章，然后要求教会公开进行辩论。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及其助手约翰·施奈德在宫殿教堂的北门张贴了95条论纲。按当时的风俗，在教堂的北门挂上论战性的文章，就表示要求公开辩论。

历史性的95条论纲问世了！历史上把这一天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开始。

95条论纲名为《关于赎罪符的功效》。在论纲中，路德痛斥了特策尔等人的卑鄙行为，

呼吁人们对赎罪符的功效问题展开争论。

当天早晨，路德就把论纲连同一封请求谴责赎罪符商贩的信寄给了美因茨大主教。同时还给勃兰登堡主教、法兰克福、莱比锡和埃尔福特大学寄去了论纲，请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

从路德的这篇论纲看，开始时他的立场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质的变化。其态度是十分软弱的，决不是对教会的宣战书，他甚至没有反对赎罪符，而只是反对它的无限制的滥用，他的主张并未超出以往城市异端所提出的要求范围。

论纲具有鲜明的“两面摆动”的特点。论纲中权力为教皇维护，他只是反对赎罪符贩子吹嘘赎罪符功效“无稽谰言、胡说八道”（第七十二条），而不敢追究教皇的责任，硬是将出售赎罪符的罪过推在特策尔等人身上，仿佛教皇是置身事外的高人一般。

但是，《关于赎罪符的功效》的发表，毕竟是路德反对天主教会的最初行动，论纲深刻地指出：“教皇并没有意志力和权力来免除任何人的罪过，除非是免除教皇用他自己的权力

或宗教法的权威所强加给人们身上的那些惩罚。”（第五条）“因此，那些贩卖赎罪符的传教士宣称：教皇的赎罪符可以挽救一个人而免于一切惩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第二十一条）

路德尖刻地指出：“每一个真正悔过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符，也可要求完全赦免。”（第三十六条）

在这里，路德把他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做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也就否定了赎罪符的功效。他接着说道：

“应该教训基督徒，如果有人看见穷人而不加理睬，而去花钱买赎罪符，那么，他所买到的就不是教皇的赎罪符，而只是上帝的愤怒。”（第四十五条）他再一次论述了人们如何通过自己获得上帝的宽恕。

路德在论纲中一再指出：

“上帝高于一切，一切都取决于上帝的恩赐。”

“如不信任教皇的赎罪符，则它就成为有益的东西；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敬畏上帝，则就非常有害了。”（第四十九条）

路德十分轻视赎罪符的作用，声明，“赎罪符是渺不足道的”。（第六十八条）而对那些任意吹嘘夸大赎罪符功效的人，如“在群众中流行的主教们、教士们、神学家们，应加以问罪。”（第八十条）

在论及用出售赎罪符所得的钱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时，路德愤怒地质问道：“今天的教皇，比最富足的人还要富足，为什么不用他自己的钱来兴建教堂，而要动用可怜而贫穷的信徒们的钱呢？”（第八十六条）

路德的上司、勃兰登堡主教根本没有发现论纲中有什么非天主教的论调，而美因茨的阿尔西布雷特大主教则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路德论纲的发表，很可能彻底破坏赎罪符的营生，所以他必须反对奥古斯丁派，但又不敢得罪比自己强大的奥古斯丁教团，于是秘密地报告罗马教廷。罗马教廷企图通过奥古斯丁教团总管来劝路德收回论纲，但失败了。此后，罗马教廷又想通过智者腓特烈来反对路德，也失败了。

罗马教廷的反应晚了一步。路德这个论纲实质上是向教皇发出的一份挑战书，是对教会

教皇权威的一种否定。当时，德意志如同坐在火山口上，阶级矛盾很尖锐，随时有可能爆发，而罗马教廷在此时已成为全德意志的众矢之的。95 条论纲，如同向全德放出的闪电与惊雷，起了导火索一样作用，一时间，整个德意志沸腾了，整个民族加入了这场斗争中去。

对罗马天主教会不满的德意志各阶层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解释这个论纲，都要寻找论纲中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虽然这实际上不是作者所指的东西。农民和城市平民把它看成是起义的信号，认为同一切压迫者斗争的时刻到了；市民阶级渴求建立廉俭教会和统一德意志；贵族和诸侯则力图摆脱罗马的羁绊和夺取教会的财产。论纲成了各阶层人的共同纲领，路德则成为各种反对派团结的中心。

论纲由于它的共鸣性而飞快地传播于天主教世界。有一个人形容说："四个星期内飞传整个基督教世界，好比天使传送它们一样地飞快。"

路德所写 95 条论纲的始意与结果决不是他所预料的，他并不是宗教改革的自觉发动者。论纲的公布，在德意志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为此惊恐不安，写信给教皇利奥十世说："我匍伏在您脚下，您的声音就是基督的声音，如果我犯罪该死，我甘心赴死。"

1518年初，在法兰克福召开了萨克森多米尼克斯修士会议。特策尔在会上夸夸其谈，并向与会的300多名教士散发了旨在反对路德的106条反论纲。

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异教"的提法。教会过去对萨克森选帝侯关于禁止赎罪买卖的禁令不予理睬，但对路德的论纲不得不做出反应。因为他对赎罪符的批评是以神学为依据，从而危及了教会行使权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1518年3月，路德写了《论赎罪和恩赐》来驳斥特策尔的106条论纲。他说，赎罪符的作用只能免于教会的惩罚，而不是免除上帝的惩罚。

路德以他的论纲向教皇、教会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即向旧制度进攻的信号。恩格斯评论论纲时指出：

"骑士、市民、农民、平民、觊觎主权的诸侯、下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文学界反对

派的布尔勒斯加诙谐作家，各有所谋，纵横交错，但是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起来了。这一切反对派分子仓猝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却一下把运动的惊人力量展示出来，而且把运动飞速推向前进。”

由于路德对罗马教会的威胁，教团总管传达了教皇的命令。于是路德被点名到内卡河畔的小城海德尔堡参加奥古斯丁高级教士会议。

1518 年 5 月，特策尔又把论纲送到了他的门上。这次，他不仅对路德，而且对他的保护者选帝侯也进行了威胁。

路德心中的积怨再也平息不下去了，在《论教皇赎罪和恩赐问题说道的自由》中，他第一次运用战斗性的、形象的语言反击他的敌人。他说：

“这些不了解圣经，既不懂拉丁文也不懂德文的人如此卑鄙透顶地骂我，使我觉得，仿佛一头蠢驴在向我喊叫。”

这一时期，选帝侯又一次表示对路德的保护。这一切，对路德影响很大。

1518 年 5 月，路德在对教会赎罪权作出

攻击后，又对教会的革出教会权再次进行攻击。革出教会是除了赎罪权外教会的另一重要的手段。罗马教廷有权决定拯救灵魂还是把它永远地打入地狱。这项权力与赎罪权一样可怕，因为它影响到来世。

关于革出教会，路德在布道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被革出教会后是否就脱离了上帝？路德的回答是：基督徒根本不可能因被革出教门而与基督以及永恒的幸福无关。

路德这一论断又一次对教会权威提出实质性的挑战，它完全否定了教会及教皇有权把人们打入地狱的说法。多米尼克斯会修道士反应迅速，他们就路德的文章炮制了一个论纲，并声称这个论纲的起草人是路德，把它寄给了总管卡叶坦。

一个月以后，多米尼克斯修士会修道士普里里亚斯——信仰问题方面的专家，在罗马起草了一份关于路德的鉴定。他的唯一根据是多米尼斯会的倾向性报告及路德的95条论纲。鉴定书声称：95条论纲是错误的、荒谬的、傲慢的、异端的。

路德这时还幻想教皇利奥十世是个好教

皇，会给他以支持。

但是，路德想错了。利奥十世不仅对路德的一切十分反感，而且还是诉讼路德的倡议者之一。

由于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的坚持，教会责令路德在80天之内（自1518年8月7日算起）到罗马，接受革出教廷的审讯。同时，罗马教廷要求选帝侯智者腓特烈交出路德，撤回对路德的保护。

一切迹象表明，路德案要终于结束了。

然而，正当罗马教会准备审讯这个异教徒的时候，德意志政治形势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对此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路德成了高层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时，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继承人问题牵动了整个欧洲王室，各个方面的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加入了这一问题的争论。

马克西米利安于1486年继位，他在其任职内大力推行帝国改革，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于是，马克西米利安千方百计地想让他的孙子查理继位，以保住他的产业。改革的失败使得深刻的危机表面化了。

马克西米利安旨在为哈布斯堡王室谋取利益，它的领地从波希米亚、匈牙利经多瑙河各省、勃艮第、尼德兰、卢森堡、上奥地利、上亚尔萨斯，向南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延伸，最远达西班牙，马克西米利安想在皇权下将这些地区统一起来。

罗马教会不会允许如此庞大的帝国在自己面前出现，与自己对抗。教皇用怀疑的目光观察着皇帝的行动。如果他的孙子查理当了皇帝，那么罗马就会被哈布斯堡的领地包围起来，教皇也会处在哈布斯堡的压力之下。

教皇利奥十世竭力阻止查理登基，即使马克西米利安在路德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也无济于事。

罗马教廷起初支持法国人，不让查理当选皇帝。后来，利奥十世改变主意，他想在德意志选帝侯中物色一个人选，并很快选中了在德意志地位仅次于皇帝的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

萨克森选帝侯近年来聚集了一批人在自己周围，反对皇室，他自己成为头领、带头人。他如掌权，正合乎罗马的口味，因为那将使腓

特烈陷于同法国、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之中，战争也会发生。

罗马所希望的正是这样。

腓特烈既不表示欢迎，也不表示拒绝，却采取了保留态度，利用自己的地位同罗马玩起外交手腕。他再一次提出对路德的保护，罗马教廷让步，决定对路德不给予“法庭”审讯，而是进行“慈父般的”审讯，不再传讯到罗马，而只是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审讯。

由于罗马教廷同意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建议，对路德的第一次严厉攻击取消了。他们不敢得罪这位萨克森选帝侯，他是他们教会阻拦哈布斯堡王朝压力的有力武器，教会无论如何要将他推上德意志皇帝的宝座。

罗马此时只顾及德意志的皇位问题，把路德的反叛早已放置一边，无暇研究这个反叛的僧侣。

路德虽喘了一口气，但不久以后，一场更严峻的斗争来到了。

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在同教会的辩论中大放异彩。教会为之震惊，将他革出教会；世界为之震惊，随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

路德于1518年10月7日来到奥格斯堡，准备接受教皇审问。

当时，选帝侯腓特烈已经离开，他想以此来证明自己与这个叛逆的异教徒无关，但他却留下吕厄尔及弗赖利奇顾问帮助路德。他们一起去求马克西米利安发一份护照给路德。

路德暂时受到寺院的保护。他每天接见来访者，其中有朋友，也有敌人。当然，红衣主教卡叶坦的使者几乎天天来，他们企图软化路德，要他撤回论纲。

路德在友人林克、两个萨克森顾问和几位僧侣的陪同下前去会见红衣主教卡叶坦。他们交谈得很温和，路德后来回忆说：

“他只是进行兄弟般的、慈父般的调解，并且根据教皇的命令，向我提出三点要求：

1. 我要思过，并撤销错误见解；

2. 答应以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

3. 弃绝一切可能使教会混乱不安的事情。”

卡叶坦竭力促使路德收回论纲中的观点，且要他必须承认错误。他对抗的是基督教的最高权威，在这种意义上说，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如果承认自己的错误，罗马则至少可能取消将他革出教会的惩罚。否则的话，如果他真的被革出教会，选帝侯对他的保护能有多久，他自己心中也不知道，选帝侯还得保证给予路德以严厉的惩罚。

这一切威胁，并未使路德，这个伟大的宗教改革战士畏缩、退却，他坚信他心中的上帝的权威。他说：

“上帝的真理也主宰教皇，我既已明了上帝的意思，我不再去问别人。”

路德随时准备与对他的责难进行辩论，但由于他和卡叶坦的意见针锋相对，无法调和，第一次审问结束时，卡叶坦提出要求，路德必须收回自己的观点，承认他的错误。

几天以后，路德经过深思熟虑，在施陶皮

茨、选帝侯顾问的陪同下又来拜见这位红衣主教。首先，路德郑重地声明他忠于教皇。然后，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我还要抗议，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违背圣经、教父、教皇和教会，或者违背良知和公理话，凡我所说的，我都认为完全正确、真实，并且符合天主教教义。"

路德表示，如果在他的论纲中发现半点异端，他将会放弃它。

卡叶坦不愿与路德细谈，他实在找不出论纲中有哪一条违背了圣经及教父的意愿。他又一次以革出教会来威逼路德。那副神态，俨然一个不容置辩的法官，而不是什么慈父。

卡叶坦对路德的态度很生气，他找来了施陶茨与林克，要他们对路德施加影响，促使他收回论纲。但他又一次失败了。

这时，路德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卡叶坦随时可能派人抓住他，押他回罗马。1518 年 10 月 20 日，从罗马下达了奥古斯丁教团总管的命令，要逮捕路德。晚间，路德衣冠不整地骑马逃出奥格斯堡。

路德安全地返回了维腾贝格。路德以大无

畏的战斗精神保卫了自己的学说，置生命、自由于不顾，赢得了这一回合的初步胜利。而万能的罗马教廷却未能达到目的，这位“异教徒”仍然在传播他的思想。

至此，路德知道：他不可能再回头了！而他也不愿回头。他呼吁撇开教皇而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以便对此事做出裁决。他的每一个反击行动都使罗马的地位动摇，一次不可逆转的海啸滚滚而来了。

卡叶坦不甘心失败，写信给选帝侯，要求把路德这个“异教徒”交给罗马，不再对他进行保护。

选帝侯也不愿过份得罪罗马。1518 年 12 月 1 日中午，路德接到通知，要他尽快离开这个曾经给过他保护的国家。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选帝侯又送信要他留下。

这时，从罗马来了一位使者叫卡尔·冯·米尔蒂茨，此人想单独与路德会谈，以便达成罗马满意的结果。

路德应选帝侯的邀请，于 1519 年初来到阿尔腾堡，与米尔蒂茨会晤。米尔蒂茨十分友好，他也觉得路德也并非在罗马听说的那般阴

险、卑劣。经过双方协商，终于达成了君子协定。协定大致内容是：双方都不准采取行动，不再继续就有关内容进行说教和攻击。

米尔蒂茨还建议，他向罗马请求派一名有学问的主教指出路德应该收回的文章及观点。路德很高兴：

“这样一来，我就能认识到错误，我应该而且愿意收回那些错误的东西。”

但是，明智一点儿的人都知道，罗马不会同意这项协定。选帝侯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都很高兴，因为争取了时间。

米尔蒂茨同时指责了正在罗马的特策尔的罪行，因为他贪污了大批款项。特策尔受到了批判。路德写信给他安慰道：

“我不追究赎罪商贩，因为这与老特策尔无关，与美因茨的阿尔布雷希特无关。教皇，只有教皇，才是真正的罪人。由于他要钱，那个美因茨人才被驱使去做买卖。”

路德这时的矛盾已由商贩直接转为教皇，他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

罗马教廷正在为米尔蒂茨的行为大为恼火时，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于1519年1月12日

死去了，使罗马不得不把路德暂时放在一边。

路德此时名声斐然，各地的大学生纷纷来到维滕贝格大学，他们想知道路德的思想。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生于哈尔茨山区施托尔贝格的年轻人，他就是几年后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闵采尔在这里仔细听取了路德的报告，后来被人骂为“路德分子”。

路德的影响越来越使罗马震惊。因此戈尔施塔特的埃克教授首先向路德提出挑战要求，与路德辩论。

辩论地点开始选在莱比锡，但由于莱比锡大学和校长的一致反对，改在普莱森堡，在格奥尔格公爵的保护下进行。

格奥尔格·冯·萨克森之所以主持这场辩论，是因为他估计埃克可以战胜路德。此人在路德问题上属于强硬派，力主通过论战击败路德，免除其对罗马的威胁。这样，格奥尔格就会通过击败路德这个异教徒（路德如败，必然会被判为“异教徒”）而降低腓特烈的声望，揭露腓特烈的所做所为，使自己在选帝侯中处于有利地位。

1519年6月26日，双方商妥辩论原则。27日，辩论正式开始。首先是埃克同卡尔施塔特进行论战。埃克侃侃而谈，卡尔施塔特不是对手。

1519年7月4日，路德登上辩论台，情况大不一样。路德的话博得了在场人的阵阵掌声，其中就有闵采尔。

他们首先争论赎罪符问题，随即又谈到教会与教皇。埃克强调教皇至上，教会从无错误。路德则否认教皇来源于上帝，认为没有教皇，教会仍可存在。

埃克指责路德的观点与“波希米亚观点(即胡斯观点)”相近。路德则反驳说：

“是的，在胡斯和胡斯派文章中，有许多真正基督和福音的语言。”

他接着肯定说：“教会对这些话根本无法谴责。”

埃克寸步不让，立即反击道：

“那么您认为，那次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判定胡斯为异教徒是错的了？所有修道院院长、主教、红衣主教，连同教皇都错了吗?”

胡斯是格奥尔格和许多萨克森贵族的敌

人，这使他们公开支持埃克。对于莱比锡人来说，埃克是这场论战的胜利者，他们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来庆祝这场胜利。

但是，这种胜利并未取得一致承认。作为裁决的埃尔福特大学拒绝承认埃克是胜利者，广大有教养的人士的反应也表明，人们宁愿支持路德。

路德回到维滕贝格后，研究了胡斯的文章，并说：

“我已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讲解了胡斯学说，施陶皮茨也是如此。不知不觉中，大家都是胡斯派。”

路德此时已真正地支持胡斯，这个被教会处以火刑的异教徒。

路德在把胡斯的作品研究了以后，感到应该把他在同埃克辩论时的观点做出科学解释和论证。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必须转入反攻。

莱比锡辩论后，路德结识了这一时期的另一位伟大人物——乌尔里希·冯·胡登。胡登是位人文主义者、作家和骑士。他写信给路德道：

“多么伟大！啊，路德，你是多么伟大。如

果这是真的话，坚强吧！……请你无论如何把我当做助手吧！这样你就可以把你所有的计划交给我去执行。我们愿为共同的自由而斗争，我们想把我们长期受奴役的祖国解出来。上帝站在我们这边，上帝祝福我们，谁还能反对我们呢？”

胡登是低级贵族阶层，在德意志面临重大改革的关头，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对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很感兴趣。

路德通过胡登与帝国骑士建立了联系，把他们视为同盟者。路德的要求是代表市民阶层的，在很多方面与骑士的要求一致。他们共同的基础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仇恨。骑士希望把教会财产交公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他们共同的敌人——罗马教会将市民与骑士联系在一起。

当时正在开展的三方面改革运动——宗教改革、社会改革与民族改革当中，胡登最感兴趣的是民族改革，他不关心路德的神学。而路德也不关心胡登的民族意识。

在胡登的影响下，路德在莱比锡辩论后态

度更加坚定，他准备迎接来自教会的一切挑战。

《致德意志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徒的自由》三部伟大的改革著作成为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重要文献。路德倡导的改革运动也由此进入高潮。

虽然路德在公布95条论纲后与教会妥协过，但经过奥格斯堡审判与莱比锡辩论，路德逐渐认识到：在同腐败的罗马教会斗争的问题上，妥协是危险的。以埃克为代表的罗马教会中的强硬派欲置路德于死地而后快。

路德看到，他越是坚决、强硬，就越会受到人民，尤其是手中拥有很强实力的众多诸侯的支持。在莱比锡辩论会后，路德毅然走上了同罗马教皇决裂的道路，不再伏在他的脚下乞求怜悯了。

1520年2月，路德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用剑，你别用笔。上帝的语言就是剑，就

是战争、改革。”

1520 年 3 月，路德发表了《论美好的事业》一文。文章中，路德不再区分世俗行为与宗教行为。他说，在上帝面前出自正确思想所做的一切，都为上帝所喜悦。他推翻了天主教的行为神圣论作为每个人道德规范的教会准则。路德认为：教会和社会上当作准则的东西，究竟正确与否，还得听凭良知来识别。

路德要求废除行为神圣论，解释了圣事的相对性，使许多受高俸的神职失去了根据。

同时，路德也对教会权力的滥用施以猛烈的攻击。他号召国王、诸侯、城市和信徒团体都必须反对主教及僧侣。

时隔三个月，路德就教会是什么的问题发表了《罗马教廷反对莱比锡的非常著名的罗马法学家》一文。路德认为，按圣经记载，教会并不是肉体的集合，而是信徒的集体。它不需要人作为首领，因为它由基督以上帝的话来治理。而同时又指出现行的宗教制度是反基督、反上帝的。

多米尼克斯会修道士写文章评论路德在莱比锡的讲话。这位修道士名叫普里里亚斯，

他厚颜无耻地为教皇辩论：

“一个按法律产生的教皇既使糟到人民成群地引向魔鬼的地步，也不能由全世界来罢免和定罪，更何况宗教会议。”

路德运用他心中的热情与学识，迅速地写文章反击这位旧世界的肮脏卫道士，并且在他的思想中第一次提到了使用暴力。锋芒之锐利，不仅使教会教皇，就是他自己也感到惊诧与震动。他说：

“我们既然用刀剑和绞刑架来惩治盗贼，用烈火处死异教徒，为什么不用刀剑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这些伤风败俗、不为人师表的罗马的所有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以便把我们这些人从万恶的火坑中救出来呢？”

1520年8月，路德发表了《致德意志贵族书》一文，它是路德的政治纲领，是16世纪德意志独立的号角。

路德认为，罗马教廷在罗马周围建筑了三堵墙来保护自己，对抗改革。第一堵墙，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任何人不得要求教会对此作出说明与解释；第二堵墙，只有教皇才有解

释圣经的权力；第三堵墙，只有教皇才有权召开宗教会议，宗教会议后，任何要求都不会被理睬。

路德面对罗马教会的三堵保护墙，发出了强有力的冲击。罗马教廷声称，只有教皇、主教、神父等神职人员才属于所谓“属灵等级”，应该高于世俗等级之上。路德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世俗权力乃是上帝所授予，它同样是“属灵等级”。路德接着又说：世俗权力有权过问教会事务。

正如此书的书名一样，路德的这些主张深得诸侯贵族们喜爱，他们想反抗罗马教会的压迫愿望已经久矣！

针对罗马教会的第二堵保护墙，路德提出与教会相反的看法：所有基督徒都应是“属灵等级”，一般信徒一经洗礼，也就成了神父，任何虔诚的基督徒都可以根据信仰解释圣经，而不仅仅是教皇有这一权利。

针对第三堵墙，路德呼吁德意志皇帝应效仿君士坦丁大帝，也有权召开宗教会议。路德曾在莱比锡号召否定宗教会议的不可缺少性，而在这篇文章中又提出召开宗教会议，这并不

矛盾。路德这时设想的不是一次旧的宗教会议，而是号召召开一次德意志的民族大会，如果人们愿意，可以是一次帝国议会。

接着，他呼吁德意志贵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教皇，解放德国。他要求，“教皇须交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产、荣誉、身体以及灵魂。教皇必须让皇权成为名符其实的皇权。”在这里，他明显地提出了教权不得干涉俗权的想法，世俗的权力应给予充分的发展。德意志的皇权应该为德意志的人民谋利，而不是忠诚于罗马教会，这是世俗权力的一次强有力的挑战。他同时还呼吁建立脱离罗马教会的德意志教会，结束罗马教皇任命德意志主教的历史，教会中的神职应由德意人自己来担任。德国教会不再向罗马教会交纳金钱。这种独立的教会正是德意志全民族即贵族、市民、平民、农民共同的利益所在，它是统一德意志的一个前奏、一个号角、一次强有力的行动。

路德又提出了改革教会的建议：取消朝觐罗马的活动；取缔托钵僧团；允许神职人员婚配；禁止出售赎罪符；简化弥撒仪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教会节日。

路德在此文中大加赞美查理五世是“高贵品质”的“领袖”，会产生“新希望”。他又说：“世俗权力是受上帝的委任来惩治奸邪、保护善良的。”

他要倒在贵族一边已很明显，但他却在文章中对贵族与教士的不劳而食大肆攻击。他解释了新的劳动道德，“谁想穷，就不应富；如果想富，就要用手去扶犁，自己到地里去寻找……”不劳而富，是路德不能忍受的。

《致德意志贵族书》一文在路德的改革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此，路德的神学方案变成了实际政治，他以此作为新社会建立的纲领。

这本书引起了德意志全社会各阶层人的兴趣，它符合几乎所有阶层的利益，印刷4000份转眼间销售一空。正在争取独立诸侯和低级贵族希望占有教堂财产；市民看到从阻碍自己发展的教会中解放出来的时刻已到；尤其是农民，他们难以忍受教会的捐税，希望选举自己的牧师。

路德的文章引起了强大的回响，人们从各自的利益[illegible]发，准备与罗马教会一决高下[illegible]格

奥尔格公爵，这位昔日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

“所说的并非都不真实，所揭露也并非都不必要，如果没有人敢说教会的坏话，如果每个人必须保持沉默，那么石头也终究会说话的。”

来自敌方的称颂，更使路德的魅力大增。

路德的文章是用德文写成的，文章粗犷、优美，人人都表示赞同，表示对他的支持。不论上层贵族、中层市民，还是下层平民、农民，无不为路德的改革而欢呼、跳跃。

德意志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宗教改革运动。

正当德意民族沉浸在《致德意志贵族书》那些战斗性的语言的时候，路德的另一篇重要改革文章发表了。

《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一文是路德用拉丁文写成的一本为学者们阅读的著作，主要就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罗马教会的7项圣事之中，只有3项来源于圣经，即洗礼、圣餐和忏悔。而这3项圣事也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被歪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事了。

路德主张取消神职人员在圣餐中的特权。罗马教廷规定：神父可以领受“圣饼”和“圣杯”，一般信徒只能领食“圣饼”。路德认为这项规定违背圣经的内容。他引证耶稣所说的话“你们都喝这个”一语来反击罗马，尖锐地指出教会不应剥夺一般信徒在弥撒中饮酒的权利。“正如教会无权拿去一般信徒的圣饼一样，教会也无权撤去一般信徒的圣杯。”一般信徒领受“圣饼”与“圣杯”拥有与神职人员一样的权利。这项要求本来是胡斯提出来的，胡斯部队的旗帜上就有圣杯。俗人圣杯，是信徒平等的标志。路德要求在圣餐中的平等权，也就是要求取消神职人员的特权。

路德同样就圣弥撒的庆典一事对罗马教会进行攻击。他说，这种庆典原本并不是献祭仪式，而仅是基督的许诺，是一种对信仰的要求而已。为此，用捐献等办法和利用弥撒来赎罪是不正确的，过去和现在在教会为死者灵魂所做的一切弥撒都是无效的、违反圣经的。

路德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将罗马教会的7项“圣礼”减为两项，于7项圣礼（洗礼、坚信礼、认罪礼、圣餐礼、敷油礼、封立礼和成

亲礼)留下洗礼和圣餐礼两项。至于其他5项，在圣经中找不到依据，应当废弃。

十分有趣的是，路德主张僧侣可以婚配。他的这一建议引起了广大低级僧侣的极大兴趣，纷纷支持路德。

1059年，罗马教会制订了关于僧侣独身的法律。结果恰恰相反，修道院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修士费尽手段勾引良家妇女。最可笑的是，生孩子最多的修女往往就是修道院院长。至于神父、主教等高级神职人员更是嫖娼纳妾，教皇宫廷居然举行妓女的裸体大型舞会。为了妻女的安全，农民拒绝接受没有固定姘妇的新任神父。针对这种现象，路德提出僧侣有权婚配。当时，主教、神父家里可以雇佣一名女仆操持家务，路德讽刺道：既然让一对独身男女共处一室，要禁止他们犯奸，这好比“把干柴与烈火放在一起还要禁止它冒烟着火，真是自欺欺人。”路德说：

“与其听任他们私下通奸，伤风败俗，还不如准其名正言顺地婚配。”

在路德的主张鼓舞下，一大批修士、修女纷纷还俗。

《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动摇了罗马教会的精神基础，发展了路德在95条论纲中提出的神学思想，建立了使进一步地实行变化得以实现的在神学领域的基础。

所有的人都懂得，路德与罗马公开决裂了，不可能再有任何调和的可能，因为路德攻击了罗马天主教的教条。

路德把弥撒解释为许诺，而不是献祭，把受俸职的根据撤去了，触及了这些人的生活基础，他们愤而反击这个萨克森的僧侣。

1520年10月，路德又发表了一篇在基督世界发聋振聩的作品——《论基督的自由》。

这本书被新基督徒奉为经典之作，书中着重阐述了"因信称义"的信条。这种新的虔诚理想，使信徒们摆脱了罗马当权者在精神上对于信徒的监护。罗马，已不再是圣地，它失去了对信徒的控制能力。

路德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与天主教不同的新教义。"因信称义"与天主教"因行称义"的教条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罗马教会的"因行称义"是说依靠人的苦功、善行这些外部活动，来表示对上帝的虔诚之心，祈求上帝

的恩赦，最后成为符合上帝意愿的“义人”。路德批评了罗马教会的观点。他说，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纯系心灵的信仰。只要你对上帝是虔诚的、纯真的，那么上帝也会在你心中。人的得救是他自己的事，任何外在的东西，如宗教仪式以及神职人员都是多余的，事实上根本不需要中介。而信徒与上帝发生联系的地方，任何人均不得插足其间。这就是路德的“信心”的基本内容。

路德还指出：信心是善行之本，基督徒只要依赖信心就可以博得上帝的喜爱，并能受到上帝之道的启示，这样才能约束自己，从善去恶。

他说，每个信徒都可以阅读并解释圣经。这对天主教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路德这篇文章十分重要，它否定了宗教礼法和宗教法律，否定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否定了等级森严的宗教礼法和宗教制度。路德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要求平等的思想，倡导了符合市民利益的宗教信仰自由与个性解放学说，为世俗事务不为教权插手与世俗权力插手教会事务找到了理论

根据。

在这本书中，路德的局限性也一再表现出来。“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锁链。”①

“因信称义”是路德新宗教的纲领，是反对旧宗教的武器，它也是一切宗教引导人们寻求“解放”的共同方式。

路德这一时期内思想发展很快。1518～1520年，路德给罗马教皇写了3封信。他于第一封信（1518年5月）里，还谦卑地自称是“教皇顺命的儿子”，称教皇为“仁慈的父”、“基督的使者”。但在第二封信里（1519年3月），他称自己是教皇的“卑顺的臣民”，但向教皇表示决不能昧着良心收回自己的主张。而在第三封信（1520年）里，他却一改往日的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恭，大胆地表示他与教皇是平等的，并以尖刻的语调揭露了罗马教会的罪恶。

路德由于发表了改革文献而成为反抗罗马天主教的精神领袖。这场运动由帝国各个等级中的反对派组成，由统治阶级及人民群众中的改革运动分子组成。由于参加这场运动的各阶级的目的主要是遏制罗马教会的影响，使教会服务于自己的阶级，所以，这场运动从不同的各阶级利益出发，很容易中途而废。

路德的学说超出了德意志，欧洲的封建主有可能与市民联合起来去攻击这个远在罗马的权力中心。

由小市民、农民、短工、手工业者和神职人员组成的人民改革运动，声势浩大，不易瓦解。

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地上掀起来了。

埃克在莱比锡辩论后匆匆赶回罗马，极力促进事态发展，以便阻挠卡叶坦同红衣主教、神学家、僧侣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经长期谈判后制订的计划。他们由于受埃克的阻挠，没有公布这个比较宽容的计划。他们同时警告埃克，

不要仓促行事。

1520 年 5 月 2 日，埃克将路德革出教会的命令的草稿呈递给教皇利奥十世。

6 月 16 日，教皇办公厅缮具并刊印了通谕，由埃克带到德意志，于 9 月正式颁布。

这道革出教会令列举了路德的所谓 41 条罪状，“起来，主啊，整理你的行李……因为出现狐狸，它要把你的葡萄园化为荒地。森林里走出的野猪，也要践踏你的葡萄园。”他们将路德诬为一只践踏上帝葡萄园的狐狸，宣布处以“绝罚”：革出教门，焚毁他的全部著作。

但是，教皇为了树立自己的尊严，迫使路德就范，恩威并施，既给予他革出教令的处罚，同时又在绝罚诏（革出教令）中附上六十天的恩赦期。如果路德可以六十天内悔悟，那么仍可恢复教籍；如果路德一意孤行、执迷不悟，那就将永远开除其教籍，定为“异端者”。不久，教皇又制定了惩治异端者条例，遍告各地信徒知道。

路德的主张在人民中究竟起到了什么重大作用，教皇或许并不知晓。他发布的革出教令刚一贴在教堂门上，人民便将它揭去，阻

止它的公布。

萨克森选侯在此时公然抗拒罗马的命令。教皇代表催促萨克森选侯立即执行教皇的革出教会法令，逮捕路德，烧毁他的著作，甚至还胁迫他说，如果不遵守罗马的命令，将把贵国当做为东方异教徒国家处理。这一切并未使萨克森选侯屈服，反而语意坚定地回答教皇的使者道：

“我以为，路德应当受到公正的裁判：他仍然可以传教、出书。”

德意志的其他侯爵等封建贵族，都在观察事态的发展，而不敢冒然与罗马相对。但是，广大人民和萨克森选侯的大力支持，已经使路德激动万分，并且愈加坚定——他的后面是一个强大的革命力量，他没有与罗马作斗争的后顾之忧。

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同罗马关系较好，他下了一道圣旨，允许在他的勃艮第世袭领地焚烧路德的作品。在这个时代，焚烧著作也是一种显示权力的方式。在列日、科隆、卢万、美因茨，路德的著作被抛入了熊熊大火。

路德的著作在广大人民群众早已引起了

巨大的影响。在科隆焚书时，烧的全是路德论敌的著作，而路德的著作却完好无损；在鲁文城大学生焚烧的书籍里面，教皇门徒的文集竟多于路德的著作。但是，教皇的使者却向教皇汇报说：

“这种场面可使百姓改过归善。”

路德，这位伟大的反封建的宗教改革斗士，不屈不挠。他认为，不屈从于撒旦的代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精神。他对教皇的行径极端愤怒，他在取得了弗莱德列克选侯的默许后，于12月毅然对罗马教会施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打击措施。

路德撰写了《反对反基督者的诏书》一文，文中他称教皇是“反基督者”，这无异于把“异端者”的帽子又回敬给了教皇。反基督的人一定是异端者。同时，他呼吁德皇没收帝国境内的教会财产。

1520年12月14日，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门上张贴了一张用拉丁文写的告示：“所有坚持福音的人今天早晨9时在本城门前圣十字小教堂集合，那里将按圣徒的古老习惯焚烧不信上帝的教皇法典和经院神学家著作。这是

因为，福音的敌人已经开始行动，烧毁了路德虔诚的福音书。来吧！虔诚的年轻的大学生们，来当这次神圣的、上帝喜爱的戏剧的见证人吧！因为现在是反基督分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刻了。”

届时，数百名大学生和硕士生聚集在广场上。路德当众把教皇的诏令和教会法典一同抛入大火之中，并说道：

“这些诏令使神都感到忧心，所以应该把它化为灰烬。”

他又诅咒教皇说：“你利奥十世为什么要连累主的信徒呢？愿永远也不熄灭的火吞噬你！”

他将经院哲学著作也一同抛入大火。

焚烧宗教法典和革出教会令，不是一般的敌对行动，它标志路德与罗马教会在根本上处于敌我双方的战斗状态。一位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写信给他说：

“一切都在响应你们那里的行动，现在不是罗马阵线动摇，就是萨克森阵线动摇。”

焚烧宗教法典，就是攻击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也就是攻击现行制度。

路德焚烧教皇诏书及宗教法典一事，在当时具有十分巨大的震动作用。罗马再也不指望路德能"悔过自新"了，再也不给这位罗马的叛逆任何悔过的机会了。终于，1521年1月3日挂出了对他的革出教会令。

德意志人民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后来在当年焚书的地方种上了一棵橡树。

"只要我还不曾被圣经或清晰的理性驳倒，我就不能，也不愿撤回任何话。"路德再一次面对考验。这一次他面对的不是罗马，而是世俗封建主的代表——查理五世。

1521年1月，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把帝国各等级人士召至沃尔姆斯，准备举行盛大的帝国首届议会。来到这里的不仅有上层社会的诸侯、伯爵，也有低级贵族，甚至还有手工艺人。尽管查理五世将沃尔姆斯装扮得歌舞升平，但帝国境内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使这个帝国并不平静。

此时，西班牙发生了“城市起义”，与法王弗兰西斯一世的战斗又迫在眉睫。这些都使查理五世需要罗马的支持。路德是他手中与罗马交换的王牌。

路德的改革思想已经极大地震撼了沃尔姆斯人的心灵，他的文章在沃尔姆竟相传阅，他的像一抢而空。

教皇派去沃尔姆斯的使节阿连德每日心神不宁地呆在这个城市中。他说：

“9/10的人叫喊着拥护路德，剩下的1/10的沃尔姆斯人，既使偶而不喜欢路德，也高喊着消灭罗马教廷的口号。”

教皇使者在沃尔姆斯十分活跃，千方百计地要促成对路德的惩罚。但由于查理五世和罗马还没有建立起联盟，故进展不快。到1521年2月，查理五世与教皇的联盟已基本形成，他开始打出手中的牌——清除罗马讨厌的异教徒马丁·路德。

查理五世选为皇帝之时曾对各路诸侯有诺言，即没有选帝的参谏，不做任何重大决定，没有选帝侯的同意，不缔结任何联盟。他与罗马的联盟也必须征得选帝侯的同意才行。

在沃尔姆斯大会上，有3个利益不同的集团要消灭路德及其发动的运动。这3个集团是皇室及皇室代表、高级宗教诸侯、罗马方面的代表。3个集团的一致要求是，必须防止危及统治权力的社会动乱。因此这3个集团人士主张把路德传讯至沃尔姆斯。他们说，广大人民支持路德，如果不听路德申辩就判决他是不明智的愚昧行为，这样做的后果谁也不敢设想。

3月26日，查理五世发出诏令，命令路德于21天内赶到沃尔姆斯，准许他在会上为自己辩护或表示悔改。

但是，路德的许多观点已经改变。1520年，他在回答普里里亚斯时还呼吁世俗官员彻底消灭罗马教廷。但到了1521年1月，在他给胡登的一封信中却说：

“我不愿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持福音。世界是靠语音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语言来维持，靠语言来复兴的。反基督的人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不需要用暴力而消亡。”

路德此时已不像1520那样斗志昂扬了，他对教会只主张用语言，而不再主张用暴力来消灭它了。

路德于1521年4月2日启程，奔赴沃尔姆斯。临行，不少朋友劝他不要重演百年前胡斯的悲剧，教会根本不会跟他讲道理，劝他不要前往。路德却说：

“我一定要到沃尔姆斯去，胡斯虽然被烧死了，而他传播的真理并没有一起被大火烧掉。”

他强调自己的观点：

“纵使大火弥漫了从威丁堡至沃尔姆斯的天空，我因主的大名还是要去。我一定要在虎口里，在他们的牙齿中间坚持基督的真理。”

在群众的护送下，路德于4月16日清晨安全抵达沃尔姆斯。

正在吃早饭的人们听说他到了，纷纷上街看路德，沃尔姆斯7000居民中共有2000多人出来看路德，他引起的轰动超过了皇帝查理五世与其他任何一位诸侯。

17日下午，路德被召到帝国会议大厅。大厅中各级诸侯早已就座，路德面对如此庄严的场面，心情有些紧张，连说话声音全变了。

教务裁判官约翰·冯·埃肯指着桌子上的书问道：

“这些书都是你写的吗？”

路德说：

“请列举书名。”

教务裁判官便每本书都念了书名，立即问：

“这是你写的吗？”

回答说：

“是！”

裁判官马上又问：

“关于书中的主张，你现在是打算放弃，还是继续坚持？”

每当问及这个问题时，路德总是吞吞吐吐，回答不出，他最后要求道：

“这是关于天主的道，关于信仰与灵魂得救的问题，天地间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了。我们必须郑重其事，我不深思熟虑，决不敢轻率作答。请给予少许时间考虑。”

查理五世与众诸侯商量了一下，最后允许他24小时以内作出答复。

路德回到住处，这一夜几乎彻夜未眠。来访问他的人一个接一个，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帮助路德

鼓励路德。胡登来信鼓励地说：

“坚强起来，你瞧，一种什么样的转折要靠你来实现。”

路德对于自己此时的处境十分了解，随时可能发生胡斯一样的灭顶之灾。但他也深知道，只有勇往直前，与教皇和德皇作不调和的斗争，才会不负众望，才会赢得他们的支持；假若畏而不前、卑躬屈膝，他的名声一定付诸流水，性命更无一人为他担保。只有迎接德皇的挑战，才有可能保全自己。

第二天下午6时，大会开始。这次参加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前一天，有不少诸侯都得站着开会。沃尔姆斯人要看一看他们心中的伟大人物路德是如何抗击强暴的。

路德站在大厅中央，身着黑色僧服，苍白的脸上略带几分疲倦、几分忧虑。教务裁判官认为稳操胜券，逼问路德道：

“你已经仔细思考过了，是否愿意收回你的观点？”

路德开始讲话了，他的话不徐不疾，既不生硬，更不卑躬屈膝。他声明：

“我的书籍不止一类，原有三种，若将它

们一同看待是不公平的。至于说它们中的观点有什么错误，则希望依据圣经给予指明。如能这样，我就立即收回，并将其投入火中。”

查理不懂高地德语(德语分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两种方言)，要路德用拉丁语重复一遍。最后，他表示厌倦了路德的演讲，要求路德用简单的话表示：愿意收回，还是继续坚持。

路德此时已不再对查理及教皇害怕了，他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义正词严地作了简要回答：

“我不相信教皇及大公会议，我的天良全系于天主的道，我的信念均来自于圣经。只要我还不曾被圣经上的文字或明晰的理性驳倒的时候，我就不能收回我的任何话，因为违背良心来办事我是办不到的，也是危险的。”

路德讲完后，面带虔诚地表示：“我站在这里，誓不移志，坚持自己的观点，决无反悔！天主默助我，阿门！”

路德的话刚一说完，全场哗然，许多人大叫：

“扔进火里！扔进火里！”

查理五世心中十分愤恨路德，但当他看到

激动的人群正在骚动时，却也十二分的害怕，命令带路德下去。

路德回到住处时已经筋疲力尽，但人们还是不断地拥来，称赞他的勇敢。布伦瑞克大公派人送来艾茵贝克出产的上好啤酒，以表示他对路德的敬意。“我如果有千颗头颅全被斩掉，也决不收回前言！”路德用这句话答谢前来慰问的人民。

沃尔姆斯成了不夜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准备保护路德。次日早晨，市政厅墙上贴了一张布告，400 名骑士对罗马的支持者和美因茨表示了强烈的敌意。他们决不会置路德于不顾，他们决不会听任有人压制神权和尊严。并声明，如果事态发展下去，他们将同系带鞋会联合起来。

系带鞋是农民起义组织。骑士的这张告示使查理与美因茨大主教很害怕。如果判处路德，动乱势不可免。查理无奈，只得作出让步，又给路德 3 天回心转意的时间。

查理 3 天后又对路德进行了审讯。然而，这次审讯仍然毫无结果。

查理最后逼迫路德离开。

沃尔姆斯事件使路德在德意志人民的地位空前提高。人们亲眼看到一个普通的僧侣顶住了皇帝和基督教当权人物，而且将他们驳得哑口无言，只是一味地用权力威逼。这表现出罗马教会多么地腐败，同它进行斗争非常必要。

1521 年 5 月 8 日，教皇同查理已达成协议：查理帮助教皇制裁罗马的反叛路德；教皇支持查理在意大利反对法王弗兰西斯一世的斗争。

查理虽然年纪不大，但却十分狡猾。他知道路德的后面有强大的德国人民，不敢贸然行动，以防引起事端。但对教皇又要有所表示，就于 5 月 8 日颁布了“帝国法外令”。命令说：“德皇给路德 20 天的恩赦期，限其在 20 天内投案自首。20 天以后，任何人不准给路德以任何帮助，否则严惩。”

路德在沃尔姆斯表现出了坚强的斗志，拒绝把自己的观点收回，确是把生死置于度外了。因为路德知道：收回自己的观点就意味着失败，背叛上帝。而失败会使宗教改革运动再也无法振作起来了。

路德在胡斯的感召下，与世俗权力、宗教权力同时对抗，并根据信仰，击败了自己的对手。他认为，收回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是反上帝的，是侮辱自己的人格的。

路德在沃尔姆斯事件中的成功，一方面确系他的巨大勇气和出自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从农民到市民的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来自诸侯和骑士的支持，路德与胡斯必将是同一个命运——被定为异教徒，然后处死。

沃尔姆斯事件后，反罗马的政治运动逐渐变得严重起来。一部分人害怕与罗马公开决裂，小心翼翼地退了下来；另一部分人，而且是大部分，要求实现前几年提出的要求，推动着运动向更高、更深入的层次发展。

反对罗马的联合阵营在沃尔姆斯事件后逐渐分裂为3个政治宗教集团：市民温和派、市民激进派、农民平民派。后者形成缓慢，但前面两派在事件后很快就开始行动了。

但是，路德倡导的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攻击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撤消教会机构，则离开寺院的修女和僧侣应当如何安置，

教会的捐献和薪俸应当如何处理，谁来关心穷人、残废人以及青年的教育问题。

联合在反罗马运动中的各派由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必须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造，以便促成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的面貌的形成。

路德以改革罗马教会而发动的这场运动，发展成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的革命对象首先指向了罗马教皇，他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的中心，随后又把革命矛头对准了世俗封建主。革命的规模一步步地扩大，革命的性质也一步步地深入。

1521年5月4日，路德自沃尔姆斯返回威丁堡的途中，突然被"绑架"而去。

路德在结束沃尔姆斯辩论后，于当天同阿姆斯多夫、佩茨施泰纳一起返回威丁堡。

在没离开沃尔姆斯时，萨克森选帝侯的顾问就通知路德，要他躲避一段时间。他说，一

旦帝国作出对路德的判决，选帝侯就再也没有办法保护路德了，于是想出了这个办法。其实，萨克森选帝侯不仅要保护路德，当教皇与查理向他要人时，他当然交不出一个“失踪”的人；要路德隐蔽起来的最重要原因，是选帝侯要使激昂的群众失去偶像，革命运动自然会衰退，选帝侯害怕人民革命。

路德同意了他的建议。路德在给维滕贝格的朋友写信时写道：“我要躲藏起来，自己也不知要躲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必须暂时忍让和沉默。”

一切计划订好以后，路德开始启程。头半个月，朝行夜宿，一路无事。在爱森纳赫的旅店中，他收到一张小便条：为了避免危险的事件发生，必须离开大道。

5月4日下午四、五点，正当路德一伙人在密林中的小道上行走时，从密林中突然窜出一伙蒙面骑士。他们讯问了路德，当路德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后，他们强行把路德架上了马，带进了森林。

路德被绑架了！

当路德被绑架的消息传至沃尔姆斯时，人

们的谣传已经有些笋人听闻。甚至有人说，在一个矿山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也有人说，是罗马教廷派人杀害了他；还人有说，是济金根把他接入自己的城堡，暗中保护起来了。

路德事件不能轻易了结，即使他被绑架了也罢，总得对罗马教皇有个交待。查理宣布了路德不受法律保护的声明，即沃尔姆斯敕令。同时还宣读了教皇的革出教会令。

沃尔姆斯敕令规定，禁止阅读、抄写、印刷、销售、购买路德的著作。并且说，他的一切友人和支持者，以及听他有害的学说的人，都应受到歧视。任何人不得窝藏、赡养或包庇马丁·路德，不得用言语或著作向他提供公开或秘密的支持以及同情。反之，人人有权捉拿路德归案。

但是，查理的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根本没有人实施。路德拥有广大的支持者。

当天夜里11点多路德被绑架他的人带到瓦德堡。瓦德堡是个很偏僻的地方，路德在此隐姓埋名，叫“约尔格尼克”。只有侍奉他的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在瓦德堡期间，路德写了不少文章，有：

《论教皇是否有权禁止忏悔》、《对僧侣誓言的看法》、《诗篇第18篇的注释》、《论对弥撒的滥用》等。

路德隐居瓦德堡，受诸侯保护，是他投向诸侯怀抱的开始。但他决不是由此消极保守，而是一直注视着德国形势的变化，小心地参加宗教改革。

路德《对僧侣誓言的看法》一文发表了，其中揭露了修道院的黑暗。他说，修士和修女大多数是被迫出家，并非出于真诚的对上帝的誓愿；而如果一个修道者的誓愿并不是发自内心，那么，他（她）可以立刻离开修道院，不必为此而勉为其难。许多修女、修士读后十分感动，毅然决然地走出寺院还了俗世。

路德隐蔽在瓦德堡期间，赎罪符商贩又在全国范围内活动了。路德十分气愤，他写信给美因茨大主教，说：

“不要再让穷苦的人民受欺骗和掠夺。要做一个真正的主教，而不是一只食人民血汗的狼。”

他威胁主教说：

“我要将《反对哈雷偶象》发表。”

路德的文章一问世，许多人都很震惊，他还活着！罗马教廷在寻找他，人民也要寻找他，但谁也不知道他究意藏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他活得很自在。

路德在避难期间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他把圣经译成了德文。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人将拉丁文的圣经译成了德文，并且有18种版本，但路德所做的工作与他们不同。他的译文忠实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原文，并尽力使译文通俗化，让众多的下层人读懂。这一工作自1522年至1534年完成，费时达12年之久。

路德的圣经译文不久即风行全国，使他在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中占得了一席之地。通过圣经的翻译，路德在促进德意志语言统一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译本不仅是一种神学上的功绩，而且是一种巨大的创造语言的功绩。

路德在隐蔽期间，维滕贝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发生了改革，这次改革完全是按“纯粹上帝的话”来行动。

在维滕贝格，人们正在以行动来实践路德

的主张。1521 年 11 月 12 日，40 名奥古斯丁僧侣中，有 15 人离开寺院，开始了市民生活。这是改革期间第一批还俗者。此后，各地寺院纷纷有人仿效他们。

12 月 3 日，市内发生了反宗教骚乱。

“我们大学里的一部分人，还有市民中的一些俗人，今天，星期二，一早竟不允许教堂里的神甫象往常那样履行公务，不让做弥撒。”这是市政厅向选帝侯所做报告中说的。

人们身上携带着刀剑，他们把弥撒书搬下来，把神甫从教堂中赶走了。

市政厅下令逮捕了一批参与者，但在信徒们的压力下不久又将他们释放了。选帝侯倡议的在 1 月份召开的奥古斯丁修士会声明，人人都可以离开寺院而不受限制，取消僧侣托钵和献祭。

这样，路德的主张在维滕贝格首先实现了，奥古斯丁修士会承认了路德的学说。

这一时期，僧侣结婚的很多。布尔、约纳斯、卡尔施塔特诸位知名的人士首先打破了宗教的束缚。

卡尔施塔特是路德以前的同事，一同在大

学教书。他在这次运动中成了领袖。路德得知维滕贝格发生的一切，赶到这里，与卡尔施塔特等人举行会晤，他一再咛嘱不要运用武力。然后急忙返回了隐居地瓦德堡。

卡尔施塔特在1521年12月25日，身着世俗衣服在教堂中讲道。他首次将酒递给俗人，并说：

“这杯中装着我的血，是永恒新约的杯。”

他背离了罗马教会圣餐杯只给神甫的旧制度。

维滕贝格人不断地推出新的改革措施，并尝试用新观点来回答调节城市生活的教会问题及社会问题。首先实施的是《公共钱柜制度》。

1522年春天，卡尔施塔特带着妻子来到维滕贝格附近的一个偏僻农村去务农。他要求邻居称他为“安德烈兄弟”。因为每个俗人都可以担任神职，路德曾经坚持过这个观点。

卡尔施塔特不仅自己放弃教学而务农，还要求大学生们也去务农，他认为，再也不必要学习了。

到1522年3月，路德在瓦德堡再也呆不

下去了，动身去维滕贝格。路德的这次行动十分大胆，因为他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随时会有人抓他。而且他要通过他的宿敌萨克森格奥尔格公爵的领地。

到达维滕贝格后，他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确系出于他的思想，没有任何出格行为。于是，他著文支持这些改革者们。

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路德所能想象得到的。由于茨维考人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激进因素。路德看到了这点，认为与他的观点不符，决心进行干涉。他说，决不能用过激行为为帝国政府提供借口来插手萨克森选区，而这场运动需要选帝侯的保护。

路德已经开始向诸侯靠拢了，他的宗教改革，只要求在宗教范围内，而不允许有任何社会改革的痕迹。

3月底，路德的文章《诚恳告诫全体基督徒不要叛乱和激愤》问世。在文中，路德拒绝任何社会改革，认为这是反对上帝设置的政府，也就是反对上帝，绝对不允许。路德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改革思想。

弗兰茨·冯·济金根于1522年夏末召募

了 5000 步兵、1500 百名骑兵，还买到了不少大炮。他要向特里尔进军，讨伐特里尔主教和选帝侯理查德·冯·格赖劳克劳。

"济金根这次进行的战争是骑士阶层发动的一场反对世俗诸侯和宗教诸侯的斗争。他要废除一切诸侯，要将教会主权和产业全部还俗。……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侣的权力均取消，把德国从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大。"

但到第二年（1523 年）4 月份，济金根的起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孤立无援，没有同盟者。他原本可以与市民、农民及改革运动理论家联合，但市民深深领教过贵族，不相信贵族；农民身受贵族惨痛的压迫和虐待，把贵族当成革命对象、自己的死敌，因而也不会与他们联合；而那些改革理论家不是跟着农民走，就是跟市民、诸侯走，也不肯与他们联合。而他们自己，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抬高自己的地位，没有任何好处分给市民与农民。

骑士在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在济金根失败后更是如此。他们日甚一日地依附于诸侯周围。

对于济金根军队的斗争与失败，路德丝毫不表示同情。他不支持骑士阶层，认为因此会破坏他的改革事业，因为如果支持骑士，那就会引起诸侯的不满，以致于会同诸侯决裂。他认为，骑士不是改革中的突击力量，他早已不把希望寄托在诸侯和骑士身上。

路德自来到维滕贝格以后，站在温和市民派一边，必然对违反他思想的济金根的军队持反对态度，而不是支持。

第三章　农民的领袖

正当路德致力于他的宗教改革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德国农民战争正在孕育、爆发。

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不流血的宗教改革，他依附于诸侯的支持，反对与农民的联合，更反对暴力推翻现存的宗教、世俗封建主的统治。但是，正当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并在萨克森的维滕贝格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另一条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了。

它的领导人是托马斯·闵采尔。

16 世纪初，德意志农民深受封建主与罗马教会的压迫，生活极其困苦。1517 年，路德倡导了宗教改革。开始时，农民对它寄予了厚望，希望摆脱这种双重压迫。但是，改革一年年地过去，受惠的只是市民阶级和世俗封建

主，农民被排除在外。路德代表的是市民阶级，不肯与农民阶级联合，也不支持农民的改革要求，他只关心自己阶层的利益，并在斗争中逐渐畏缩，日益向诸侯靠拢。广大的农民阶级只有靠自己来解放自己了。

托马斯·闵采尔是广大农民的第一代表，他是宗教改革时期最勇敢、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开始参加活动时只是一个青年，他死的时候，仍然是一个青年。他是德意志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和思想家。

闵采尔于1490年生于哈尔茨山麓的施托尔贝格。他的家庭是一个铸造钱币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死在施托尔贝格伯爵的绞刑架上。

闵采尔少年时，家庭曾先后迁居埃斯勒本、豪尔勃塔特。1503年闵采尔13岁时，举家迁至克维德林堡，在那里，他上了拉丁文学校。

闵采尔在校时，全国各地的鞋会起义风起云涌。闵采尔亲眼看到了人民的困苦与政府的残暴。各地鞋会的革命传说使闵采尔受到了不小的震动。

1506年，闵采尔16岁，他的名字出现在莱比锡大学的名册上。这时，德意志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他父亲蒙受屈辱而死去这件事时时在目，他看到了下层人民必须忍受某些统治者施加给他们的暴行，但闵采尔幼小心灵中早就种下了憎恨与反抗的种子。

后来，闵采尔在法兰克福大学和美因茨大学专修哲学和神学。他通晓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他读书刻苦，精通圣经。因成绩优异，毕业后获得了神学博士与文科硕士学位。

托马斯·闵采尔在大学期间酷爱文学，他读了不少当时流行的人文主义的作品，并仿效其写作风格而作了一些文章；但他却反对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等人思想过于温和。

闵采尔不同于路德，除了因独立于路德的改革运动中而成为著名的人物之外，他先于路德走上了一条脱离当时的罗马教会并与之相斗争的道路。他比路德更早地认为圣经为教义和知识的唯一源泉。他认为，不论德国的大小教士，还是罗马的最高首脑，在宣传教义和仪表风度方面，都与他在圣经上读到的基督教会的本来面目不同。他的这些观点同路德对罗马

教会及圣经的看法基本一致。

他十分反感胡登仅靠骑士去改革教会的思想，不满于人文主义者只对上层人感兴趣，而对劳动人民冷漠。闵采尔尊敬100年前同教会斗争最后被烧死的捷克英雄胡斯，宣扬了波塔尔派的思想，他一直称贵族为“吸血鬼”。

当闵采尔大学毕业后，他去哈勒教区的拉丁文学校任教。第二年（1514年），又去埃斯勒本城当教师，兼教士。这种生活持续至1515年。他先参加了一个秘密团体，反对德国总主教兼马格德堡主教恩斯特二世。1515年，即他在埃斯勒本附近的弗罗泽任女修道院见习牧师时，他在修道院作弥撒，就不用罗马教会原来的教义了。

不久以后，闵采尔就在不伦瑞克的马蒂尼文科中学当教师。

1517年，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时，闵采尔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他虽只小路德6岁，但他却以路德为师。他十分尊重路德，希望路德在帝国最有势力的诸侯保护下进行宗教改革活动。这样，会比他这样一个毫无地位、且在一个十分仇视革新邦内的人提出改革教

会，要德意志人反抗罗马而争取自由，效果会好得多。

闵采尔在威丁堡、尤特博格等地积极支持路德的主张。闵采尔赶到维滕贝格，想听取路德博士讲道与改革思想。他在维滕贝格呆了一段时间，就前往尤特博格，在那里同弗兰西斯派发生了争执，那些人骂他是“路德分子”。

1519 年 6 月底，闵采尔专程赶到莱比锡大学，旁听了路德与著名神学家埃克的辩论。路德精彩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为能看到路德义正词严地驳斥埃克而自豪、骄傲。

1519 年至 1520 年初，闵采尔在威森发斯的壮第茨修道院专心致志地研究文学。此时的闵采尔接受了中世纪“千年王国”的学说，他的宗教改革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520 年 4 月以前，闵采尔在对罗马教会以及胡斯学说等众多神学和社会问题的看法，虽然同路德有分歧，但他终究还仅仅是在宗教的问题上谈论改革，他自己也是一个热心于改革教会的宗教改革家。

路德对罗马教会的态度，促使闵采尔去研究神学。他不是一般的学者，而是一位专门找

出罗马教会是否权威、圣经是否可信的战士。他从这一点出发，通过研究，很快就证实了他的怀疑。

圣经上的文字日益使他怀疑。他问道：

"难道根据这些文字便可以相信它本身是真实的吗?如果因为基督和使徒们他们自己说他们是神，我们就认为是神，我们不会弄错吗?如果因为他们互相讲述奇迹，我们便相信奇迹，我们不会弄错吗?如果我们因为听到这些故事就相信讲故事的人是神，从而又因为这些讲故事的人是神而认为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我们不会弄错吗?土耳其人不也有一本书吗?他们相信在那本书里读到了上帝的话，坚信那本书里叙述的大量奇迹，如同我们相信新约里面的奇迹一样。现在何以证明他们的教义是假的，而我们的是真的呢?"[①]

闵采尔开始怀疑圣经的真实，也就说他开始走上与路德分手的路。圣经是路德的理论依据，他的一切观点均引证圣经的话。路德忠于圣经，他的改革也是以圣经为依据，改掉那些

---

① 威廉·威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第19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第1版。

不符合圣经的内容。但闵采尔怀疑的恰恰是路德的根基——圣经、上帝。

路德反抗罗马教会，与有形的教会决裂了。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评价的：他是以一种无形的神代替了有形的神。他仍然援引旧教会的某些教义，去反对那些主张将这些也抛弃的改革者们。

闵采尔分析了路德的文章，认为他的观点前后矛盾。路德所依据的教会的残余传统，只是人为的东西罢了，不可能作为改革的依据。路德赋予它们以一种神圣的意义，然而他以前就曾十分鲜明地否认教会是绝对正确的说法，否认圣灵会通过教会说话，教会根本就不能代表圣灵。

路德变了，闵采尔也变了，他不再追随路德而盲目地相信圣经和上帝。他认为：应该理性地理解圣经。

闵采尔开始讨厌当代的神学和基督教。于是，他不久以后便开始研究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作品。

1520 年 4 月，路德等人推荐闵采尔担任茨威考城一个神甫职位。在这里，闵采尔的思

想得到了发展。

这个时期，闵采尔研究了中世纪神秘主义。他主要读的是一些善男信女的故事，这些人自夸说曾见到过神的容颜，并与神交谈过。而神秘主义代表人物是12世纪的卡拉布里亚人约阿希姆修道院院长。

他认识到，宗教改革必然会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民族革命，而这是路德所意识不到的。在宗教改革上，他已不再是路德的学生、支持者，他的思想超出了路德的范围。他说，否认教皇权力、炼狱，取消赦罪、超度以及消除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不能算做完全的改革。要进行改革，必须不受任何人的羁绊，必须全部由上帝真正的信徒组成一个十分纯洁的教会。这个教会由上帝亲自来管理，它才能被赋予圣灵的力量。

这时，他更了解路德的弱点。路德过分抬高信仰的地位，对于实际工作做得太少。对于福音来说，他听任人民陷在旧日的罪恶之中，却又死背圣经来布道，这实际上比罗马教皇的教义更为有害。这种行为更是不可取。

这一切的变化，不是闵采尔一到茨威考就

发生了。闵采尔到达那里的一小段时间内，仍以路德的思想行事，仍然称路德为"尊敬的朋友中的榜样和灯塔。"

"既然路德的信徒们除了挪揄修道士和僧侣外，不愿意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那么他们还是马上收敛起这种勾当好些。"

1520年4月，闵采尔当上了茨威考城一名传教士。在这里，他的思想开始成熟。他真正地走上了领导农民进行革命的道路。

基督教会曾有过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千年王国的设想和期望。这一期望一直激励着基督徒在多少个世纪内寻找千年王国。

闵采尔来到茨威考城的时候，城市中出现了一种狂热的气氛。这种狂热与闵采尔没有关系。城市中的人们普遍不满意基督教的现状，一个幻想派在这个城市中形成了。

这一派鄙弃基督在圣餐中亲临现场、教会仪式以及僧侣。他们更是自得其说，他们直接得到了启示与天国的快乐，并目睹神颜。尽管

有些人打击他们、不信任他们，但他们自己却坚信不移。

这个派别的领导人是织布工人尼克拉斯·施托黑。他仿效基督，在自己周围也聚集了12个信徒与72个弟子。他们在布道中说，世界末日已经为期不远，要消灭一切不虔诚和不敬上帝的人，他们要用血来净化世界，只留下好人的审判。最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目标：只有一种洗礼、一种信仰。

路德和闵采尔都面对这一学说，态度却并不相同。

路德对他们是抵触的。但当他们说明路德自己也有此倾向，路德也承认他们有神灵附体，并且有十分强大的内在力量。只不过这些力量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上帝的敌人——魔鬼撒旦。

闵采尔则相信有预言的天才，不过他不相信茨威考人的预言天职，他对这些人的评价很低。但同时，他对于路德在此事上的态度十分不满，认为两者都不是什么伟大行动。

闵采尔不相信他们自己的预言，却十分愿意与他们来往。他经常来到这些大都是织布工

人和织亚麻工人中间。闵采尔要以他们为核心建立另一个派别。他在布道时称赞尼克拉斯·施托黑。

闵采尔领导他们着手在茨威考城进行改革。他们四处布道，引起了市政会的不满，下令禁止他们布道，闵采尔则主张必须允许他们布道。

工人的集会越来越狂热，终于遭到了市政会的取缔。但闵采尔率领他们秘密集会，继续发布反对市政府与教会的言论，市政会下令将他们中的活跃分子抓住，并投入了监狱。

遭到市政府的镇压以后，这一派在茨威考城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有的人去了维滕贝格，有的人去了波希米亚。闵采尔随同人们去了波希米亚。

在闵采尔他们离开茨威城之前，织工们发动了两次暴乱，但都失败了。1521 年 4 月 21 日，闵采尔的敌人给他编了一首歌谣：

“黄头发，残忍的汉，嗜血成性的杀人犯；疯狂的人，大祸害，小心别叫他瞎捣蛋。”

他们把闵采尔描绘成一个杀人成性的疯子，因为闵采尔不仅反对教会，也反抗世俗封

建主的统治。

他痛恨人民的压迫者，痛恨教会领主与世俗领主。他认为，基督僧侣不过是古代暴政的延续，这种暴政以基督的名义在全世界疯狂地压迫人民。同时又认为世俗领主不让人们实现人间的天国，任意虐待人类，不让人类过人的生活，是人类的敌人。

他觉得，国家应以基督的精神为灵魂，社会的习俗也应以基督教教义去改造，天国法律应变成人的国家法律，在尘世也应如在上帝面前一样，人人平等、自由。

闵采尔不同于路德，他心中的热情象火山一样要迸发，使得他行动、思想上远远比路德更激进。他要成为人民救星的功名心与他的热情汇合成一股激流，狂奔不止。他的身上，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推动着他向前走去。

中世纪神秘主义的思想在闵采尔身上变成了革命行动，但他的行动不是死板教条的，它是来自造福世界的动机。

他来到波希米亚后，用拉丁文与德文发表了一篇宣言。他说，教义和制度与上帝的福音

再也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了，必须消灭它们。最后他喊道：

“我保证你们得到莫大的荣誉，革新使新的教会将在这里创造，并扩展到各地。……如果今天我以活着的上帝的话来进行欺骗，那么我心甘情愿地负起耶利米的重担，承受立即死与永恒毁灭的痛苦。”

闵采尔写这些话时已经比较温和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因为他身处异邦，周围被大批的僧侣包围着。但他毕竟说了出来，他说出了要消灭现存的制度与教义。

但是，波希米亚没有相信他的人，他受到诸侯的监视。

他只有离开此地。

闵采尔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有的是改革社会的决心，他要救助人民，因为他们正在忍受痛苦。为此，他决心以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人民的幸福。

1522 年末，闵采尔来到图林根的阿尔施泰特城当了传教士。在此之前，他曾于 1522 年初在一个小城镇上当了神甫，并得到了矿工与农民的热情支持，并和修女奥蒂丽雅结了婚。

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也热心于改革。

他在阿尔施泰特城时，进行了布道活动。人们从艾斯勒本、曼斯菲尔德、赞格豪森、弗兰肯豪森、奎尔富特、阿舍累斯本、哈勒等地赶来听闵采尔布道，仿佛朝圣一般。

他猛烈地攻击僧侣和世俗领主，使人民大为痛快。闵采尔的主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论德国教会礼拜仪式》、《德国福音会弥撒》、《关于书本上的信仰》、《虚假信仰的真正出路》等。

闵采尔在传教和布道以及举行仪式时，不使用拉丁语言，举行圣餐礼时不分僧俗，所有参加的人都可以分到面包和酒。他攻击天主教会，认为其宣扬的“赎罪说”不过是给破房子刷白粉，而旧房子是不应刷白粉的，应该拆了重建。

闵采尔想利用诸侯达到暴力普及新教义的目的。他向萨克森的两兄弟智者腓特烈及约翰公爵一再提出要求，并规劝一部分诸侯和萨克森选侯的一些官员，要他们接受宗教改革，并与反基督的贵族作坚决的斗争。

闵采尔此时确实对诸侯存在希望，他对诸

侯的布道语气十分诚恳，希望他们能与人民联合。

他在给诸侯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们如果要作主的仆役，那么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驱走妨害福音的恶魔。”

“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

闵采尔坚决反对死背经书。他要求人们不仅要从现今的教义中，而且要从圣经中摆脱出来。他认为人的圣灵要比圣经重要，甚至把人的精神力量置于圣经地位之上。他说，人类的精神力量才是真理的源泉，而圣经却不是。

但是，闵采尔不论多么诚心地邀请诸侯加入改革，诸侯们却拒绝加入改革的行列。于是他转向人民，认为人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他鼓励人们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

为了发扬自己的观点，拯救德意志人民，他在各地被压迫群众中广泛组成了秘密团体，名叫“基督教同盟”。

闵采尔为“基督教同盟”提出了纲领。它说：承担义务，团结协作，建立人间天国，建

立平等、博爱、自由的国家。而同盟的最终目的是拯救人类，恢复人类的原有的平等。同盟革命的对象是一切“败坏基督统治的东西”。一切使人民陷入贫困而不容他们摆脱的力量，比如贵族阶层、僧侣阶层就是败坏基督统治的东西，应该一律给予铲除。他认为，同盟应吸收德意志人民各阶层参加，贵族和僧侣也不应排除于同盟之外。而只有那些不愿参加同盟，不愿在新天国做公民的贵族、僧侣，才要求处死他们。

闵采尔十分注重经济上的事，这也是他对未来的设想。“一切东西，不论工作还是财产，都是共同的，都应按各人的需要进行分配。”

闵采尔对于同盟的设想，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萌芽。“按各人的需要进行分配”是闵采尔对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分配的光辉的设想。

闵采尔写的关于千年王国的小册子广为流传，在各地刊发。

闵采尔为了扩大同盟，完成他的使命，向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可信任的使者。他一方面积极与外地联系；一方面在阿尔施泰特布道，把

他的教义传播给百姓。

闵采尔口才很好，但他不同于路德那样的宗教改革家。闵采尔缺乏路德那样明朗的十分恰当的语言，因而也就不如路德有那么激动人心的语言。但他却有路德永远也不会具有的素质——激情。当他布道时人们都凝神倾听，仿佛倾听的不是闵采尔的传教，而是先知在传教一样。

闵采尔在布道中说，必须为人民争取自由，为天国争取在人间的统治。

但闵采尔的布道，已不再是单纯的宗教布道，其实是政治宣传。

路德于1520年8月至10月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强调信仰得救的原则。闵采尔此时对路德及其观点已大为不满。1521年路德投靠诸侯以后，闵采尔便正式与他分道扬镳了。闵采尔指出：信仰就是理性，真正的圣经即是理性。他否认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

路德同罗马、诸侯都十分憎恶闵采尔，一起对闵采尔进行攻击。路德公开咒骂他是“阿尔托泰特的妖怪”和“魔鬼”，是“魔鬼撒旦的工具”，并要求选帝侯镇压闵采尔。

闵采尔面对路德的挑战，没有沉默，予以坚决的还击。他说路德是“维滕贝格的行尸走肉”，是“说谎博士”。他尖锐地指出，路德已经当了诸侯的奴仆。

在阿尔施泰特布道期间，有一次，他提到了反对“崇拜偶像”，言辞十分激烈。阿尔施泰特附近梅伦巴赫的礼拜堂是许多人朝圣的地方。由于闵采尔的布道，人们对它进行示威游行，有人打碎了那里的神像，焚毁了礼拜堂。

打碎偶像，焚烧教堂事件对当局震动很大。在魏玛的约翰公爵想以此为借口血洗这个小城镇及附近地区，居民们十分不安。闵采尔当即请求诸侯不要使自己的人民不安。他为这些人写文章申辩说：

“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梅伦巴赫的魔鬼引起的，这里的人们不愿望崇拜魔鬼，要求实行福音。”

由于闵采尔的辩护，萨克森的两个诸侯亲自来到阿尔施泰特，要求闵采尔给他们布道。闵采尔慷慨陈词，要求取消偶像崇拜，强制实行福音。他说，要杀掉那些把神圣福音弄成邪说的修道士和僧侣，不敬上帝的人不应该有生

存的权利。诸侯们如果不惩治这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中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

接着，他又讲道，贵族就是重利盘剥的罪首。他们把世间一切造物据为己有，却要求人们不许偷窃。而当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误取了一点儿，他们就会被送上绞架，成为该杀的“罪人”。

闵采尔的布道使两位诸侯四目相对，但却无话可说，他们根本找不出任何反对闵采尔的理由，闵采尔引用的全出自事实与上帝的福音。诸侯根本想不到一个青年竟如此大胆，向罗马与世俗领主同时提出了挑战。

闵采尔不管这两位有权有势的大诸侯怎么看他观点，他最后以鼓动性的语言说：

“穷人们仇恨贵族，这是贵族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去掉骚乱的原因，年长日久，关系又如何会好呢？呵！亲爱的君主们，要是上帝让我手持铁杖把这些破旧的壶罐横扫一通，那会是多么好啊！”

很显然，闵采尔要带领人民以主的名义与贵族、罗马、诸侯们大战一场了，他们把这一

切当作他的使命。

闵采尔的演讲使约翰公爵十分反感，他下令把闵采尔的承印人（给闵采尔印书的人）驱逐出境。闵采尔大声疾呼：不要阻止他向人们宣告他从上帝绝对正确的教义中学到的东西。

闵采尔的行为，越来越引起诸侯与罗马的重视。萨克森政府下令，凡是闵采尔的著作，未经魏玛的萨克森政府检查，一律严禁其自行付印。

闵采尔不同于路德。任何人的威吓只能使他勇气更大，信心更足，丝毫不会使他退步。他把新近写成的著作拿去邻近帝国的米尔豪森去付印。文章结尾时，他再一次鼓动说，整个世界必须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和卑贱的人翻身的一场决斗。

闵采尔文章中明显地要拯救德意志贫苦人民，要为他们的胜利而斗争，并且要以暴力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路德印发发《为反对叛逆的妖怪致萨克森诸侯书》，公开反对闵采尔。他称闵采尔是妖怪，是上帝敌人撒旦的使者，必须消灭他。他要求诸侯立即逮捕闵采尔，以防止暴乱的大规

模发生。

路德的文章很合诸侯的口味。但闵采尔却说，路德是想把从教皇手中夺取的教会送给诸侯，而他自己想当新教皇。路德此时已投靠了诸侯，不再指责违反上帝的统治者，只是责难穷苦的修道士与僧侣以及下层贵族。

闵采尔的攻击使路德如坐针毡。闵采尔的革命行动大大不利于他的宗教改革。他于是向诸侯控告闵采尔，说他要叛乱。

控告闵采尔的不仅路德一人。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为闵采尔在其领地布道而宣布他图谋煽动叛乱；弗里德里希·冯·维茨勒本与冯·曼斯菲尔德等领主，对闵采尔也提出了同一理由的控告。

闵采尔仍在继续他的事业。

阿尔施泰特的秘密同盟——基督教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尼科尔·鲁格克尔特向萨克森诸侯告发了这个同盟，并说这个同盟的领导人是闵采尔。

鲁格克尔特成了犹大。

萨克森诸侯为此把闵采尔带到了魏玛，对他进行审讯。他毫不畏惧地告诉给他送行的人

们：

“是时候了，把他们（诸侯）打翻在地的重大打击就要来临，而整个世界必须经受这次冲击。”

在魏玛，闵采尔为自己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他辩护的依据是圣经，他精通于此。选帝侯十分尊重圣经，他不敢把用圣经驳不倒的人处以刑罚，虽然约翰公爵和顾问们主张把闵采尔驱逐出境，但他仍迟迟不下令驱逐他。

闵采尔在辩护中不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路德采取的观点与行为进行了攻击。他说：

“既然路德的信徒们除了揶揄那些修道士外，不愿意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那么还是让他们马上收敛起这些勾当好些。”

尽管闵采尔对他的观点充满信心，又引证十足，但他触动了诸侯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路德。路德可以托诸侯的保护，闵采尔却不能，也不愿受诸侯的保护。相反，众多的诸侯想要害他。

闵采尔从宫廷中出来时，宫廷中的神甫及官员们大声嘲笑他。闵采尔急速返回他的同盟

所在地——阿尔施泰特。但那里也已不安全，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把他引渡出来，加以处罚。

选帝侯于1524年8月16日下令给阿尔施泰特市政会，要他们驱逐闵采尔出境，不得收留他长期呆在市内。

闵采尔为了保证安全，在当日夜就把他的朋友们集中在一起来保护他。他们手中握的是武器，而不是空手待敌。

阿尔施泰特已经呆不下去了，8月15日，闵采尔离开那里去了附近的帝国城市米尔豪森。

闵采尔与路德已由当时的朋友变成了现在的生死对头，闵采尔刚到达米尔豪森，路德就写信告诉那个城市要提防闵采尔煽动人民发动武装暴乱。

“啊！我主耶稣啊！我就要死了，可是我这一辈子还没吃过一顿饱饭。”一个青年农民在刑场上喊道。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帝国以及联盟的压榨加上世俗、教会领主们的骄横使得原本就很数目庞大、种类繁多的贡赋和各种劳役更加重了。德意志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肯普滕教堂实行的惩罚农民的条件是：凡是因过错受罚的佃农都得交死亡税和人头税。当时，德意志的法律已是一纸空文，各地诸侯把法律搞乱了。

德意志的帝国政府几乎和没有存在区别不大，它没有权、没有钱，更没有任何诸侯对它俯首听令。士瓦本联盟直接了当地提出它可以例外，不受帝国政府法律的管辖。权势较大的领主实际上根本不把年轻的皇帝的谕令放在眼里。整个帝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之中，每一个领主的领地简直就是一个国家，他们自行其事，而不受帝国政府的统一治理。

领主们在领地内任意征收赋税，处罚农民。他们十分奢侈，一些领主负债累累。这些

债台高筑的领主们便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收入。他们巧立名目，征收赋税，新设立关税，加重杂税，提高旧有关税，使货币贬值，最可恶的是他们任意增加罚款，又把罚款定为永久性的赋税。

人民必须缴纳维护帝国雇佣兵及国家机构的费用，但却丝毫得不到来自帝国的保护；人民还必须给士瓦本联盟以及领主间相互支援的费用。这些费用已经不是暂时的征收，而是成了人民的固定赋税。但各诸侯征收的钱并不使帝国国力加强，而只是加强自己的领地，加强分裂的能力。农民、市民却毫无保障，听任领主的盘剥。

这一时期，德意志自上而下的生活风气十分腐败。贪图享乐在各阶级中均很盛行。教会领主与世俗领主的生活方式就是大吃大喝、懒惰懈怠。

下层僧侣的生活更加腐朽。

德意志人民十分困苦，到了饥饿与赤贫的境地。一个青年农民在刑场上说了一席话，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说：

"噢！我主耶稣啊！我要死了，可是我这

一辈子还没吃过一顿饱饭。”

他说的是实话，农民们知道，领主们心里当然也清楚这一点。

农民们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各地的农民都在密谋起义。路德看到了这一点，他于1522年写道：

“各地人民都动起来了，睁开了眼睛，他们不愿意、也不再能够承受如此残酷的压迫了。”

由于人民随时可能发动起义，使一些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一危险。他们知道，人民的负担已经十分沉重，如果再添加一些赋税，无疑是促使他们发动暴乱。

为了防止暴乱的发生，各地领主先后都发布了一些法令，禁止农民集会结社。甚至农民举行村区民众大会的古老自由，也在这一时期被取消了。领主们取消了农民一切集会的机会，甚至连他们娱乐的机会也取消了。他们的行动，非但没有阻止人民的反抗，反而加强了人民的反抗情绪。

肯普滕侯爵修道院院长所属的农民处境最为悲惨，而且日益严重。士瓦本联盟一直拖

着不做法律裁决。1507 年，侯爵修道院院长约翰内斯死去，但情况并未因这个可恨的人的死而有丝毫改观。新的侯爵修道院院长对佃农的压榨更加残暴，对自由农也是如此暴虐，比死去的前任更加有甚。凡租种当时寺院土地的，都必须订立租约，而佃农、农奴因各种因素所受的损失，他却坚决不给予考虑。

这个穷凶极恶的修道院长无恶不作，其领地上的人民受尽了苦头。他的讲话，在那里就是法律。

一次，这个修道院长要求博登瓦尔茨一个自由经营磨坊的磨坊主缴纳一笔息金，而磨坊主认为他无权征收息金而拒绝交付。修道院院长派人威胁磨坊主说：如果坚持拒绝，立即派人烧毁他的磨坊。这个无依无靠的小磨坊主只得如数将息金交给他，才免去了磨坊被焚的恶运。

他认为，一切增加修道院权利与财产的行为，是合乎上帝的旨意，是合理合法的。他还征收战争税。

这个修道院长于 1523 年死去，但他的继承人仍然无视人民的苦难，无视正在孕育中的

农民大起义。

1524年秋的一天，寺院中的农奴正在干活，修道院院长塞巴斯蒂安·冯·布赖滕施泰因的儿子佩拉吉乌斯散步来到农奴们的身边。一个农民说：

“修道院长倒有个漂亮正直的儿子。”

这句话讽刺意味已经很明显，而一个70多岁老者接口道：

“如果他不是一个秃驴的儿子，倒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修道院院长听后派人将老头抓了起来，投入监狱。关了很久，老头交了一笔罚金，写下保证不再骂的保证书，才被释放，可他已被折磨得快要死了。

这个寺院的领主的残暴可以使人们看到当时领主们对农民的暴行之普遍，确是事实。1524年夏天，自由城市乌尔姆所辖的小城莱普海姆居民已到了不得不请求减免赋税的程度，但市政委员们却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赋税不能减免。乌尔姆城中一个老绅士由于他的几个农奴拒绝向他献鸡，就把他们一同赶出了他的领地。

这个时期较大的教会领主也全是贵族出身，他们对付农民的行为与思想，多半与世俗贵族没有多大区别。

农民这时期的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他们犯有一点得罪领主的小过失，也会因此而被领主处死。

1494年，有一个年轻农民在贵族冯·埃普施泰因的小河里捉了几只螃蟹，这个贵族就派人抓住他，送到法兰克福，要求斩首。当这个自由城市的市政会认为青年农民不应斩首而拒绝了贵族的要求时，他十分气愤，设法从其他地方找来了刽子手杀了这个可怜的农民。

在人命如此卑贱之时，农民并不因此而去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觉得，这仇恨早晚是要报的，死对于他们不算什么，他们的复仇迟早要取得胜利。

由于世俗领主与教会领主穷凶极恶地压迫农民，把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利益剥得一干二净。农民忍无可忍，四处结成同盟，杀死领主，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迫在眉睫了。

一个预言家说："谁要是在1523年没有病死，1524年没有溺死，1525年没有被打死，谁就能讲述奇迹。"

1524年8月15日，闵采尔来到了米尔豪森，并参加了米尔豪森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闵采尔来到米尔豪森之前，市民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领导了米尔豪森的改革运动。米尔豪森的改革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1524年8月24日，普法伊费尔与过去的修士马特霍伊斯一同被驱逐出城。普法伊费尔虽然在城市中的真正市民中间实施他的一切措施，但他却又把比城市居民负担沉重得多的郊区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普法伊费尔号召农民参加城郊居民的运动，而市政会却要求农民去反对内城的叛乱。农民与市政会根本不联合，他们拒绝了市政会的要求，他们提出了改善自身条件的要求，将普法伊费尔给他们起草的十二条款提交给市政会。闵采尔后来就是用这些条款在弗兰肯豪森附近把他的军队集体起来的。

[illegible]这些条款是：凡属教会的一切田亩、葡萄园和草地，即一切属于教会的产业都应出售，并要依法纳税。人们对伯爵和贵族不再有任何劳役的义务。池塘、牧场、猎场应成为公共财产，允许任何人在自己所必需的范围内使用。任何人不再有义务去缴纳赋税、什一税和徭役，无论起源于教会还是世俗，但200年前已经实行的例外。市政会应由市民选举或认可，市民应有权罢免市政会，市民也应有自己的代表出席市政会，由市民和市政会共同管理政务。不得因某种过失监禁任何市民或农民，也不可以用任何方式虐待他们，除非他们犯了刑事罪。甚至对罪犯也要给予人道的、从宽的惩罚，也不得从住宅中逮捕任何人。

闵采尔的到达使城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1524年8月27日，普法伊费尔一派在米尔豪森取得胜利后，1524年9月25日，拥护市政会的人再次起来反抗。

闵采尔依靠的是最下层群众，他在市民中信徒很少。而市民一直以普法伊费尔为领袖，他们追求的目标与闵采尔显然不一致，所以他们不可能与闵采尔走在一起。闵采尔在城中只

住了一个多月，普法伊费尔利用闵采尔的布道来增加自己的信徒，贯彻他的为市民的主张。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米尔豪森绝大多数市民对于闵采尔鼓动下层人民参加斗争，他们一直不知所措，不知是否联合农民一道反抗世俗、教会领主。

人民内部的分裂，加上城市中的贵族借助于皇帝的一道诏令，引诱了市民阶级。闵采尔很快被驱逐出米尔豪森。不久以后，普法伊费尔也被驱逐了。

他们被驱逐后，尼克莱郊区起来与城市贵族作斗争，想把运动坚持下去，并留下他们的领袖闵采尔与普法伊费尔。但不幸的是，他们不久就失败了，闵采尔与普法伊费尔被迫出走他地。

闵采尔在米尔豪森住了不足两个月。他在城中布道号召说："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要灭亡，""卑贱的人将要翻身。"他的这些主张，旗帜鲜明地对准了世俗主，要打翻他们，建立农民（卑贱的人）自己的政权，不再受任何贵族的剥削。

闵采尔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不仅亲自参加

城市平民的起义活动，而且建立了一个“上帝的永久契约”的临时性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

他建立这一组织的目的仍和建立基督教同盟一样，要建立人间天国，恢复人类的平等，用暴力打击那些不信上帝的妖人和限制人民自由的贵族。

图林根境内的米尔豪森就这样成了揭开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序幕的舞台，农民起义就从这里走上了历史的大舞台。而序幕的第二场则是在一个属于班贝克的城市福布海姆进行的。

闵采尔和普法伊费尔被驱逐后，于9月27日离开了米尔豪森，他们一同前往法兰克尼亚城。

1524年，胡布迈尔在瓦尔茨胡特领导人民与领主进行暴力斗争的时候，闵采尔来到了这个城市。

政府军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惩罚“这些无耻的异教僧侣和蛊惑人心的人”。但是，胡布迈尔宣称：信仰埋在心底，是一切力量所不能征服的，无论大炮，还是镣铐。

胡布迈尔在与闵采尔会面之前，就已经受到闵采尔的信徒威廉·雷布林的影响。他拥护闵采尔新天国的教义。

胡布迈尔在瓦尔茨胡特建立了新教——再洗礼派。这一派主张婴儿应该在接受信仰的教义后再接受洗礼。

不允许他们公开布道的地方，他们就于夜间在僻静的山谷或房舍里集会。他们有自己的识别标志，一个人说：

“愿主赐你平安！”

另一个则答道：

“阿门！愿主也赐你平安！”

闵采尔来后，积极向他们布道，要革新世界，以剑灭除世界上不敬上帝的人。

纽伦堡市政会把他们描述成把一切都导向战争的暴乱分子。

再洗礼派分子与闵采尔结合在一起，接受他的主张，按他的意图活动。这些人奔走于图林根、士瓦本、莱茵河中上游、班贝克地区、维尔次堡地区、瑞士、萨尔斯堡地区以及埃姆斯河上游地区。他们坚信，一切现存的制度即将毁灭，人类将实现普通的平等与博爱。他们

建立秘密兄弟会，即闵采尔基督教同盟的分支组织。

纽伦堡有一个叫约翰内斯·胡特的人，他携带闵采尔的书四处传播，并把闵采尔在途径纽伦堡时写的一本关于暴力变革的著作出版了。闵采尔被赶出米尔豪森后，曾投宿于他在比贝劳的家里，同他谈了一昼夜。此人相信闵采尔关于暴力变革的思想，不仅传播它，本人也在农民战争开始时就加入了革命，并在维尔次堡城郊的营寨里起了很大作用。

再洗礼派成员关于革命的传布远比他们参加战争重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属于闵采尔派。

闵采尔不是再洗礼派的创始人，也不是再洗礼派的信徒，甚至他也没受过再洗礼。但是，闵采尔是他们的同盟者，是这个并不统一的派别的领导者。闵采尔利用他们的热情，为自己解放人民的目标服务。

1524年中期以后，闵采尔宣布再洗礼符合他的主张，要求给予实行。

闵采尔是一个思想家，但缺乏路德式的理性；他是一个实践家，热情虽多，而适应实际

的思想行为却少。他喜欢在人民面前使自己的思想蒙上一层幻觉、一层神秘，给自己的思想披上神的启示的美丽的外衣。

他认为，用幻觉和直接启示对群众证明他的天职是必要的。

一天，他的一个信徒来到他房前，听到有两个人在交谈，打开门一看，却只有他一人。于是就问闵采尔刚才同谁在一起说话。闵采尔回答道：

“刚才我问我主，我明天该做什么？”

信徒又问：

“主这么快就给了指示？”

闵采尔微笑着点点头。在他心中，他实在是上帝派来解救人民的使者。

闵采尔被纽伦堡驱逐走了。

闵采尔来到士巴登，他要了解当地情势的发展，也为自己的活动寻找空间。他沿士瓦本河而上，来到克莱特部和赫部。这时，卡尔施塔特、普法伊费尔也都来到这里。

闵采尔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传教活动，他要使人民处于同领主的战争状态。在巴塞尔布道时，他讲道：

“哪里的统治者不信仰基督，哪里的人民也不信仰基督，必须消灭这种状态。”

同时，他把他的改革思想在这里也扎下了根，他写小册子在人民中散发，布道给人民听。他说，领主是农民的敌人，要坚决反抗他们的统治。建立千年王国，以及全体基督徒成为一个兄弟般的民族的时候就要来到了。

他的思想在这个高原地区流传很快，人们很乐于接受他的学说、他的为人。已经处于起义状态的人民请他留下来，领导对领主们的斗争，但他自己却没有这种想法。

1524 年 10 月末，闵采尔来到了森林地区。不久，这里的农民发动了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反抗运动。

奥地利政府十分害怕，怕这次起义扩大成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

闵采尔的门徒与他一起走遍了整个高原地区，向人民讲述他的理想——建立千年王国。他的思想比路德更易于为农民接受。人人崇敬闵采尔，一些前路德派人物也跟随他，用他的思想布道。

德意志的农民在觉醒，不再相信原有僧侣

的布道了，他们要反抗，要夺回属于他们的那部分利益。他们再也不愿受贵族的欺骗和压迫了。农民说：

“那些老黑袍想怎么说谎就怎么说谎，想怎么胡说就怎么胡说，这些无赖统统该打死。他们把我们欺骗得好苦啊！”

僧侣所表现的罗马教会的权力与威望在这里彻底消失了，人们不再相信他们。农民只相信为他们利益而斗争的闵采尔及其信徒们的布道。

1524 年，德意志遍地发生自然性灾害。当时人们十分信仰的星占学也确定 1524 年为发生空前巨变的一年。

民间流传一个预言说：“谁要是 1523 年没有病死，1524 年没有溺死，1525 年没有被打死，他就能讲述奇迹。”

闵采尔一如既往地给那里的人们布道。其场所一般在野外。

闵采尔的布道使农民们又回到现实中来，重新认识到他们所处的境遇。他们向往着美好的明天。那时，他们将不受领主的压迫，并且向领主报仇，夺回自己的财产。

高原地区的农民又重新掀起了斗争的热潮。

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呆了3个月，然后离开高原地区，去士瓦本了。

第四章　德国农民战争

《十二条款》、《书简》与闵采尔

1524年冬至1525年春，德意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起义范围逐渐扩大，几乎波及了德意志的每一个诸侯国。

农民首先对教会领主进行了攻击。现在城市也开始行动起来。许多城市、诸侯、贵族十分害怕，却又恨之入骨。农民此时已不单纯与他们进行战斗，而有了自己团结战斗的旗帜。农民在同士瓦本联盟之间的谈判化为泡影后，更加坚定。

在这次斗争中，农民有了一个巨大的收获。这就是《十二条款》。

《十二条款》虽只是一纸文件，但却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它表明：在适当的时机

把一种思想形成文字，并恰当地表述出来，会产生多么无比巨大的力量。

城乡平民把他们的疾苦列为条款，是他们由来已久的历史习俗。维尔次堡地区农民提出了50条，美因茨地区的农民提出了29条，明斯特的市民提出34条，法兰克福的市民提出41条，因河河谷的农民提出了19条，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德意志的平民均把自己的疾苦写成若干条，希望通过和解的途径与他们的领主协商，以期达到领主的让步，减少他们的疾苦，归还一些原本属于他们却被剥夺了的权利。

《十二条款》是1525年春天在士瓦本地区出现的一种表达农民要求的宣言。虽然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均受查禁，但它却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德意志各邦。

《十二条款》很快成为全体农民所承认的共同宣言，使分散的群众在一个宗教——政治的纲领下团结起来，并给大规模的人民解放运动的进程指出达到目的的更明确的方向。它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十二条纲领》有大小两个标题，大标题

写道：

“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的所有的农民和佃农向上述官厅申述的根本的、公正的主要条款。”

下边一行接着写道：

“愿基督把和平与上帝的恩典赐给基督徒读者。”

宣言共有十二条。每一条都申诉了农民的困苦与他们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

第一条：我们恭顺地请求和愿望是今后我们要有权，每个村区要有选择并任命自己牧师的权利。如果牧师行为不端，他们同样有权解除他的职务。

第二条：既然合理的什一税是旧约中所规定的，而且在新约中已经得到实现，那么我们也愿意缴纳公平的谷物什一税，但是必须合理地缴纳。应该把这种税交给上帝，分配给上帝的仆人。这种税应该归一名能清楚传布圣经的牧师来掌管。我们希望，今后应由村区选任的教会总铎征收这项什一税。而这项什一税必须用来做牧师的薪金，分配给穷人、以备战争之用。而小什一税，我们决不再交纳。

第三条：迄今为止，人们一直把我们当做奴隶，这是一种可悲的习俗。基督既然用他宝贵的血解救和赎回我们全体，无论是卑贱的牧人还是高贵的人，都无例外。所以，你们官厅如果是基督徒，就应该把我们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或者从福音找出我们是农奴的根据，否则，我们将不服从官厅。

第四条：迄今为止，穷人一直没有权利捕捉野禽野兽或者在河中捕鱼。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不公道的，不友爱的，自私自利的，也是违背圣经的。

第五条：我们为了伐木的事情也备受领主欺压，因为我们的领主已把一切树木都据为己有，穷人若要，必须出双倍的价钱购买它。除非是买来的，否则一切树林应归各地人民。

第六条：我们所承受的负担日益加重。我们对此要求给予适当的体恤，使我们的负担不要这样沉重。

第七条：我们希望今后不再受领主的压迫，领主只能按他与农民之间的契约对农民提出公平合理的要求。领主不应继续强制和压迫农民，不应无节制加重他们的负担。

第八条：我们倍感沉重的是，农民耕种着他们负担不起地租的土地。我们要求制订公正合理的地租，使农民不致于劳而无获。

第九条：我们由于犯了大罪感到痛苦，因为新法不断颁布，课罚我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有时出于嫉恨，有时出于偏袒别人。我们要求课罚我们要根据旧日成文条例，依据事实，不应偏袒。

第十条：我们深感苦恼的是，有些人把属于村区的草地和耕地据为己有。这些财产我们要收回交还村区。

第十一条：我们要将缴纳死亡税的习俗全部废除。

第十二条：以上所举各条，如有任何一条不符合圣经，只要根据圣经对我们说明，证实确属不当时，我们愿意立即取消。

《十二条款》大概是托马斯·闵采尔根据普法伊费尔所写的米尔豪森条款而写成的第一个比较详尽的草案。因为，托马斯·闵采尔于 1525 年 2 月正是在多瑙河沿岸进行布道、组织起义等革命活动的。

多瑙河上游的农民在 3 月份将这个条款

书作为全体人民的权利而印刷出来。无疑，这是历史的进步。

至今，仍有不少人怀疑《十二条款》的起草不是出自托马斯·闵采尔之手，但无论怎么追溯，最后仍旧追溯到闵采尔身上。也有人说这些条款是普法伊费尔写的，但他在米尔豪森的活动以温和著名，而且他的文章说理性极强，而这些条款确似出自闵采尔之手，符合他的风格。

《十二条款》公布前后，黑森林的新教兄弟会发表了一份《书简》，书简带有闵采尔的特点，而且闵采尔也把其内容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书简与《十二条款》一样，迅速成为各起义军的行动纲领。

这份书简的出现时间与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的时间是吻合的，它确系闵采尔所草拟。闵采尔于1524年10月至1525年2月在这里，主持与上士瓦本的弟兄建立联系和制订计划。以后沿多瑙河上游而下，途经法兰克尼西返回图林根。

托马斯·闵采尔来到上士瓦本后，积极活

动，但收效甚微。上士瓦本人与下士瓦本人差别很大，他们冷静。闵采尔那种勇往直前的做法与上士瓦本人的性格不太相合，以致于他们难于接受闵采尔那种奔放性格的感染。闵采尔没有在鼓动他们中成功。

闵采尔感到无能为力。士瓦本联盟的一切诬蔑农民的语言，竟使这些自以为冷静、理性的上士瓦本人相信。但闵采尔并没有放弃做他们的劝说工作，他把很多信徒留在那里，向他们布道。

闵采尔临走时留下一本小册子，名叫《应该如何统治》。这本小册子是他在南部高原时写的，当时他看到许多农民仍不觉醒，而听任诱惑与领主们缔结协定。闵采尔十分气愤农民的这种不觉，决定给他们当头一喝。小册子语言十分激烈，他留给上士瓦本人的目的也正是想让他们觉醒。

托马斯·闵采尔在小册子中明晰地分析和叙述了领主们是如何统治、压榨人民的，他也分析了农民反过来应该如何进行统治。这是一篇政论文。他说，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愿有人间的官厅，这种人间官厅只有非基督精神、

撒旦才会需要它。所有统治者都是依据个人好恶和冥顽不化的头脑制订自身的必要的法令，他们征收大量的杂税、关税，课征赋税以及暴力压迫人民。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强盗，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鼓励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计划而畏缩不前，如果农民不坚信自己的信仰，就将会受到一场大灾难。

闵采尔在小册子中预言：如果不消灭领主阶级，不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农民就不会彻底解放，而农民一刻也不会停止、也不应停止反抗领主的压迫。领主在被消灭之前一刻安宁的日子也不会有了。

托马斯·闵采尔的这本小册子是在纽伦堡付印问世的。每个字都体现了闵采尔激昂的革命壮志和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他怀着对领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号召农民反抗自己的敌人。而他自己，则大踏步走向战场。

闵采尔在小册子结尾时既有嘲讽，又有些威胁地说：

“你们赶快改弦更张吧，一句话，既使你们很狡猾，也一定会完蛋。”

闵采尔对他的事业满怀信心。他看到贵族

领主是那么地腐败，而这些大大小小的领主们武器装备很差，兵力又相当薄弱。面对农民纷纷涌起的革命，他们十分害怕，不知该如何对待才好。镇压，他们心中是那么想的，但农民却要比他们有力量得多。每个诸侯都在各自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如同一盘散沙。

每个诸侯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一切，财产、名誉、地位、性命。他们意志沮丧地等待历史审判时刻的最后降临。

对立阶级的另一边，是意志高昂的农民。他们要夺回自己的权力，夺回应该属于他们却被领主霸占的那部分财产。他们要消灭欺骗他们的教会，消灭压榨他们的领主。他们意气风发，他们知道：解放自己的使命应该由自己来完成。

闵采尔十分欣慰地看到，起义从一个地区扩展到另一个地区，规模越来越大。当他又来德意志中部地区时，各种派别的人物都在那里并十分活跃。

他们在那里向农民布道、演说，劝导农民拿起武器。有的人甚至用给钱的办法，引诱那

些尚未觉醒的农民也拿起了武器。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会让他们觉醒而成为一个坚强反抗战士。

黑森林的农民军统帅是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他穿着具有战斗色彩的红色大袍，头戴红羽平顶帽。他的后面有一辆装饰有簇叶花彩并飘有大红战旗的彩车，有一个英俊少年手捧书简和十二条款走在他的身前。

汉斯·米勒把闵采尔这些条款作为本地人民起义的纲领。他宣读着这些条款，号召人民加入农民战争，与自己的敌人决战。他的周围聚集着上万的农民军，四处攻打封建领主。

托马斯·闵采尔，这个伟大的农民阶级的儿子，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成熟的农民战争领袖。

而他在这几年的布道中发现：必须与温和的投靠诸侯的路德派决裂，必须与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作殊死的搏斗，农民的解放才可能成功。

他要打碎这个旧世界，并把它作为毕生的事业，随时准备为之而献身。

德意志农民战争终于在全国范围内轰轰

烈烈发生了，闵采尔以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勇敢地加入了农民战争的行列。

1524年12月13日，普法伊费尔回到米尔豪森，领导人民斗争。1525年春，闵采尔来到了这个城市。接着，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在图林根、黑森、萨克森爆发了。起义农民以米尔豪森为根据地，将革命烈火向四周喷发，震憾着德意志，震撼着全世界。

米尔豪森人早就在普法伊费尔的发动下奋起抗击教会领主与世俗领主了。1524年末，一场战争即将发起。这时，普法伊费尔，米尔豪森人心目中的偶象般英雄，于1524年12月13日再度返回米尔豪森在，领导这场农民革命。

普法伊费尔在米尔豪森做了大量工作，他走街串巷，宣传闵采尔的思想，宣传他自己的革命思想。他在市民中积极备战，要求每个市民必须为革命做出贡献。米尔豪森人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等待时机一成熟，就立即发动

起义。

闵采尔此时正在南方高原多瑙河流域进行宣传活动。米尔豪森城中有不少他的信徒，这时正团结在毛皮匠罗特的身边。他们为了迎接闵采尔的归来，不知疲倦地宣扬他的主张，并与城市中的贵族坚持斗争。

普法伊费尔是个温和的革命者，他以往在米尔豪森进行的活动，也大多是温和的。这时，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米尔豪森城必须进行一些彻底的改革。尽管普法伊费尔比较温和，但他与旧制度毕竟水火不相融。根据旧宪法产生的市政会与城市贵族依然保留，这与普法伊费尔的意图相去甚远，他要改革这一切旧的剥削人民的制度。

托马斯·闵采尔与普法伊费尔虽有不同，但对于旧制度，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必须改变这一切。

闵采尔春天从上士瓦本返回米尔豪森。在上士瓦本，他为当地的人民觉醒做了大量工作，要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应该去做什么。从上士瓦本回米尔豪森途中，他看到各地的人都在准备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的时候，闵

采尔的心情是多么地激动啊！

一路上，他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仔细研究各地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把革命的火种撒了一路。

闵采尔的革命学说在全国各地震动很大。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一起跟他走。他在富耳达地区传教时，仅仅用非常短的话语就打动了农民的心。他们欢呼着，把帽子抛向天空。

他也因此而被捕。幸好那些贵族并未认出他，只是将他作为一般的传教士，或者仅仅是一个闵采尔的小小信徒罢了，因为当时象他这样对农民布道的人实在不少。不过，这些贵族如果亲自听了他的布道，就一定会认出是他，闵采尔！

几天后，他被释放出来。

于是他急忙赶去米尔豪森。闵采尔以传教士的身份来米尔豪森，遭到市政会的坚决反对，他们不想要闵采尔在米尔豪森布道，那样会给市政会这些大大小小的贵族们带来比普法伊费尔更多的麻烦。市政会官员们深知闵采尔的煽动能力。

但是，普法伊费尔率领市民们的中坚分子罗特及其信徒向市政会提出抗议，要求允许闵采尔布道。制酒工人和酿酒工人甚至威胁市政会说：

“如果我们听不到闵采尔布道，那么我们就起义来欢迎他来布道。”

市政会不愿把事情闹大，只好忍气吞声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可市政会却是引进了一枚炸弹啊！闵采尔来到米尔豪森后，几乎天天去郊区和农村向农民布道。他对农民说，要反抗王公贵族的统治，要组成基督教总同盟。以后，闵采尔在城里也用同一种语言去对市民说：“起来吧！打败剥削你们的王公贵族！”

市政会的王公贵族们实在容忍不了闵采尔的布道，他们不愿闵采尔告诉人民自己是民众的敌人。市政会再一次发出禁令：禁止闵采尔布道。

闵采尔对市政会的禁令置之不理，他本来就是要反对他们的，他布道也正是要求农民和市民消灭这些剥削人的贵族。闵采尔继续布道，城内的人纷纷赶去听他的演讲。除了想斗

争外，米尔豪森再也没有第二个呼声了。农民大批地涌进城市，整个城市如战争降临一样动荡不安。市政会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农民进城听讲道，以免起义发生。

但是，市政会此时已控制不了城内发生的一切了。愤怒的市民砸毁了城内一切教堂中的神像。革命的信号发出了，他们开始向教会打出了第一拳。

托马斯·闵采尔与普法伊费尔担心市政会可能做出妨害他们事业的事，他们提出：闵采尔以圣母院牧师身份，普法伊费尔以圣尼古拉牧师身分参加市政会的一切会议。他们此举一是对市政会的行动起监察作用，随时获知市政会的动向；二是要影响市政会的行动，使市政会多为他们的事业开绿灯。市政会面对他们敌人的要求，断然拒绝了。

闵采尔与普法伊费尔在米尔豪森的活动，使人民情绪不断高涨。有一天，托马斯·闵采尔的信徒指名要几个贵族出来就死。弄得贵族们每天惶惶不安，有些贵族第二天便离开米尔豪森城，投奔他乡去了。

也有些贵族深为农民与市民的行动所感

染，同时也慑于农民革命的威胁之下，于是公然走入了市民的行列。城防司令、法律顾问冯·奥特拉、赖因哈德·拉姆哈特都是如此。

托马斯·闵采尔将市民们全副武装地集合在校场上，他与普法伊费尔进行检阅。闵采尔站在市民队列前，进行了即席讲演，全体市民再一次为他的真诚的话语所鼓舞，欢呼雷动，高喊着“打倒市政会”的口号。

市民们听完托马斯·闵采尔的布道后，去圣母院举行集会。在普法伊费尔、闵采尔、奥特拉的主持下，市民们对市政会的存废问题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市民们要过去一向由4个团体轮流执政的旧市政会解散，代之以新的市政会。

普法伊费尔把新的市政会定名为“永久市政会”。新市政会在托马斯·闵采尔、普法伊费尔的意图下进行选举的，是通过委员会选举，并不是由市民们直接选举。“永久市政会”意即它不再由4个团体轮流执政，而是由唯一的一个团体行使职权，管理市民、城市。这是世界行政史上的一大进步。尽管是唯一的团体执政，但委员却不固定，人民有权随时罢

免他，这一点与旧的市政会完全不同。

至今无据可考的是：这个新市政会的组织条例不知怎样，而市政会的委员们任期为多少年？

市民们在圣母院集会，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基督教政府”，甚至有人提出取消旧的市政会。旧市政会的8名委员看到市民的活动威胁他们的生命，就以总辞职保全自己。

新的市政会成立后，每个市民都必须宣誓效忠它，为它战斗。至此，托马斯·闵采尔与普法伊费尔在米尔豪森终于将旧的封建王公赶下政坛，使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新市政会是于1525年3月17日正式建立并开始工作的。托马斯·闵采尔仍然是圣母院的牧师，普法伊费尔是圣尼古拉的牧师。他们二人虽是这次活动的领袖，而且新的市政会又是在他们二人领导之下产生的，可他们为自己所取得的并不是市政会主席的位置，而仅仅是参加市政会会议的权利。

市政会的委员们受闵采尔影响很深，是新的领导人。托马斯·闵采尔与普法伊费尔一样，十分勤奋，几乎市政会的每一次会议都要

参加，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市政会通过的法律，完全以基督的法律为基础，即以圣经中记载的基督徒的行为规范为基础。

新的市政会建立后，托马斯·闵采尔依然在农民中布道，普法伊费尔则组织市民运动。这时，他们二人的看法有些不同。普法伊费尔只在市区内工作，而闵采尔却认为，应该以米尔豪森为中心，把运动向四面八方幅射开去，扩大运动范围；而且必须同其他地区主动联系。所以他一方面与法兰克尼亚、士瓦本这些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注视着各地的动态，另一方面在整个图林根展开活动，以便迎接大规模农民革命战争的开始。

托马斯·闵采尔把他的思想逐渐变为行动，这使他的信徒对于他本人及其思想言论更加崇敬。他的信徒们把他的思想当作上帝许可的救世言论，是神圣的。

闵采尔此时更加激进。最初他布道时，要求信徒要做事符合上帝的旨意，要求恢复原始的平等状态，但他现在公然要求财产公有，并付诸实践。

闵采尔所坚持实施的财产公有根本上没

有超出耶稣时代的程度。圣经中记载着最早的基督徒们、富人把粮食分给穷人吃，给赤身的人以衣着。托马斯·闵采尔如同基督一样，他把粮食和其他食物给穷人，他要让农民吃饱饭，达到圣经要求的那样，并给平民每人一块做衣服的布料。闵采尔要平民们都有饭吃、有衣服穿，而不致出现败落的时代的农民及小市民破衣空腹的状况。

闵采尔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他做事从来以身作则，把自己当作这些贫苦人民的救星。他自己不因为是领袖而衣着华丽，吃的也是农民的家常便饭。托马斯·闵采尔，一个伟大的农民儿子，他和平民一样领取布料、食物，从不多取一丝一毫的多余东西。他身着一件朴素的、镶毛皮边的上衣，有时罩上一件肥大的先知式的外套。

闵采尔对自己约束很严格，品性十分严谨，犹如旧约中的长老一样威严，使人望生敬意。他的这种态度中，充满着一种使千万群众无条件服从的巨大的凝聚力量。德意志当时的市民是何等高傲，可对闵采尔却俯首听命，使人不得不赞叹这位来自早[illegible]的伟大的年轻人。

一位与闵采尔在一起共事过的人回忆说，闵采尔在他的民众中享有何等高的地位，而他又把他的人民约束到何种程度，他死后很久，人们还当他仍然活着，而且就在他们中间，督促着他们的行动，使他们不敢背离他们的事业，恐怕会受惩罚。

闵采尔无疑是位具有非凡品格的伟大人物。但是他的敌人——路德与梅兰希通却极力地诬蔑他的思想、他的品格。但托马斯·闵采尔的伟大形象却又不得不使他们敬畏。路德、梅兰希通他们即使是在攻击闵采尔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为闵采尔的高贵品格做出极高的评价。

维滕贝格那些空口夸夸其谈的神学家们却以此攻击闵采尔，说他每次布道之前，都让城内最漂亮的妇女围着，这样他身上便充满了灵感气息。甚至有人说闵采尔每次讲道之前不仅要找一些妇女相伴，还要对一个美女发泄肉欲。这也是来自维滕贝格的神学家集团之口。但是，即便这一切是真的事实，也不会影响闵采尔作为农民领袖的形象。苏格拉底、穆罕默德等许多伟人不也是这样吗？

托马斯·闵采尔的品格是不容侵犯的，他的生活如同他倡导的教义一般地严肃。他爱他的妻子甚于他自己，他尊重她的人格、她的事业，她也是如此。即使闵采尔起义失败后被俘，面对敌人的屠刀，闵采尔心中也只有一个人——他的妻子。可竟有人在他这方面大作文章，攻击他的私生活，把疯狂的瑞士再洗礼派的放荡行为嫁接在他的头上。这些诬蔑，不仅当时没有人相信，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人相信他们的梦呓。正如闵采尔说路德为“撒谎博士”一样，这些人都被农民称为“撒谎团”。

这一时期，闵采尔住在白十字骑士团的团部。农民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城市，听他布道；城市中的所有教堂已被洗劫一空；妇女们也加入了改革运动，她们用弥撒服和司祭服制作漂亮衣服，闵采尔的妻子也是其中的一个。闵采尔告诉人们：要夺取王公贵族的财产，实行财产平等。

一些好利的人也来到米尔豪森城，他们是来享受的，因为这里会给他们食物、财产。他们认为：不等到消费完这些贵族留下的财产，上帝又会赐给他们更多的财产。

闵采尔的布道热情洋溢，引用的多是旧约中的章句来表以他的思想。他每次布道以后，普法伊费尔与罗特等人让青年男女合唱《耶和华答应给犹大的子孙以福地》。

"你们明天要迁徙，主将和你们在一起！"

托马斯·闵采尔此时已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背道而驰了。尽管马丁·路德曾经为德意志人民的觉醒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但时代的发展极为迅速，已远远地将这个伟大人物抛在后面。马丁·路德主张宗教改革，但他对于人民的革命要求远远不能满足，并投入诸侯的怀抱，公然反对农民的武装暴动。

以图林根的米尔豪森市为中心，革命的烈火迅速地向四面蔓延，它发展到埃尔福特、施瓦茨堡、施托尔贝格、曼斯菲尔德等伯爵的领地及地区，进入到施马尔卡尔登、黑森、埃森纳赫侯爵领地，直至文希斯菲尔德、不伦瑞克地区。革命的大火映红了德意志的天空。

1525 年 4 月，马丁·路德看到革命的势头一浪浪增高，他企图利用他的威望阻止这个运动的继续发展。他走了很多地方，劝说臣民要服从天命，免受杀人先知使者的诱惑，不要

武装暴动。

闵采尔则要人民暴动，杀去那些剥削他们的“上帝的敌人”。他的号召如春风一般在农民中间流传，人民响应他，其中市民阶级也响应他。

路德此时已经不是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了，他的言论与布道对于农民来说如同石沉大海一样，连反应也没有。他对官厅神圣权威的歌颂，所依靠的关于奴隶制基督教信仰的教义，根本不为农民所接受，连当时欢呼他的市民阶级也背叛了他，站在农民一边。路德很伤心。

路德与闵采尔的这一回合的较量，使路德元气大伤，终于返回了维滕贝格。在途中，他的诞生地文斯勒本也爆发了起义，他感到莫大的耻辱。

这时，闵采尔领导的农民革命的烈火，在魏玛地区、莱比锡和托尔部、埃尔茨山脉以及福格特兰德都点燃了。而且，上士瓦本的十二条款经美因茨地区和富耳达地区传了过来，也成了起义农民的革命纲领。不久以后，书简也传过来了。

农民起义在闵采尔精神的支配下在萨克森领地普遍展开。他们到处打击贵族，分夺贵族的财产。起义军人数也迅速扩大，队伍也有不少联合在一起。扎尔费尔德有2000人，福格特兰德境内有8000人，罗达和洛贝达有3000人，格拉和罗内堡周围有4000人。贵族们大声疾呼：

"农民给伯爵和贵族带来许多苦恼，抢劫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房地，逼迫他们接受十二条款，加入农民的同盟。"

托马斯·闵采尔在这段时间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伟大风范。他进行的活动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他的足迹遍及普劳思的后方，如萨克森高原地区和埃尔茨山间，并在这些地方特别活跃。

他的使者和信徒积极在各地传教。

在托马斯·闵采尔传教布道的埃尔茨山区有许多工人，他们从曼斯菲尔德出发，到次维考、马林贝格、安纳贝格和瓦岑贝格。在这里他们宣传闵采尔的自由平等思想，宣扬十二条款及书简。农民很快呼应这些工人的呼唤，矿工、农民不久便聚集起一支1500人的队伍，

在埃尔特莱因附近的修道院长的庄园建立了一个营寨。他们的军队开到安纳贝格附近的施莱陶，抢劫了宫城，冲进了牧师及市民家宅。他们与次维考开来的农军汇合在一起，声势更为壮大。

此时，托马斯·闵采尔正在米尔豪森城内悠闲地住着，虽然他的信徒们正在德意志各地率领农民起义，烽烟正浓。闵采尔正在思考以后的战争。他知道，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军队与贵族军队的决战即将开始，必须为此而做准备。他一方面派人出城联络各地农民起义军，要他们在十二条款及书简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统一指挥，共同为农民的目标而斗争。同时，他感到农民军队作战素质及武器装备不如贵族军队。于是，他在米尔豪森城内的赤足修道院内监造大口径的火炮，以便同贵族军队在阵地战中使用，打击贵族军队，减少战士伤亡。米尔豪森城内有许多宣誓效忠他的信徒，他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交结普法伊费尔，由他训练他们。以使这些从未上过战场的人具有良好的战斗素质。大战之中，有一支作风顽强、懂得战略战术的军队实属难能可贵，闵采尔要的便

是这样一支坚强的军队。

闵采尔实在忙极了，不仅要考虑决策上的问题，而且还得过问一些具体事情。他此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德意志的起义军团结起来，让那些没有起义的地区尽快起义。

托马斯·闵采尔在给山区的信中说：

“开始吧，为上帝而战。是时候了，把你们的弟兄们团结起来，立即制止嘲弄神圣的证言；他们不听从，就坚决地、全部地消灭他们。……我唯一的担心是，一些糊涂人还不能分辨利害，同意缔结骗人的协定。……前进，前进，前进！恶人如丧家之犬已经绝望。要在乡村和城市鼓动起群众，特别要鼓动矿工和其他好汉。我们决不能再沉睡了。我很想亲自告诉弟兄们，我已经得到消息，现在我只能写这样一封信，他们的心应该比世上不敬上帝的恶人的一切宫城和铠甲更加坚强。前进，前进，前进！烈火正旺！让你们的宝剑染上热血，要在战神的铁砧上把恶卜砸烂，把他们的碉楼掀翻。你们要真正表现出好汉的气概，你们会得到上帝的帮助。……坚持正确的信仰，服从上帝的意志，上帝会增强你们的力量，你们就不会惧怕

他人。阿门。”[1]

托马斯·闵采尔于结尾处署名时写道：

“上帝的奴仆，反对不敬上帝的人托马斯·闵采尔。于1525年，米尔豪森。”[2]

他也给其他地区的农民写了信，号召他们起义，并团结在一起，与贵族作战。他的预言与设想实现了——从哈尔茨山直至维尔次堡，农民的军营已经一座连着一座了。

“你们不要让那些行尸走肉吓倒，大胆地攻击敌人吧。”闵采尔最后一次对农民讲话时说。

托马斯·闵采尔虽然看到各处农民均已起义，但他不愿轻举妄动，他要等待时机成熟时行动。他要等一切条件成熟以后作为他的后盾，等到由于时代和自然的发展而使革命力量强大，有完整的组织；等精通战斗的坚强的矿工围绕着他；等上士瓦本农民军及其他地区农

---

① 威廉·威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第70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第1版

② 威廉·[illegible]：《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第707页。

民起义队伍对诸侯战斗取得最初胜利的时候，他才动手。

闵采尔了解人民，他们总是把真心和信任交给那些总是欺骗他们的诸侯和贵族。他此时害怕的不是诸侯向他们武力进攻，而是他们的奸计，欺骗人民的奸计。

托马斯·闵采尔面前有许多不利因素，使他更不敢在不成熟的时候起义。他知道，米尔豪森人从未经过战阵，与在战火中长大的士瓦本人不同，对所有的有关战争的知识不懂。射击、冲锋，都是他们生疏的字眼，他们熟悉的只有锄头，那是他们世代使用的工具，是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一部分取获工具。

米尔豪森周围也没有大规模战斗用的大炮和火药，别的城市宫廷中有一些，但米尔豪森没有。托马斯·闵采尔派人去火药市场纽伦堡购货。武装不良是他的一大块心病。

闵采尔始终认为，只有武力才是拯救人民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旧世界的废址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才是美好的，任何与旧世界的妥协都是危险的，不可取得。所以他的精力放在筹备力量上了。在武力不足的情况下，他不敢唐突

起义。

托马斯·闵采尔的另一大阻力是来自他的战友——普法伊费尔。此时，两人对时局的判断完全相反，普法伊费尔要求迅速与领主作战，而闵采尔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农民的热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就很难控制，他们也不听闵采尔的劝告，要求出征。

普法伊费尔认为闵采尔踌躇不决，耽误了大好时机；闵采尔则认为力量远远不够强大，邻近的农民又没有完全发动起来。普法伊费尔对闵采尔的劝告根本不入耳。

普法伊费尔与闵采尔一样，对农民的解放负有一种使命感。但他们又不一样，闵采尔高度燃烧的热情之下有一颗冷静的头脑，而普法伊费尔则在热情的火焰下被烧得多少有些失去理智。

普法伊费尔似乎感到有一种力量推他走向战场，而闵采尔则说他心中的神灵阻止他立即作战。普法伊费尔于是编造了一个梦象，并把它公布于众。他说，梦见自己身穿铠甲站在一个里面尽是老鼠的粮仓里，他将它们杀的杀了，赶跑的赶跑了。这意味着神灵命令他消灭

图林根境内和艾希斯费尔德土地上的一切贵族地主。图林根民众都响应普法伊费尔的号召，准备与他一同战斗。

托马斯·闵采尔十分清楚，过去他依靠的群众组织，现在已经成为计划的破坏者，而反对他的主张。群众有的只是热情，并没有判断形势的分析能力，这是事实。

普法伊费尔威胁闵采尔说，如果闵采尔仍然反对他出兵，他就组织民众反对他，甚至驱逐他。这一切可能会发生，但闵采尔不愿看到，只好听任普法伊费尔去做他想要做的事，而没有办法。

普法伊费尔率领他的信徒袭击了大主教的属地艾希斯费尔德，俘虏了几个贵族地主，抢劫了教堂、修道院以及一切贵族的家产，将俘虏与财物一同运回米尔豪森。途中，他们对这些剥削他们的贵族拳脚相加，倾泄他们压抑已久的积怨。

闵采尔此时显得十分被动。普法伊费尔的行动使他自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伟大英雄。闵采尔虽然知道此举的后果，但他却劝说不了民众。

为了使自己保持在民众中的地位，使自己的信徒依然追随自己，使自己的影响留在人们的心目中，闵采尔决定亲自出征。此时，朗根萨尔察发生了一次暴动，为他的决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1525年4月26日，托马斯·闵采尔由400多外地士兵组成的卫队去援助那里的农民弟兄，他们的旗上有彩虹，旗色为白色。闵采尔的队伍在城门前受到十分盛情的款待，然后他们继续进军，直至廷格达，获得了很多的财物。在朗根萨尔察内战斗中取得胜利后，农民杀死了很多贵族及其家属，抢走了他们的财物。农民在城破后准备把西蒂希·冯·贝尔莱普施的长子埃里希·福尔克马尔从窗口抛出去摔死，但由于他的母亲献出了很多财物，闵采尔答应免去其一死。

闵采尔他们在城门前受到热烈的欢迎，一大群艾希斯费尔德人赶着9辆大车投奔他的帐下，车上满载着抢夺来的世俗领主与僧侣领主的财物，甚至连教堂的大钟也给运来了。闵采尔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骑着马与他们并肩而行，给他们讲道，最后将抢夺领主的财产

分给他们。

这次作战后，新归附的农民要求他带领他们向艾希费尔德腹地挺进。闵采尔没有这么做。他带领军队向海利根施塔特奋勇行进，并在那里打一个漂亮的战斗。全歼贵族军队，并俘虏了大量贵族士兵。经教育，这些士兵有的投入农民军一方。在这座城市，农民按习惯抢夺了大批的贵族财宝。

但是，他们在艾希斯费尔德及杜德尔施塔特都未停留多久，又去攻打别的城市去了。与此同时，普法伊费尔在其他方向开始进军，把领主们赶出官邸，抢掠他们的财物，捣毁了施洛特海姆、比辛根、阿尔门豪森、泽巴赫、阿恩斯贝格等宫城。

自4月30日至5月12日间，闵采尔和普法伊费尔率军横扫了从哈尔茨山麓至翁施特鲁特河入萨勒河的河口这一广大地区，又从伯爵领地格鲁本哈根、霍恩施泰因和施托尔贝格到弗赖堡。

托马斯·闵采尔的军队几乎把平原上所有的修道院都占领了，并抢掠了这些修道院中的一切可用财物。“为圣战的目的而没收过

来”说明他们没收财物时主要为备战做准备。被农民军占领的修道院很多，其中有伊尔费尔德、诺德豪森、朗格伦、伊尔森堡、特鲁比克、朔文、赞格豪森、布歇尔施泰因、瓦瑟雷尔、福尔克罗德、巴伦施泰特、瓦尔肯里德、克尔布拉等地的修道院。有少数修道院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把修道院放火烧了。在伯爵的领地曼斯菲尔德，他们袭击了罗德、维梅尔堡、西蒂申巴赫等修道院和在艾斯勒本的修道院，烧毁了那里的木牢房。

托马斯·闵采尔的顾虑终于不幸地被证实了，他们过早地暴露了实力，过早地不得不和比他们强大得多的诸侯势力决战，失去了积聚力量以便一举击溃诸侯的大好时机。此时，闵采尔不得不迎着战火走上前去，因为诸侯的队伍开过来了。

走在诸侯军队最前列的是黑森侯爵菲利普的军队。黑森侯爵虽然仅21岁，但却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他于阿尔斯费尔德把他的臣属和他的邦内各城市的军队集中在一起，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演讲。他说，闵采尔、普伊费尔及其农民军是天地同罪不容赦的妖人，号召人

民为他而战，为上帝而战。最后，他要求他们表态，民众及各城市军队都举手宣誓，说要为他及上帝效死命。

于是他带领军队大踏步地逼向农民军。而农民军队此时却撤至富耳达。农民军队派代表同他举行和谈，要求他接受农民军的十二条款，理解农民的行动，将军队撤回或加入农民军队。

菲利普侯爵却说，农民除非脱离象闵采尔那样的暴徒，并保证服从他，就可以允许他们投降，否则将严惩不赦。

离菲利普前军较近的是布亨的基督教同盟的军队，他们不满意菲利普的劝告，动手加强自己的实力。这一地区的农民军首领是多尔霍布特，他检阅了由参加同盟的城市部队和布亨地区的很多骑士组成的农民军队。他说，你们的敌人已经逼近了，不要怯懦，战胜贵族是我们父老及人民的共同愿望。

1525 年 5 月 3 日，菲利普率军急速进至富耳达地区附近的弗劳恩山前，准备与各地农民尽早作战。他害怕农民军队在短时间内联合在一起作战，并在战斗中互相援助。也害怕农

民军队武备好起来。那样，贵族带领的军队在战斗中就难于取胜了。

为了抗击来势汹汹的菲利普带领的军队，农民军仓卒间还是加强了已被破坏了的弗劳恩山的工事，并据守城池与宫城。但是，农民军缺少大炮，而侯爵的大炮很多，炮药又充足。侯爵命令军队先以猛烈炮火轰击弗劳恩山，然后令军队猛冲。农民军抵挡不住强大火力的攻击，终于退守城市和修道院中。

菲利普侯爵占领弗劳恩山后，对守在城内的农民军进行长时间炮击。市民阶级打开城门迎接侯爵的镇压农民军的贵族军队。

农民军这时早已溃不成军，他们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他们一经强大火力攻击，便溃不成军，四下奔逃。农民军首领深入农民军第一线作战，但仍是阻止不了他们逃散。1500多农民撤进宫城的壕沟。

侯爵命令他的军队：

“不允许接受农民军的投降，坚决惩罚这些上帝的罪人。”

侯爵将这些农民围困了三日三夜后，才允许他们出来。侯爵将农民军领袖汉斯·多尔霍

布特、黑内·维尔克·约翰·库格尔和汉斯·冯·罗姆及农民的战地牧师抓起来。临斩时，他调笑地对他们说：

"庇护你们的黑军和保佑你们的新教上帝，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随即命令将他们斩首，并将头颅用梭镖挑着插在城门上。而那些战败的早已饿得半死不活的农民军战士被侯爵勒令回家去了。

正如闵采尔估计的一样，农民起义还没有成熟的条件，农民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能完成反抗贵族的事业的程度。当侯爵军队用大炮攻击布亨农民军，用大刀砍去他们农民兄弟的时候，上法兰克尼亚农民正在悠闲自在地开会；奥伯埃尔斯巴赫的装备优良的4000农民军正如痴呆儿一样，在霍恩勒恩山上，呆呆地站着。他们好象与此事无关，不知道侯爵杀的是他们的农民弟兄，而使侯爵得以疯狂地镇压了布亨的农民军队的起义。

侯爵的军队在消灭了布亨的农民军队以后，仍然未遇到上述两支军队的拦击，从容地开赴萨克森地区去援助他的表兄镇压农民军队。

此时，各路诸侯纷纷组织军队开赴战争前线，镇压那些要反抗他们统治的农民。海因里希·冯·不伦瑞克公爵率军与菲利普侯爵在埃森纳赫城前会师，然后迅速占领该城。占领埃森纳赫城以后，他们同样对农民军队进行了血洗，24个市民和农民，其中包括牧师保罗，被他们在市场上给斩首示众了。

贵族军队不仅憎恨农民军队，也恨那些使农民起来与他们作对的传教士。他们入城后，把所有的传教士都抓了起来，关押在一间破房子里。著名的传教士施特劳斯博士也在其中。

诸侯贵族的军队从埃森纳赫开到朗根萨尔察。经过战斗，诸侯们的军队以优势兵力击溃了农民军队的顽强抵抗，攻下了此城。入城后，格奥尔格公爵下令将41个农民军人在广场上斩首，并对农民军队的士兵施以罚款，总额高达7000古尔登。

侯爵菲利普率军追赶瓦哈农民军队，但这支军队的首领却带军经过米尔豪森附近，转向弗兰肯豪森城了。

农民的军队多半没有象闵采尔那样有理智的首领，他们不知道自己与领主是绝对对立

的两大阶级，却妄图与领主进行讲和，以不流血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错了，犯了致命性的错误，并且一错再错，直至诸侯的军队集中起来攻击他们，他们有的还未清醒。

瓦哈农民、施瓦茨堡农民以及曼斯费尔德尔德农民军一同驻扎在弗兰肯豪森。在诸侯们调兵遣将的当头，他们却在城中设想与阿尔布雷希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谈判成功，而不去攻击正处于孤立无援地位的这位伯爵。

伯爵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要与农军拖延时间，直至诸侯赶到才能同农民军开战。为防止农民军攻击，也为了准备反攻农军，他对自己领地的矿工许下了很多动听的诺言，给他们很多钱，少征、甚至不征他们的税。矿工们听信了他的话，不去投奔农民军队。

而对于农民军，他使用软硬两手。他命令少数骑兵埋伏在山里，装成大队骑兵就在附近的假象，以便吓唬农民军队，使他们非但不敢进攻，而且加强了他们的谈判欲望。同时，曼斯菲尔德伯爵巧言唬骗聚集在弗兰肯豪森的农民军队，说他可以极力在领主们面前说好话，免去这场战争。并许诺说，可以在他们的

领主来时给他们保证安全，还可以回原来的住地。农民又一次给他骗了。

曼斯费尔德伯爵派出大批使徒在农民军中做工作。他同时又派兵袭击了埃德斯雷本和普菲弗尔的农民军队。但农民军队依然不醒悟，相信此人是个可以谈判的“君子诸侯”。

哈尔茨的山民邀请曼斯费尔德伯爵于5月12日在马廷斯里德的桥上谈判，企图与之达成妥协。曼斯费尔德伯爵并未赴会，他说有事在身，一定要待一周以后。其实，伯爵在等待他的援军。他估计，结盟诸侯的军队一周后肯定会赶到这里，那时方可对农民军下手。可农民军并不知晓这一点，他们在营中静待着下周的到来。

与此同时，住在黑尔德龙根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则公开与农民军作战，攻击当地的农民军队，火力十分猛烈。这一些地区的农民军派人请求米尔豪森的市民与农民支援他们，去消灭那里的暴君。

闵采尔主张支持那里的农民军。普法伊费尔则不同意，他只愿攻击那些笃信旧教的贵族，而不肯攻击新教领主。托马斯·闵采尔只

得亲率300人的卫队，开赴黑尔德龙根支援他们，并带了几门大炮。

由于菲利普侯爵攻克了富耳达地区农民军的营寨以及埃森纳赫农民军的败绩，给农民军的前途罩上了极大的阴影。埃森给赫城头的人头，使米尔豪森市民十分害怕，不敢行动了。诸侯的残酷屠杀镇慑了农民队伍。

闵采尔看到形势严重，就写信给埃尔福特人说：

“你们应当派军队大炮前来助战，反抗不敬上帝的暴君，以完成上帝亲自命令的事业。”

接着他又说：

“我们的轮舞刚开始，你们协助穷苦的基督教，我们会诚心地给你们报酬。”

闵采尔同时给其他方面的农民也写了信，要求农民军相互增援。

托马斯·闵采尔到达弗兰肯豪森后，一眼便看穿了阿尔布雷希特的骗局。他号召农民军必须停止与伯爵的谈判，立即以重兵攻击伯爵的根据地。

他也给阿尔希布雷伯爵写了信，要求他放弃欺骗农民，投到农民一边来。他说：

"你以为我主上帝不能激起他的无知无识的子民来推翻暴君吗?你以为上帝对于民的关心不及对你们暴君吗?……你应了解上帝怎样授权平民，愿意同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也愿意把你当作一个普通弟兄。如果不肯，我们就象对待基督教的死敌那样向你开战。"

他深入农民军营地,向首领及战士们讲解贵族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警告他们之间根本无话谈。要么消灭贵族，要么被贵族消灭。

他又给曼斯菲尔德的另一个伯爵——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以庄严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吻说:

"你完全应当在安全护送下为你尽人皆知的暴政向我们请罪。如果不来请罪，你就必然要被消灭。我可以告诉你，永生的主已经命令我们，如果你不肯向我们这些小人物低头，那么我们就要运用主授予我们的权柄把你推下宝座。因为你对基督教世界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你是信奉上帝的人的灾星。至于你和你的伙伴,上帝已经说过了,应该砸毁你们的巢穴。限你今天答复,否则农民军队将以上帝的名义

惩罚你。我们马上就要按上帝的命令行动，望你好自为之。”

托马斯·闵采尔在两封信的末尾署名都是：

“带着基甸刀的托马斯·闵采尔。”

基甸是《旧约》在《士师记》第七章中记载的一个人物，他奉神命率领以色列人夜袭敌人，口号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闵采尔自称是“带基甸刀的托马斯·闵采尔”表现出他与诸侯贵族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他要以上帝的名义与敌人相搏。

托马斯·闵采尔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尽管头脑很冷静，但他给两位伯爵的信中语言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了。他的信，表现出一位伟大的农民儿子的光辉形象，这种形象是崇高的，使人望而生敬意。他的品格，是一个伟大农民儿子的光辉典范。他骨子里流的是农民的血，想的更是农民的疾苦、农民的解放，他要拯救这个不幸的阶级。他的激情冲击他的灵魂，他象一个上帝的使者，正挥动基甸的刀砍向农民的仇敌。

托马斯·闵采尔很清楚形势严峻到何种

程度。现在，他的军队没有充足的弹药，而他派去纽伦堡买弹药的瑞士人却携款潜逃了；他的军队全由一群没有正规训练的农民及市民组成，如乌合之众一般；更重要的是，农民军队没有一个是深谙战争艺术的将帅。

7个联盟诸侯正率领大军从四面开来，而农民军的力量用来对付一个诸侯尚且不充足，何况是7个？

托马斯·闵采尔不是一个将帅，但他现在又必须是将帅。他的内心很痛苦，他坚信自己经过磨练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将帅。但这一切需要时间，不知命运是否会给闵采尔和他的军队学会如何打胜仗的时间。

诸侯的军队正在磨刀！

闵采尔感到军队的素质不足，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正规军人的水准，而且必须经过实战。他开始征兵，下令不来打仗的农民就派人抓来。于是农民便从弗兰肯豪森附近村庄赶来城内向他报到。但是，农民的素质差不仅表现在战斗力上，他们的觉悟远远不够发动起义的水平。尽管有的农民听到闵采尔的召唤，十分坚决地跟在他的后面，可大多数人却在恐惧，

他们害怕强大的诸侯军队。

距离弗兰肯豪森远的农民，他们不是急于赶去弗兰肯豪林集中，准备作战，而是沿途处处耽误，抢劫修道院与牧师的住宅。他们抢劫时也真勇敢，争先恐后。诸侯看到了这一情况，为了阻止更多的农民聚在托马斯·闵采尔的帐下，他们派骑兵四处袭击正在途中的农民。在奥斯特豪森一处就杀死了近200多农民，而且其他的农民也四下奔逃了。

农民的士气更加低沉了。闵采尔劝诫众人道：

“弟兄们，抬起头来，上帝正注视着你们，勇敢些！”

诸侯的军队的确要比闵采尔的农民军强大得多。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黑森侯爵和不伦瑞克公爵的联合军队总计有2600多骑兵，6000名步兵及许多大口径的大炮，而且萨克森的新选帝侯约翰率领2400名步兵、800名骑兵加紧赶来。形势对于诸侯一方确实极为有利。

3个诸侯的联军一到弗兰肯豪森，便与闵采尔的军队打了一次小仗，双方伤亡都很小。

黑森侯爵与格奥尔公爵看到部下由于急行军而疲惫，就退却了。

托马斯·闵采尔察看了弗兰肯豪森周围的地形，将军队扎营在一个可以俯瞰这座城市的高地上。他在山周围下令布置坚固的车垒，掘了一道壕沟，以使敌人威力比较大的骑兵难于接近他们。

闵采尔的军队只有8000人，既没有精通作战的指挥军官，士兵又多怯阵；有的人虽力主作战到最后一刻，也有的人只待议和。

如果诸侯此时全力攻击托马斯·闵采尔的农民军营地，这些农民军，不论主战的也好，主和的也罢，均会全力以赴抗击诸侯军队的攻击。可是，黑森侯爵与格奥尔格公爵却向农民提出和平建议，给农民军写了一封信，说只要交出他们的首领，他们二人可以保证农民军士兵无事。

农民军的弟兄又一次被诸侯欺骗了，他们也写了回信，说他们信奉耶稣基督，如果诸侯也信仰基督，他们绝不和诸侯对敌。更严重的是，先前被迫加入农民军的贵族，这时极力主张议和，使军心大为动摇。

农民军派汉斯·冯·韦特恩、沃尔夫冈·冯·施托尔贝格与卡斯帕尔·冯·吕克斯雷本3个伯爵去同诸侯谈判，要求赦免所有的人。诸侯同意休战三小时，要求农民军无条件投降，并交出他们的预言家托马斯·闵采尔及其信徒。这样，农民军的士兵或许会得到他们的宽恕。

3人回到营地后，农民军极为慌乱，又派他们去同诸侯谈，要求也赦免闵采尔。但诸侯此时已做好进攻准备，将施托尔贝格与吕克斯雷本扣留，让韦特恩回营地通知农民，必须无条件放下武器，否则他们将全力消灭农民。

贵族在农民军内部开始制造混乱，并策动叛变。托马斯·闵采尔及时地平定了叛乱，并下令将这个贵族与传教士斩首示众。接着，他对全体士兵讲了话，鼓励他们为自由而战，为上帝而战。

他的一些狂热信徒依然追随他，准备在此绝地与诸侯决战，以便求得生路，因为诸侯已经堵住了他们议和的道路。

但是，闵采尔却十分痛苦地看到，他们多么地怯懦。在他们心中，自由还没有使他们坚

强起来。而闵采尔本人将伟大的事业托付给这样一群人，将是多么地冒险。

形势已如箭在弦上，紧张万分，除了战斗，别无出路。托马斯·闵采尔对农民弟兄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布道。

他的语调并不是十分快速，却很坚定、沉着，充满对事业的必胜信心。他说，所有的诸侯都是暴君，是不敬上帝的恶人，他们吸干穷苦农民的血汗，自己却过奢侈淫荡的生活；他是上帝派在人间消灭诸侯的使者，是奉上帝之命行事的；上帝亲口答应过他，要保佑穷苦的农民，消灭不敬上帝的人。

他坚定地说，诸侯害怕农民军的进攻，故而散布使农民军不和的谣言。他鼓励人们不要因为人数少而害怕，约拿单、大卫与基甸不都是以上帝的名义以少胜多吗？

讲着讲着，闵采尔的情绪激昂起来，仿佛上帝正在他身边，催促他完成使命一样。他最后说道：

"你们不要让那些行尸走肉吓倒，大胆地去攻击敌人吧。你们用不着害怕枪弹，因为你们应该看到，我会用袖子接受一切射向我们的

子弹。”

这时，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这彩虹绕着金色的太阳，绚丽夺目。托马斯·闵采尔立即与他们的白底上镶着彩虹的军旗联系在一起。他激动地对士兵及信徒说：

“你们快点看哪！上帝是同我们在一起的。他现在天宇间以彩虹昭示我们了。你们看天上这道彩虹，它是要保护我们军旗上带彩虹的人。弟兄们，残暴的诸侯就要完蛋了！上帝不愿意你们与那些不敬上帝的人讲和。你们放心大胆地战斗吧，有上帝在保佑你们！”

托马斯·闵采尔本想以宗教信仰鼓起那些怯懦人的勇气，哪怕一个小时的勇敢也好。他的布道，对于那些信徒及易受感染人的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表示要誓死斗争到底；而那些早已失去信心的人，却对闵采尔的讲话无动于衷。

闵采尔的布道作用很大，他的信徒又热烈地欢呼起来。他们认为闵采尔的思想是正确的，是奉上帝的旨意的，必须执行。这时，闵采尔的信徒占据了优势。他坚决要同诸侯开战，不再讲和，全体农民通过了。

闵采尔激动了，他问农民军士兵：

“那么你们想如何？还想把我交给诸侯吗？”

闵采尔的信徒高呼：

“不会，不会，我们愿意在这儿团结一起，同生共死。”

接着，他的信徒开始唱起庄严的歌曲：来吧，圣灵，我主。

诸侯答应考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还有一个小时的和平，他们坐下休息，幻想。这时，所有诸侯的大炮一齐发作，骑兵、步兵开始冲锋。决战开始了。

诸侯不考虑他们曾许下休战三小时的诺言，突然间以全部兵力攻击农民军营地。农民军毫无防备，很多人被击毙，更多的人不知所措，惊慌地逃跑。车垒、壕沟已被诸侯军队攻破，农民军死的死，逃的逃。

托马斯·闵采尔从大营中挺身而出。他身披先知的大衣，大声喝止士兵溃逃，但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这时，他的8门大炮均已陷入敌手，大部农军撤离了有利的抵抗位置，逃往弗兰肯豪

森。只有一小队人马正在顽强地抵抗敌人骑兵队的攻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伤亡。后因寡不敌众，阵地终于陷落了。

大队农民逃向弗兰肯豪森，途中也对诸侯军队的攻击作了抵抗。待他们进入城市，城内埋伏好的诸侯军队杀出，农民军手足无措，被杀的更多。在城内与山上被杀的农民有5000人之多。

诸侯军队是逢人便杀，俘虏也要杀。300名俘虏被押到市政厅前，准备行刑。这时，一大群妇女跑来跪求行刑的骑士，一个骑兵心软了，把这些妇女的丈夫全放了，但其余人仍被斩首示众。

农民军呈鸟兽状逃往哥达、埃森纳赫及附近山区。

诸侯出重金悬赏托马斯·闵采尔的首级。他们要彻底消灭农民军的领导者。

弗兰肯豪森被占领了，闵采尔不幸被捕。面对诸侯的酷刑，他泰然自若。“忏悔？绝不！”“千年王国一定会实现。”简短的话语使诸侯们惊恐、愤怒。托马斯·闵采尔，一个伟大的农民战争领袖，终于死在了诸侯的屠刀之下。临刑前，他仍面带笑容。

农民军的军营被攻占后，闵采尔看到无抵抗的可能，遂随同农民军的战士逃到了弗兰肯豪森。后面诸侯的骑兵正在飞速地追赶。一进弗兰肯豪森市中心，他便匆忙躲进诺德豪斯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他上了阁楼，脱去先知式的大衣，把头缠好后，躺在床上。

诸侯攻掠城池的头几天，托马斯·闵采尔一直很安全地呆在这幢房子里。

弗兰肯豪森遭劫几天后，吕内堡的贵族奥托·冯·埃伯住进这幢房子里。贵族的仆役收拾房间时发现了闵采尔，但他不认识闵采尔。闵采尔说他害了热病，身体很虚弱，在这儿已经躺了几天了。这个仆役想从闵采尔身上搜点

东西，结果却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写给农民军的信搜了出来，闵采尔身份暴露了。贵族奥托·冯·埃伯把闵采尔送交给诸侯。

托马斯·闵采尔落入了诸侯之手，弗兰肯豪森的农民起义彻底失败了。

农民军队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穷凶极恶的诸侯势力强大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农民自己，在于他们扎根于德意志政治、经济分裂状态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促使他们在对诸侯作战中不能共同行动，领导上统一，相互援助，而是各自为战，只是在自己狭小的家乡作战。正因为他们狭隘，便不能共同对德意志农民的敌人——诸侯构成威胁，而被诸侯的联盟各个击破。

德意志农民此时虽处于诸侯的残酷剥削压榨之下，但却不觉悟，托马斯·闵采尔曾称他们为："无知无识的农民"，这并不过份。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思想在这些农民身上体现得很完善。他们不愿同雇佣兵共同分享虏获品，因而坚决反对征招雇佣兵对诸侯作战。

几乎各地农民军队都受诸侯的欺骗，企图

与诸侯达成妥协。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天大的笑话。诸侯利用农民的无知，使他们疏于防守，以致于各个歼灭。

农民的觉悟还远没有达到推翻旧世界的水准，他们天性就是无知的，因为他们是小生产者，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战争只能失败。

弗兰肯豪森的会战失败后，克莱滕贝格与施瓦茨费尔德的农民才姗姗来迟；而在5月14日晚，他们不去援助自己的弟兄，却在弗拉里希斯外层要塞享受了一夜，致使那里的农民孤立无援而失败。而且，这些农民在享乐以后，一听到弗兰肯豪森失败的消息后，立即溃不成军，各自奔逃回家乡去了。

至5月19日，米尔豪森的农民军写求援信给上法兰克尼亚农军，向他们叙述了诸侯在弗兰肯豪森如何欺骗农民军，如何袭击农民军，以及如何残杀农民弟兄的事。而现在，诸侯将要报复米尔豪森城，如果米尔豪森陷落了，他们马上会去攻击法兰克尼亚。米尔豪森农军以上帝的名义请求上法兰克尼亚农民军等迅速驰援他们。

上法兰克尼亚对战机一误再误。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就会在黑森侯爵初到埃森纳赫附近的山区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兵力尾随并消灭这支诸侯军队，但他们没有。当米尔豪森农民军向他们呼吁求援时，他们如果把农民集合起来占领埃森纳赫以南山口，使诸侯的有力武器骑兵与重炮都发挥不出威力，形势仍会有变化，但他们仍然没有这么做。

上法兰克尼亚的农民抛弃了富耳达的农民，也抛弃了弗兰肯豪森的农民。现在，他们又要抛弃米尔豪森的农民弟兄了。这正是农民的狭隘性与不觉悟的直接表现，农民起义失败则是它的直接后果。他们不去图森根援助米尔豪森的弟兄，却向班贝克地区移师，宣布在施魏因富特召开法兰克尼亚的普通邦议会。他们好象与正在发生的战争毫无关系，置身世外桃园一般。

5 月 23 日，米尔豪森第二次给上法兰克尼亚农民军写信，要求火速增援。并严正地指出："如果我们垮台，你们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勇敢地援助我们吧，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上法兰克尼亚此时正忙于它的内部事务，

对米尔豪森的诸侯军队听任他们攻城。上法兰克尼亚农民军正讨论不同的战地长官与牧师如何正确解释圣经的问题。而且，农民军的地方行政长官、勒姆希尔德的金匠海因里希·克鲁姆普富斯声明自己有病，不能带兵作战，于是由柯尼希斯霍芬的市政府秘书汉斯·马特尔接替了他的职务。军事总指挥施纳贝尔只因为几句话，就被怀疑有叛变行为。这一切，不仅延误了增援米尔豪森，而且削弱了自己的防卫力量，使大批有能力的指挥官被迫离开自己的岗位。

就在上法兰克尼亚军队延误战机的时候，农民军的坚固堡垒——米尔豪森被诸侯军队攻克了。

米尔豪森自5月19日就受到了选帝侯、菲利普、奥托·冯·不伦瑞克以及其他的联盟诸侯军队的三面合围。普法伊费尔表现十分坚强，率领1200名武装市民进行殊死抵抗，给攻城诸侯军队以很大杀伤，并把储备物资存放好，准备与诸侯作长期斗争。诸侯又故伎重演，派人给米尔豪森城内的市民送去一封信，要求他们只要无条件投降并交出起义首领，保证可

以使他们安全。一些市民禁不住诱惑，有与诸侯和谈的倾向，但普法伊费尔坚决反对。但是，诸侯的进攻愈来愈猛，并在城墙上用炮轰开了一个缺口，而且米尔豪森的援军终于杳无音信。市民们开始害怕诸侯破城后的屠杀了，他们终于不顾普法伊费尔的反对而与萨克森选帝侯开始接头谈判。

普法伊费尔知道一切都完了，米尔豪森城守不住了，便于1525年5月24日夜间率他的信徒400多人秘密出城，准备投奔上法兰克尼亚的农民军。

米尔豪森城破后，托马斯·闵采尔的妻子也被抓住了。一个骑士公然跪在她的面前，不顾她身怀有孕的情况，竟要求她委身于他的情欲。

悲哉！德意志的农民；悲哉！伟大的托马斯·闵采尔。

这个伟大战士的妻子竟也逃不出诸侯的魔爪。闵采尔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不堪受辱，撞石而死。

马丁·路德是坚决反对闵采尔的观点及其行为的，但他知道逼死闵采尔妻子时也大为

愤怒，他的良心驱使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忧虑过两件事：如果农民当了主人，魔鬼就要当修道院院长；如果这样的暴君当了主人，魔鬼的母亲就要当女修道院院长。"

米尔豪森的指挥官普法伊费尔逃离后，诸侯们估计他会越过图林根森去投奔法兰克尼亚农民军队。在米尔豪森城破后立即派一支骑兵追上了普法伊费尔。结果，普法伊费尔与92名信徒一同被生擒回米尔豪森。诸侯立刻判处他死刑，就地执行。普法伊费尔以一个革命家的气概，视死如归，光荣就义。

托马斯·闵采尔被俘后，诸侯对他进行了审讯。黑森侯爵菲利普企图沿用对路德的方法向眼前这位早已众望所归的改革家解释圣经关于叛乱以及官厅的章节。托马斯·闵采尔听到这位狗屁不通的侯爵的讲话，高傲地抬起自己的头，不置一声。但侯爵却以为这种缄默是被驳倒的表示，十分高兴。

诸侯们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逼问农民起义等一些问题。诸侯问他：

"你为什么要诱惑穷苦的人民投入这样一场残酷的大屠杀?"

托马斯·闵采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

“我起义惩罚诸侯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诸侯反对上帝，残酷地压迫基督教徒，应该约束诸侯了！虽然农民被打败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我的错！”

格奥尔格公爵一边拷打闵采尔，一边问道：

“喂，托马斯，犯上作乱使你吃尽了苦头，但却没给那些为你丧命的人带来好处。”

但闵采尔却只回了一句：

“是的，他们认为非这样做不可。”然后便不再言语了。

众位诸侯命令把他绑在大车上，当做战利品送给了恩斯特·冯·曼斯费尔特伯爵。

这个残暴的贵族对闵采尔施加的刑法之残忍，令人发指。闵采尔昏迷醒来时因高烧一连喝了12大罐的水。诸侯逼问他与其他农民军联系的情况，可闵采尔一直不开口。最后，他说了阿尔施泰特、米尔豪森、阿名斯累本、沃尔弗罗德等地的盟友姓名，但这些人早已阵亡了。对于诸侯，这个供词一点用处也没有。

托马斯·闵采尔在狱中时，写信给米尔豪森人，劝他们寻求诸侯对城市的宽恕。最后，他满怀深情地谈到他的妻子，一个伟大的妻子。要求众人照顾他的妻子，不要让她受辱。

闵采尔也同样斥责了农民中的自私自利的狭隘习性，认为这样会断送农民革命的前途。

米尔豪森失陷后，闵采尔被诸侯从黑尔德龙根的地牢中提出来，准备斩首。他们对这个农民首领无可奈何。

临刑时，他的周围站了一大群人。格奥尔格公爵以为“死”总可以使托马斯·闵采尔有些转变，于是走到他跟前，说：“托马斯，你脱离了自己的教派，摘掉了神圣的僧帽，又娶了妻子。你追悔吧！”

托马斯·闵采尔挺直了他满是伤痕的身躯，作了他人生最后一次讲演。他的精神依然那般倔强。在人群中，他以他特有的激情向周围的人说，他确是冒险做了过于伟大的、超过他的能力的事业。

他转向众位诸侯，劝诫道：“你们应该多读一点圣人的书，尤其是《列王记》与《撒母

耳记》，那里记载了许多暴君的下场，如果想逃开那一悲惨的下场，还是不要再虐待你们的臣民了。”

闵采尔讲完后，不再言语，静待死神的来临。此时，他的心中浮现了他妻子那美丽的脸庞。他笑了，笑得那么甜。

这时，刽子一刀砍下，结束了托马斯·闵采尔的生命，结束了一个光辉的时代。

闵采尔的头被插在一根沙德贝格的木桩上示众。

托马斯·闵采尔，这位勇敢的德意志青年，这就样被杀害了，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不幸。

闵采尔死去了，他的敌人无不拍手称快。但是，他们忘记了，在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人面前，外形的身躯死亡决定不了他的成败，他的思想将证明他是胜利者。

闵采尔死后很久，还有大批的信徒在图林根把他当做伟人来尊敬，把他那些激烈攻击诸侯与教会的文章当做圣人的著作来读，认为他的言论及行为是对上帝的真诚。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妄加评论。

他的思想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时代，所以没有被时代所接受。时代误解了他，时人嘲笑他。但被后人嘲笑的，正是那些曾经嘲笑过闵采尔的人。

路德是闵采尔在事业上的对手，闵采尔的死对路德震动很大。他对闵采尔的品格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在闵采尔身上找不到丝毫后悔的表现，直到生命的最后还是那样傲慢，那样顽强。他对闵采尔在狱中及刑场上的表现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但是，托马斯·闵采尔毕竟超出了他的时代，他的思想不合于那个时代，他失败了。

米尔豪森和弗兰肯豪森农民军的失败，使农民军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农民军被诸侯各个击破，最后失败了。

德意志又恢复到原来那种政治、经济的分裂状态中去了，诸侯们依然如故地盘剥市民、农民。但农民战争所遗留下的火种，是诸侯用武力除不去的。

托马斯·闵采尔，一直活在德意志人民的心中。

第五章 拯救德意志的两条道路

1517 年，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经过几年的改革运动，路德愈来愈靠近诸侯，投入诸侯的怀抱。与此同时，托马斯·闵采尔倡导农民战争及“千年王国”思想，主张用武力推翻一切世俗领主及宗教领主的统治。解放德意志人民的两条路在并行、撞击。

1521 年帝国沃尔姆斯会议以后，德意志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宗教派别业已分化组合完毕。逐渐形成的是三大营垒：天主教保守派（也称反动派）、市民阶级温和派（亦称改良派）、农民和平民革命派。

在天主教保守派阵营内，有查理五世和宗

教诸侯以及市俗诸侯和城市贵族。这些人对宗教改革十分反感，希望维持有利于自己的现状和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其他两个派别均主张改革。市民温和派中大部分主要是富裕和中等市民、低级贵族和部分世俗诸侯，他们可以依靠一部分诸侯的支持。他们渴望没收教会的财产，冲破罗马教会的羁绊，建立“廉俭教会”。他们当中的市民阶级还想消除分裂局面，达到国家的统一，市场的统一。世俗诸侯则想乘机提高自己的地位。

革命派中主要有宗教改革中最坚决的平民和农民。他们要求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其中一部分人还要求消灭阶级剥削，把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以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派的领导人是托马斯·闵采尔。

马丁·路德，作为这个时代最先倡导宗教改革的卓越宗教改革家，于1517年至1521年间，尽管在同罗马教会的斗争中有过动摇与怯懦，但他毕竟是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的代言人，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勇气与火一般的热情，给罗马教会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德意志的形势在急剧地变化，使路德在这时也开始发生转变。这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诸侯的怀抱，抛弃了运动中的下层人民。早在1520年他发表《致德意志贵族书》时，已表现他投靠诸侯迹向；而于1521年至1522年在瓦德堡避难时，则是他投靠诸侯的最初行动。

1521年，他通过友人梅兰希通了解到德意志人民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1520年，茨维考城人民组成再洗礼派；1521年，运动波及威丁堡。人民冲进修道院砸毁圣像，殴打僧侣。路德对此十分害怕，于1521年12月发表了《谨告全体基督徒严防暴动和煽动书》，说基督徒的职责即是恭顺，上帝禁止一切暴动，暴动是魔鬼撒旦的主意，应坚持放弃。要用“因信称义”来反对罗马教皇，而不是武力。

此时，路德有了一名比卡尔施塔特教授更为危险的对手，托马斯·闵采尔。

马丁·路德曾于1521年推荐闵采尔担任茨维考一个教堂的传教士，但闵采尔放弃了。闵采尔开始对路德的学说产生怀疑，他要创立另一种学说。他的这一行动使马丁·路德与闵

采尔很快成了敌人。

马丁·路德说，上帝对他的选民主要用圣经中的语句来说话；而闵采尔却认为，上帝把他的旨意写在选民的心中，用的是看不见的笔，选民不应追求财富及职位，也不应追求享受与肉欲的满足。

托马斯·闵采尔的语言最易为广大的平民阶层所接受，他们中有下等市民及农民。1521 年 4 月，反对闵采尔的人在市政会中占了优势，把闵采尔驱逐出茨维考市。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但由于他反诸侯的激进观点而又一次被驱逐。最后，他于 1523 年 4 月来到萨克森选侯领地阿尔施泰特，并在那里圣约翰教堂当上了神甫。他在那里研究神学，并给穷苦人布道，他要求人民争取基督教政府，而反对不信上帝的政府。他的布道，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大批人群拥入阿尔施泰特，听他的布道。

诸侯们很忧虑闵采尔的布道会给农民的暴乱提供信心。于是，1523 年 9 月，曼斯菲尔德的恩斯特伯爵禁止他的臣民去听闵采尔的布道，使阿尔施泰特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出

现了小规模动乱。

托马斯·闵采尔，这个小人物终于引起了诸侯的注意，约翰伯爵及其儿子约翰·腓特烈请闵采尔给他们布道。闵采尔只身勇敢地走入王宫，他准备用布道说服诸侯加入他的事业。在那里，他作著名的《诸侯讲道》。他要求君主们加入反对不信上帝的政府的斗争。

“萨克森的主宰们，为了上帝的福音，你们必须敢于这么做。”

闵采尔的要求当然地被拒绝了，而且不得不逃往米尔豪森市。

路德看了《诸侯讲道》后，十分气愤，也十分害怕。闵采尔的话太易引起下层人民的共鸣了，这样将会影响他的宗教改革事业。马丁·路德迅速写成了《为反对叛乱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他在文章中要求人民及诸侯同“阿尔施泰特的撒旦”作斗争。

闵采尔则通过这一次对诸侯的布道，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诸侯不会站在穷苦人民的一边。逃到米尔豪森后，他发表了一篇《把信仰和不忠诚的世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章，反击路德的观点，提出了另一条改革纲领——

人民改革纲领。他说：

"贱民必须自己教育自己，以便不再受骗……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结果是，不敬上帝者垮台，卑贱者则高升。"

闵采尔把拯救卑贱者当成自己的事业，要他们得到自由，不再受剥削压迫。

托马斯·闵采尔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波动。路德写信给米尔豪森市政会，反对煽动者和肇事者闵采尔。同时，黑森的菲利普侯爵、萨克森的约翰公爵及格奥尔格公爵致信米尔豪森，提出了与路德一样的主张与要求。米尔豪森市政会听从了这些劝告，将闵采尔及其朋友普法伊费尔驱逐出城。

闵采尔被逐出城以后，去了南方高原地区布道。在那里，他看到农民才是改革的强有力的中坚力量。

闵采尔同时对路德进行了攻击。他说："迫不得已对维滕贝格那个行尸走肉进行答辩，此人真是大逆不道，竟窃取圣经，恬不知耻地亵渎可怜的基督教。"

托马斯·闵采尔以人民的救星自居。他说路德是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但他却越走越偏，

他用一种错误的信仰将基督教陷入混乱，他比罗马那个罪恶的杀人教皇还要坏上十倍，并且他半途而废，依靠诸侯势力。这场改革，将由他来完成，而不是马丁·路德。

他说：

"正因为你在沃尔姆斯左右摇摆，贵族才没有刺死你，反而释放你。"

"你很清楚应该诽谤谁，穷僧侣、教士和商贩不能自卫，因此你责骂他们。但肆意践踏基督教，不敬上帝的统治者都又无人过问。"

托马斯·闵采尔给路德写道：

"甜蜜地睡吧，亲爱的走肉！我宁愿闻你被烤焦的气味，你是在你自己的圣地烘烤出来的，所以魔鬼撒旦应该吃掉你。而你却是一块驴肉，熟得很慢，对于你的奶嘴来说，是一道难嚼的菜。"

闵采尔又被纽伦堡驱逐了，他大踏步向起义地区走去。

这时，农民提出了十二条款，并公布于众。十二条款申述了农民生活的困苦及他们的反抗要求，尽管十二条款的语言是温和的，但它也是一把刀、一柄剑，刺向了贵族的胸膛。

路德认为，十二条款的作者即使不是托马斯·闵采尔，其真正作者也一定就在闵采尔的周围，深受他的影响，这是“一个结伙的先知”，而闵采尔与这个作者正是农民战争的造成者。

1525年4月，应阿尔布雷希特的要求，马丁·路德写成《奉劝士瓦本按农民的十二条保持和平》。文中极力攻击农民提出的十二条款是不符合福音与圣经的。最后，他针对官员们尖锐地指出：

“宝剑已经压在你们的脖子上，你们却还认为是稳坐钓鱼台……这种安全感会扭断你的脖子。”

在文中，他告诫农民说：

“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是凭良心在争吵，双方都在维护不公正。”

他认为，这种人是不会得到上帝保护的，这不是上帝的事业。

路德为诸侯的世俗政权大声呼唤，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于1523年3月发表了《论世俗政权，在什么程度上应当服从它》。他称世俗君主与诸侯是神的刽子手，他们的法律及

武力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所以，无论世俗政权多么残酷，基督徒必须服从它，因为这就是服从上帝的意愿。他害怕农民革命，向诸侯贵族献媚，体现了市民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

路德劝人们要用语言，而不是武力进行斗争。

闵采尔于1525年2月来到图林根，与普法伊费尔一同领导米尔豪森的革命运动。闵采尔几乎天天深入人民中去进行布道，要求人民信仰新教，用武力反抗贵族的统治。3月17日，在闵采尔的影响下，米尔豪森选举了新的市政会，普法伊费尔把它定名为“永久市政会”。闵采尔虽未加入新的市政会，但他取得了参加市政会一切会议的权利。

托马斯·闵采尔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他想建立人人舒适的社会制度，那里人人平等，没有剥削。闵采尔称之为“千年王国”。但这种思想对当时的人民要求太高，不仅当时的运动水平没有达到，而且也超出了那个时代。

马丁·路德确知闵采尔的煽动能力。他称闵采尔为“杀人先知”，是撒旦的使者。1525年4月，他亲自巡回施托尔贝格、瓦尔豪森、

曼斯费尔德、魏玛、埃尔福特、奥尔拉明德、卡拉及诺德豪森进行布道，但几乎没有成果。人民早已团结在闵采尔的旗帜下，对他不理睬，甚至鄙视他，用小石头打他，骂他是诸侯的家奴。此时，路德在人民群众中已不再是昔日的反宗教英雄形象了。

路德心中很痛苦，他以前的信徒大都转而信仰闵采尔的革命思想去了。他的布道不再是一片欢呼、遍场的热烈，现在只有人们的鄙视了。他恨农民革命，也恨闵采尔，他暗下决心与闵采尔斗争到底。

正当他到处布道，攻击闵采尔及农民革命时，他的保护人智者腓特烈死去。路德连忙返回维滕贝格，他不知道选帝侯的继任者约翰是否会把他交给格奥尔格公爵审判。但他的担忧是多余的，正如闵采尔所说：

“正因为你在沃尔姆斯左右摇摆，你才没有被贵族刺死，反而被释放。”

非但如此，路德反对农民战争的态度也使诸侯们满意。约翰选帝侯仍然保护路德，而且格奥尔格公爵也不再要求惩罚他。他与诸侯已成为一路人了。

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农民军了。德意志皇帝在罗马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对法国战争的胜利，皇帝查理五世把军队都调回国内，准备镇压农民军。

诸侯们采取了“谈和”的策略。因为农民素质不高，用谈和足可以使他们发生内部不和及迷惑，以至相信和谈。但当诸侯们准备好的情况下，他们便坚决地攻击农民军。

格奥尔格公爵首先对农民军发动了进攻，杀了近千名农民。接着，黑森的菲利普侯爵也向农民军大举进犯。他们二人联手向士瓦本进攻。

路德此时表现得极令诸侯满意，他劝请诸侯不要对农民手软，要坚决给予“暴乱”以镇压。几天后，《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发表。在文中，他劝诸侯道：

“要想到，没有比叛乱分子更恶毒、更残忍了。打击他们的必要性犹如打死疯狗，你不打他，他就打你和你的整个国家。”

面对诸侯的残酷屠杀，路德为他们辩护，说一切是奉上帝的旨意行事，诸侯只是上帝的刽子手；而农民被杀则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死

得其所。

诸侯虽然用不着路德的劝诫就知道镇压农民起义，但路德的劝告农民的话却令他们十分高兴。农民虽然此时不信仰路德的学说，但对于一个曾经领导他们反对罗马的英雄的话，也不得不顾虑。他们听路德说反对农民起义，也很恐慌。路德说诸侯镇压农民起义是保护福音。这样，有的农民开始动摇，而另一些农民则回家去了。

农民此时已与城市中的中小市民结合在一起。中小市民的运动具有不坚定性，他们虽然反对诸侯的暴政，但又不想与之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随时准备与诸侯进行谈判、妥协，甚至背叛农民的伟大事业。

路德规劝那些正在动摇中的市民，不要与农民一同叛乱。而且，谁反对政府镇压农民的叛乱，谁就是反对上帝。

有人讽刺他说：

“他点燃了这把火，现在又乞求诸侯去刺杀、殴打和杀死他们……到处都燃起了熊熊烈火，他又想去扑灭，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闵采尔倡导的农民改革的革命路线与路

德的改革路线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诸侯插手时，他们双方变得敌对起来。路德反对农民战争，而许多农民把他的行为看成是一种背叛，一种对信仰与福音的背叛，人民对他很失望。

托马斯·闵采尔信仰福音，信仰上帝，非但坚决要求人民也相信这些，而且要求他们与上帝的敌人诸侯作斗争，为新天国去奋斗。农民起义在他的推动下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几乎遍及了整个德意志。

在图林根地区，人们把闵采尔奉为领袖，着手贯彻他的思想。但是，农民的狭隘性及市民阶级的局限性使各地未能统一起来，而且市民温和派的代表普法伊费尔公开与闵采尔作对，"永久市政会"中很多成员站在普法伊费尔一边。闵采尔的计划在米尔豪森实施不了。

属于温和派及一切自私自利的农民，他们要与诸侯和平，但闵采尔率军赶到弗兰肯豪森，准备与诸侯决战。诸侯也把大批军队开往那里，准备消灭这支暴乱军队。

黑森的菲利普侯爵，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及选帝侯等诸侯率大军困住了弗兰肯豪森。闵采尔率8000农民军进行抗击。由于诸侯的

猛烈攻击及农民军中一部分人的妥协，弗兰肯豪森不久就失守了，闵采尔被捕就义。

他坦率地对诸侯承认："发动起义是为了基督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是为了杀死那些不信福音与上帝的人。"

闵采尔死后，阿尔施泰特人民依然坚持他倡导的社会改革，直至1533年才结束。

路德对此十分高兴，也十分悲凉，他说："闵采尔死了，但他的精神还没有消灭。"

诸侯抓住了闵采尔之时，路德心中感到一阵快意，于是写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和上帝的法庭对托马斯·闵采尔的判决，上帝在法庭上公开惩罚和谴责这类妖精的欺骗行动》，告诫农民放下武器，处死闵采尔就是他们造反的榜样。

路德十分清楚闵采尔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尤其在穷苦人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必须根除自己改革道路上的障碍，于是他又写了一篇《就拙劣的小册子致农民书》。书中极力污辱闵采尔，对他领导起义表示极大的愤慨。说他欺骗了人民，违反了上帝的意愿。

路德，他首先倡导了宗教改革，并在运动

开始时领导了这一革命，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代言人、宗教改革的领袖。这时，宗教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普遍兴起，人民在运动中受了教育。

但时势的发展又为路德所不容，他不过是并不太发达的新兴资产阶级（市民）的代表，市民这时的力量还不足领导这一时代，不能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的彻底斗争。他们有斗争的愿望，对封建诸侯十分不满，但又没有政治、经济实力与之相抗。他们要统一国家与市场，却又怯于诸侯与罗马的压力。最后，终于投入诸侯的怀抱，成了自己事业的叛徒，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路德的路线是一条较温和的路线，在农民大革命来临之时，他突然会倾斜，这是历史的必然。之所以如此，路德个人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闵采尔的路线是超时代的，它遭到了路德的攻击，又不为时代所接受。最后失败了。

德意志农民战争失败后，路德依然按自己的观点进行宗教改革，罗马教会仍然是他的敌人。人文主义者退出了改革派，平民革命派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1525 年 7 月 23 日，当托马斯·闵采尔及其信徒纷纷倒在血泊之中的时候，马丁·路德却做了一件令罗马大为震惊的事——他与一位逃亡修女卡塔琳娜结婚了。

卡塔琳娜·冯·博拉，是格里马附近的尼布申寺院的尼姑。在宗教改革风波正高的时候，这个寺院有 9 个大胆的姑娘也想逃离寺院，去过尘世生活。

她们来到了路德所在地维滕贝格。在那里有人将他介绍给马丁·路德。而路德又是一个不反对神甫结婚的人，甚至提倡过神甫结婚。路德在美因茨大主教的支持下，决定于 1525 年 7 月 23 日与卡塔琳娜结婚。

路德是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僧侣，卡塔琳娜则是一个逃亡的修女，二人结成夫妇，真是天生一对。婚礼不是在教堂举行，而是在他的住处，由布根哈根主持。向路德庆贺的人不多，

只有他在维滕贝格的几位朋友赶来了。

路德的婚礼贺礼只有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寄来50古尔登，维滕贝格市政会送来一吨艾因贝克啤酒，大学派人送来一个银质的大酒杯。路德的婚礼就这样举行了。

路德的结婚给罗马带来了极大震动。罗马教廷十分愤恨，他们污侮路德夫妇说，当时卡塔琳娜已经怀孕，他们二人不得不结婚。而且路德的许多朋友也抱怨说不该结婚。

路德此举，是他作为一个僧侣走向市民生活的第一步。其后，大部分僧侣竞相仿效他，纷纷结婚。

农民战争结束以后，路德的宗教改革派与罗马天主教派矛盾日益尖锐。但作为世俗诸侯的德意志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既没有执行早已颁布的沃尔姆斯敕令，也没有任何收回的迹象。世俗诸侯对路德派的改革是支持的，它符合世俗诸侯的利益。

在闵采尔领导农民军同诸侯作战时，不论是天主教派的诸侯，还是路德教派的贵族，他们都能结合在一起，全力以赴地镇压闵采尔的农民军。但现在农民军失败了，罗马天主教派

的诸侯均知道路德派成了他们的共同敌人，但又碍于萨克森选侯国对他的保护。于是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与美因茨的阿尔布雷希特等天主教的诸侯在德绍结成反路德异教派的联盟。他们认为，必须铲除异教，必要时不惜象镇压闵采尔一样镇压路德派，而且他们的结盟使自己的力量显然大于萨克森选侯国。

萨克森选侯国看到事态严重，就同黑森方面在托尔高结成联盟。随后又拉不伦瑞克、安哈尔特、曼斯费尔德以及奥尔登公爵领地普鲁士，他们属于路德教派的诸侯。

两大集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由查理五世从中调节，于1526年在施派尔举行的帝国会议。两方开始争吵。持路德教派观点的诸侯坚决反对铲除路德的改革，因为他们要借改革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天主教派诸侯力主消灭路德的宗教改革，查理五世也站在这一边。

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裴迪南大公突然提出一份正在西班牙的查理五世的保留信件，要求执行沃尔姆斯敕令，拒绝帝国议会作出任何宗教问题及信仰上的决定。

这时，国际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

化。利奥十世曾支持查理五世与法国作战。但随着德意志的胜利，查理五世开始对罗马有权力要求使教皇克雷芒七世大为愤怒，他于是同法国、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组成联盟，共同反对查理五世。查理五世由于失去教皇的支持，遂取消他原来的打算，不愿再处罚路德，并要求教皇召开一次他极不情愿的宗教会议来决定路德问题。

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施派尔帝国议会的结局。最后，会议决定：

“在宗教问题和沃尔姆斯敕令问题上，每个等级在宗教会议之前的生活、治理和行动应以对上帝和皇帝负责为准则。”

施派尔会议的决定把两派斗争的尖锐缓和了一点，并将他们的最后冲突推迟了。路德派贵族乘机扩大他的实力，并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内发展一种不同于罗马天主教的新教：国教。

萨克森选帝侯很快就大力发展新的教会制度，普遍视察学校和教会。1525 年底，路德给选帝侯约翰写了一封信，诉说了选帝侯领地内神甫和学校的条件很差，要求尽快没收天主

教会的财产，以便维持新的国教机构。选帝侯授受了他的建议。打击旧的罗马天主教会是这些诸侯所共同愿意的。旧的天主教对世俗诸侯的权力构成的威胁使他们不快，对他们的统治领地内的人民制造种种障碍。罗马天主教就象这些诸侯的太上皇一般，诸侯们必须按罗马的旨意行事，否则，罗马会动员众多的基督教国家同他们为难。

诸侯们创立新的国教，目的是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束缚，壮大自己的实力。在主观上，诸侯的实力确实加强了，但这一实力的加强正是德意志民族独立与统一的前奏和必经阶段。

路德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与布林哈根一起撰写了《萨克森选侯国视察员给神甫先生所授课程》一文。路德在此文中规定了国教的方针，视察员以此为据深入教会，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

到 1529 年的时候，萨克森选帝侯国内各信徒团体都进驻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检查神甫的思想及登记教会财产。国教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萨克森选侯国对教会的财产是依据路德的建议，通过还俗办法完成的。从这时起，所得的收入用于教师、神甫的薪水和救济穷人，用于大学和中小学的教育事业。

路德改革计划的基本点完成了。但是，他的改革是依靠诸侯的支持完成的，他放弃了早期改革计划中的另一条原则，即信徒团体的主权。路德完全抛弃了人民，走的是诸侯所操纵的道路。

黑森公爵不久以后也实行萨克森选侯国的方法，1527 年在马尔堡建立了第一所福音新教大学。他们根据路德的建议，德国教团领地把这个教团国家变成一个世俗公爵领地，转向了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并从属于波兰的国王。

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国教成为诸侯加强主权的一种手段。国教以诸侯官员为支柱，可以用来给他们谋福利。诸侯国的首脑同时也是国教的首脑。

路德的宗教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久以后，他又陷入了另一场论争之中，即与人文主义者的论争。路德以投入诸侯的怀抱为代

价，进行了宗教改革，可人文主义者虽也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但他们不想与之分裂，最后终于又回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温暖的怀抱中去了。

路德与人文主义之间再也不会有任何和解的可能了。人文主义者正在向改良的相反方向发展。人文主义者希望改革旧的教会，而路德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已经破裂，他要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人文主义者的全部经济基础即在罗马，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宿。

路德在这一改革时期的另一个敌人是再洗礼派。

1527年，埃尔富特发生了一次由汉斯·勒默尔领导的袭击诸侯的事件。他的信徒及他本人都是托马斯·闵采尔的信徒，他们要重整旗鼓，为他们的先知闵采尔报仇。

汉斯·勒默尔是进攻埃尔富特的运动领袖。农民战争失败后，他继承了闵采尔的遗志，宣传财产公有及社会平等思想。

但是，再洗礼派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汉斯·勒默尔也失踪了。

在反对再洗礼派的斗争中，路德教派又一

次同罗马天主教派联合起来。路德主张迫害再洗礼派的信徒，因为他们“亵渎和破坏了上帝的制度”，而且主张不要政府。路德十分反对一切不要政府的教派或个人的思想，因为路德本人正在政府的大门中乞求政府的帮助而去完成他的改革呢！

路德这段时间的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的思想基本在改革中得以体现。这给市民阶级、封建诸侯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路德教派是他们抵抗罗马天主教会的有力武器。他们势力的强大，有利于德意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他们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障碍——罗马天主教的封建统治从德意志赶了出去，代之以路德教派。诸侯们在新教中依然是首脑。于是，新教成了他们加强力量、反抗罗马的有力武器和一个精神力量。

但是，这一时期路德的宗教改革完全背离了下层人民，它的受益者只是上层市民及贵族诸侯。上层市民从中得到了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某些条件，使得他们极为满意；诸侯因路德教派的改革而加强了实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权力，而且将自己也

冠以新教首领的帽子。

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受益最少或者说在改革中基本处于被抛弃地位的是下层人民。路德不仅抛弃了他们，而且对他们的改革要求严加镇压，镇压再洗礼派就是事实。闵采尔的改革路线在德意志失败了。

路德投靠诸侯进行宗教改革，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与退步性，但以当时德意志的阶级状况来看，市民阶级不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有力量的阶级。虽然他们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为代表者，但由于力量薄弱而依附诸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良，而不是大规模的直接冲突。

这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路德的个人品格问题。

路德仍不愧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路德倡导并领导了宗教改革运动，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少诸侯支持他的改革，并在他们的领地内实施了路德的改革计划。而那些天主教诸侯与罗马天主教会对路德新教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与反改革斗争开始了。

路德在萨克森选帝侯、黑森侯爵及许多新教诸侯的支持下，逐步实施他的改革计划，这给新教诸侯及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他的改革又给以罗马天主教的代表的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愤怒，继续向路德教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双方的冲突早在1526年的施派尔的帝国议会上就已显现出来，但由于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的矛盾而不了了之。时隔两年，双方之间的矛盾又一次激化。以帕克冲突为起点的斗争开始了。

冲突是由格奥尔格公爵的秘书奥托·冯·帕克挑起的，他可能想成为人们注目的中

心，此外他绝无理由为这件事奔波。他突然出现在路德教派强有力支持者黑森菲利普侯爵的宫庭里，并告诉侯爵，天主教派的首脑格奥尔格公爵、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和勃兰登堡的约阿希姆选帝侯于 1527 年 5 月 27 日在布雷斯劳会晤，结成了反对改革国家的进攻性联盟。帕克为了证明情报的准确性，拿出一张伪造的契约给黑森侯爵看。

帕克所说的消息对侯爵来说无疑是一枚炸弹，他立即开始行动。他马上派人通知路德教派的第一实力人物萨克森选帝侯约翰说，天主教派要对路德教派采取行动了。菲利普侯爵同法国、西本比尔根和丹麦谈判，想建立一个反天主教派的联盟。1528 年 5 月 8 日，萨克森选帝侯与黑森侯爵首先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反新教联盟。

但是，帕克的谎言不久以后便被拆穿了，但路德教派的准备并没有白费。菲利普侯爵招募的 14000 名步兵、4000 名骑兵威胁着与他毗邻的宗教诸侯国美因茨、班贝格与维尔茨堡。

由于帕克而制造的冲突虽然没有发展成

为战争，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初见端倪。在1529年施派尔帝国议会上，这种矛盾更为突出。

查理五世于3年前的施派尔帝国议会上因与罗马教皇的矛盾而没有坚持惩罚路德，采取了妥协的态度。现在，他坚持要求执行沃尔姆斯敕令，禁止“任何朝不正确方向的引诱”。天主教派支持他的决定。

但是，以萨克森选帝侯、黑森侯爵为首的路德教派包括安哈尔特、勃兰登堡、不伦瑞克—吕内堡及14个城市则声明：决议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他们将拒不执行这一决定。天主教派的诸侯依靠人数多而在施派尔会议强行通过决议，即执行沃尔姆斯敕令，使得两派的关系愈加紧张起来。

在这种不利于路德教派的情况下，只有他们这一派中自己联合起来，壮大力量，才有可能获胜。而新教中上德意志与瑞士不属于路德教派，反而与路德在许多宗教问题上争论不休。他们代表正在上升中的德意志市民阶级，较有觉悟，正在迅速地建立起反罗马的宗教改革中心。

上德意志与瑞士的改革与路德的改革虽都反对罗马天主教会，但他们非但不向诸侯靠近，反而反对诸侯。瑞士苏黎世大明斯特尔的神甫胡尔德里希·茨温利和上德意志的前多米尼克斯修士会僧侣马丁·布策尔是这两个地区改革的代表，他们与路德存在着分歧。

宗教改革家与世俗政治家不同，他们只讲究自己的观点与思想合乎理性、纯而又纯，至于实用及对改革的成败预见并不如世俗政治家。黑森侯爵认为必须将瑞士、上德意志及路德教派联合在一起。于是，他把瑞士派和上德意志派邀请到拉恩河畔的马尔堡，并向路德提出了邀请。时间为1529年秋天。

1529年9月，瑞士派与上德意志的代表团比路德提前来到马尔堡，随后路德也到了。茨温利和布策尔也到了。两派首先在参加会议人员资格上做了决定，“会谈对诸侯、官员、贵族、使者及著名学者，尤其是马尔堡、维滕贝格等地高等学府的学者公开，但不是对所有的人公开。”这是路德的提议，显然他把普通人民排除在外了。

尽管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毕竟有共

同的语言，都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经过共同协商，将一致的意见写成14条。但马尔堡会谈毕竟连同黑森侯爵的宏伟计划一同失败了，双方有许多问题不能统一，最主要的是有关圣餐的问题。

圣餐问题的争论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他们真正的差异就在于茨温利代表市民共和改革派，他们要借助这一派别来加强市民阶级的阶级地位，而路德却要依靠诸侯来进行改革，两派的矛盾无法调和。

最后，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罗马天主教派，马尔堡会议作出决定：

"全体友好相处，热爱和平，坚决杜绝不愉快的事发生，并各自克制，绝不以措辞严厉的文章互相攻击。"

这样，马尔堡会谈总算有了一点成绩。

1529年底，路德与时其人一样，开始注意土耳其人的动向。现在这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建立于14世纪初曼斯曼苏丹加齐之手，不久以后即占领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打败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波斯人。随后，他们又击败了波兰，从其

手中夺去了摩尔达维亚。继而，他们又占领了叙利亚和埃及。奥斯曼土耳其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这时又将眼光放在德国、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上，准备向欧洲腹地深入。罗马准备召集信徒对这个异教之地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但由于信徒们已不再相信罗马，不愿捐钱，而不得不放弃东征。

1528 年 9 月，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苏莱曼率领全部精锐部队进攻奥地利，不久即攻至维也纳城下。他向维也纳人提出：交出维也纳，可以宽容处置这个城市及市民，否则将要攻进城去。

维也纳有很好的防御工事，虽然城墙破损，但每一个可坚守的地方都有很多大炮、加农炮以及小炮，构成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土耳其人数次进攻均被炮火击退。

维也纳城同时向其他各诸侯国求援。天主教派与新教教派互相指责对方拖延防御，互相争吵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兵援助维也纳。

经过屡次失败，苏莱曼，这个高傲的、常胜苏丹，终于在 1529 年 10 月 15 日撤去了围

城部队，他不敢将大军拖延在维也纳城下，城中人的英勇反抗与基督教大军将至的消息使他明智地选择了撤军，而不是顾及他的名声在维也纳城下蛮干。

路德清楚看到了土耳其人的凶狠进攻，他写了《论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与《在军队中进行反对土耳其的讲道》，号召人民反击土耳其人的进攻。同时，他也反对诸侯们在对土耳其战争中拖拖拉拉，不是积极作战。

土耳其人走后，路德新教与天主教派的矛盾又提上日程，双方于1530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上又进行了一轮争斗。

1530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开始筹备时，路德即应邀去了那里。但路德走到萨克森选侯国的最南端科堡时，就不敢再往前走了。新教诸侯的势力弱于天主教派诸侯，在帝国议会的争论也不会取得什么胜利，而双方的争论肯定也会把路德问题提出来。路德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未知数。选帝侯也劝他不要去奥格斯堡。

路德在科堡孤独地呆了好几个月，他没有什么事可做，只好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写了

《翻译书简》一书。这段时间他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即整理了伊索寓言，并写了关于这些寓言的文章。

路德在堡内还研究了德意志的形势，认为新教在奥格斯堡会处于劣势，查理五世通过姑母与弗兰茨一世（法王）母亲的调解，与法国签订了和约；他也与教皇达成和解。他向教皇宣誓，要当好教会的世俗护卫者，把他在施派尔没有做到的事在奥格斯堡完成。

果然不出路德所料。开会第一天，皇帝就下令给新教诸侯，停止他们的宗教改革。新教诸侯拒绝这项命令，并且以不参加圣体节的游行来表达他们的抗议与不满。

帝国会议主要讨论了信仰一致问题、土耳其问题。在土耳其问题上他们并未有多大的分歧，不久便取得了一致。但关于信仰一致问题，始终不能统一。

天主教派的诸侯决心利用他们的优势，迫使新教诸侯屈服。

但新教诸侯不甘心屈服，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他们于1530年6月25日宣读了由梅兰克通起草的《奥格斯堡自由》，这是一本福音

新教的信条。它既没有提及罗马天主教的神权，也没有提及与上德意志及瑞士新教观点上的分歧，而是诚恳地表示要与罗马达成谅解。

路德十分赞颂梅兰克通这篇文章，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自白书。不过，新教与罗马天主教派的冲突已经不可调和，首先是施特拉斯堡、林道、梅明根及康斯坦茨四城提交所谓的《四城市自白》，反对《奥格斯堡自白》，随后查理五世命埃克·科赫洛伊斯和法贝尔起草反驳梅兰克通的文章，并于1530年8月3日发表。

两派本无共同点，但想寻求和解，结果却使矛盾更加明朗了。查理五世的口气愈加强硬，他宣布：新教必须屈服，否则他就号召诸侯来反对他们。但新教诸侯的反抗却比上一次更坚决了。

至8月16日，双方再一次寻求解决办法，组成了由双方阵营14名诸侯、神学家和法家参加的委员会，企图通过它来达成一个协议。他们又一次失败了。

路德与自白书的起草人梅兰克通不同。路德坚持不向天主教诸侯退让，他说：

“……你们想使教皇与路德联合。但是教皇不会愿意，路德也拒绝。如果你们能违背双方意愿做成此事，那我则当效仿你们，使基督与彼列和解。”

新教诸侯虽然力量不如天主教派诸侯，但他们的坚决态度也使天主教派诸侯一筹莫展。查理提出：要召开一次宗教会议结束一切争论，而在宗教会议召来之前新教派皈依原来的信仰。结果又一次遭到新教派诸侯的顽强反抗。

天主教派在相持不下之时，下决心击败新教派，通过帝国议会决议：沃尔姆斯敕令必须生效；禁止一切宗教改革思想宣传与改革活动；严格制止没收寺院财产的罪恶行径；必须恢复旧教会。

但时间已是 11 月 19 日了。

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终于结束了，新旧两派在会上均未取得任何进展，最后只是旧教向新教发出了挑战而已。

罗马天主教会在这次帝国议会之后，也好象注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号召世界各地信仰基督教的诸侯团结一致，消灭反罗马的新教。但

这场反改革的运动根本与宗教改革运动抗衡不了，始终形成不了人民运动，因为这运动本身就是反人民的。

新教诸侯对帝国议会的决议以及罗马的反应十分明显，约翰选帝侯说：

“必须建立一个可以对抗决议的新教诸侯和城市的联盟。”

约翰于1530年12月22日邀请新教各个等级、各个地区的代表在图林根的施马尔卡尔登召开会议，萨克森选侯国、黑森、曼斯费尔德、不伦瑞克—吕内堡、不伦瑞克—格鲁本哈根、不来梅、安哈尔特—贝恩堡、马格德堡等城市在这里结成联盟，1531年又有许多城市及侯国加入。

联盟对帝国议会的决议发表了抗议性宣言：如果任何成员因没收教会的财产而被按帝国议会决议规定押送去皇家最高法院的话，其他成员应尽一切力量声援。联盟由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和黑森侯爵菲利普领导。

路德看到反罗马的阵营逐渐壮大，十分高兴，写了一篇《就反对奥格斯堡帝国决议告诫帝国亲爱的德意志人》，他提出：如果皇帝破

坏宪法，人们就有权进行抵抗。

正当新教诸侯准备与天主教派大战一场的时候，德意志边界上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且由苏丹苏莱曼亲自率领。为了抵抗共同的敌人，双方约定：共同反对土耳其，双方在宗教会议以前就宗教信仰问题保持和平。

1532年8月3日，查理五世发布《纽伦堡宗教和约》，以皇帝敕令形式规定双方在宗教会议之前，不得互相谩骂攻击。并且，皇家最高法院停止了对新教的一切审理。

德国的信仰战争又一次推迟了，它是以天主教派的退让而推迟的。天主教派首次放弃了对“异端派”的敌对态度，尽管这一转变中有勉强的成分。

为了打败罗马天主教在德意志的统治，路德，一个伟大的德意志老人，在他的余生里奋斗、奋斗。

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结成以后，新教势力逐渐壮大，德意志的宗教改革也一步步地加深、扩展。

1539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这个天主教派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终于死去了。他的死，使天主教在阿尔布雷希特的萨克森也随之寿终正寝了。因为他的继承人海因里希信仰新教，他继位后不久便对阿尔布雷希特萨克森进行了一次教会大视察。于是，罗马天主教在德意志一个最坚强的堡垒也被攻破了。

1536年春，上德意志各城市的代表在布策尔的带领下来到维滕贝格，与路德进行谈判。经过双方的努力，得以使双方找到了共同的方案，达成了团结性的协议。

至1536年5月29日，维滕贝格人与上德意志签署了所谓的维滕贝格协议，他们之间的神学争论宣告结束。对于他们原来的分歧采取了妥协态度，如他们采取了共同的圣餐形式。虽然这一协议在两地均有人不满，但反对罗马天主的共同利益使他迅速地接受了这一团结性的条款。

由于宗教会议的召开已成定局，教皇保罗三世派使节维格利奥来到维滕贝格。他将与德意志的诸侯们商谈参加宗教会议的事宜。其中，他也表示愿意与反罗马的萨克森选帝侯商

谈。他来到维滕贝格后，邀请路德吃饭。路德在布根哈根的陪同下来到教皇使节所住的宫殿。二人进行了长谈，路德给维格利奥的印象是疯狂的人。

1537年5月教皇保罗三世在曼图亚召开宗教会议。不过，这次宗教会议并不是如新教要求的那样。他们曾一再要求应由世俗政权召开，而不应是教皇政权来主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宗教会议早已定下了方针：清除瘟疫般的路德异端。

新教派极力反对罗马教皇的建议。此时，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已经去世，由他的儿子约翰·腓特烈接任，他仍然坚持宗教改革。他建议，在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保护下，新教各派在奥格斯堡召开一次反宗教会议。这个建议虽然没有得到其他新教诸侯的响应，但他们却一致表示，共同抵制这次曼图亚宗教会议。

路德对罗马教皇的行为极为愤慨，他说，他坚决支持萨克森选帝侯及各新教诸侯，要为福音新教而斗争。

这时，在1536年的一次修士会议上，反罗马的新教诸侯通过决议，不参加1537年的

宗教会议。路德也参加了这次修士大会。他此次是带病参加会议，并为会议起草了“施马尔卡尔登条款”。

路德写这一条款是受选帝侯约翰·腓特烈的委托。罗马天主教已经向他们提出了挑战，他们必须给予有力的还击，而在上帝面前可与罗马的神学家们一决高下的只有路德。路德在条款中再次重申了他的改革思想，他对圣经、上帝、教皇及教皇的弥撒和罗马教廷的看法。他并且声明，他只能根据信仰做出判断，决不会因各方面的压力而屈服。

路德的条款虽然攻击了罗马天主教，但却违背了不久前与上德意志在圣餐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因而触怒了德意志人，他们不在施马尔卡尔登条款上签字。许多诸侯为此而惋惜，他们极力达成的团结又出现了危机。

1537年初，为了促使新教诸侯参加曼图亚宗教会议，保罗三世派使者来到施马尔卡尔登劝说众诸侯，但遭到新教诸侯的强烈反对。

查理五世此时已不再承认纽伦堡宗教和约，宣布宗教事务仍由皇家最高法院来判决。新教诸侯则针锋相对，他们将施马尔卡尔登联

盟期延长了10年。

到1539年，查理五世又一次对新教诸侯让步了。原因与上次一样，土耳其人又出现帝国边界。他颁布了法兰克福和平方案，修改了纽伦堡宗教和约，想缓和与新教的矛盾。他要求双方在宗教会议前或民族宗教会议在德国举行前，或者在帝国议会做出决定前，双方要维持现状。

但是，新旧两派并未维持多久的和平，这一点在黑森侯爵的重婚事件发生后便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黑森侯爵想要第二个夫人。他看中了王室小姐玛格丽特·冯·萨勒。但他知道路德会反对此事，于是写信给他征求意见。路德写信同意他这么做，但要求他必须保守秘密，因为这方面既没有法律，更无普遍有效的准则可以遵循，在这件事情上只是有特许。

但此事不久以后便泄露了。按黑森侯爵宣布过的查理五世的死刑法，重婚罪要严加惩处。查理五世借此威胁菲利普，要他阻止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与法国签订任何条约。

菲利普说服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在查理

五世与法国作战中支持了查理五世，这样一来，它们的盟友法国被击败后帮助查理五世开始攻击新教。

路德为曾支持黑森侯爵的重婚而苦恼，使新教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新旧两教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争斗，此消彼长。旧教虽然强大，却始终不能压制住新教诸侯。

自 1542 年开始，路德给大学生们讲授《创世纪》，但他那时身体极弱，而且多病，疾病经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

由于年老多病，他变得十分敏感。当他认为维滕贝格的大学生们生活已经放荡不堪时，他坚决要求离开这个污秽的地方。选帝侯好容易才他将留下来。

选帝侯约翰·腓特烈请路德写一篇回答教皇保罗三世邀请他们参加特兰特宗教会议的文章，题为《反对由魔鬼创立的罗马教廷》。

1546 年 1 月 23 日，曼斯费尔德伯爵邀请路德去调解一件纠纷。

路德此时已十分虚弱，病情一天天地加重。

2月16日，他已只能躺在床上，医生也只是摇头。

2月17日，大家一致感到，路德快要死了。

1546年2月18日夜里2时3刻，艾斯勒本丧钟长鸣，路德死了！

这位出生在艾斯勒本的伟大人物，又在艾斯勒本死去了。他死后，维滕贝格、托尔高、哈雷、莱比锡等城市都为他鸣了丧钟，表示对他的尊敬。

路德的灵柩被安葬在维滕贝格，一队庄严的骑兵将他的灵柩从艾斯勒本护送到维滕贝格。

梅兰克通为路德致了悼词，他说，路德是一手持剑，一手建设，这位病态时代的医生尽管很暴躁，但却有一颗非常善良、毫不虚假的心。

路德死了，但他倡导的宗教运动正在兴起、发展。他的思想早已铭刻在德意志人民的心中。

恩格斯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

路德就是这些巨人之一，闵采尔也是这些巨人之一。

路德深深地扎根于他的时代、他的阶级之中。他创造了一种符合社会需要的神学，并以此推动了强大的力量——市民的改革愿望和革命要求，并把它变成了实际行动。

路德的一生，主要是同旧的罗马天主教会斗争、建立新教会的一生，他以其丰富的思想与当代最权威的精神领袖天主教会顽强地搏斗，提出了以"因信称义"为中心的宗教改革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全部著作。

"因信称义"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信条"因行称义"是相对立的。他的这一学说不是他凭空苦想而来，而是时代的精神在呼唤着他，现实的斗争启发他创造新的斗争武器。他以"因信称义"为武器，向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基础发起了冲击，喊出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解放的震天吼声。

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在其《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得以系统的阐述。其主要意义是推翻基督教的"因行称义"一说。他认为"信"有三种能力，只有它才能影响人的灵魂。其一，信可以领受上帝的道。灵魂只有靠信才能领受上帝的道，才能得救。其二，信可以获得上帝的荣耀。我们尊崇上帝，上帝也就荣耀我们。我们会因对上帝的信而使上帝给予我们以义。其三，依靠信可以使心灵与基督结合，使心灵接受基督的恩典。

马丁·路德说：

"我们对基督的信并不是叫我们脱离行为，只是教我们脱离行为的谬见，就是脱离以为称义必靠行为的谬见。"

信是因，善行是果，先有信，而后才有善

行。在信的前提下，行善还可以使上帝愉悦。善行是以上帝为榜样，施恩于别人，是上帝的爱的流露。

他认为，人的得救是他个人的事。一切外在的东西，如宗教礼仪、宗教法律以主许多神职人员均是多余的，人的得救不需要这些中介。在人和上帝进行交流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得插足其间，僧侣也不行。

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完全否定了罗马天主教会以及教皇的权威地位，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罗马天主教。

他对教会的定义是：

“教会的本质、生命和性质并不是一个有形的集会，乃是在同一信仰里有形的集会。”

他否认教会是属灵的合一，而认为它只是外表的合一，有形的合一。他依据因信称义说，指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是信徒对基督的内心信仰。罗马天主教会不是真正的教会，因而是否服从罗马教会的命令不是衡量基督徒的唯一标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在这里已荡然无存。

马丁·路德不仅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同

时也否认了罗马教皇的权威，不承认教皇的地位与权力。他只承认基督才是基督教在地上唯一的头。

路德为了唤起沉睡的德意志，愤怒地揭露了罗马天主教在德国贪婪的掠夺。“亲爱的德意志人，让我们醒起吧！怕上帝不怕人。”他把天主教在德意志的罪状一条条地列给人民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中世纪的教士是信徒中的特权阶层，路德用因信称义引出了教徒皆是平等的，教士阶层的特权是不存在的结论。他说，在上帝面前，一切信徒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得因其地位而有所不同。

罗马天主教会的礼法中有七礼，马丁·路德只承认其中的洗礼和圣餐礼，而其余五种（坚信礼、婚礼、认罪礼、敷油礼、封立礼）在圣经中找不到根据，应予以废除这些教会强加给信徒的束缚。

马丁·路德的革命学说是与封建思想根本对立的新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愿望，他们要求打碎阻拦资产阶级前进路上的一切封建障碍。路德的

思想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要求。

马丁·路德提出：

“灵魂得救不因任何行为，仅由于信仰。”

这一观点对封建社会的欧洲冲击很大，封建社会中人的思想信仰根本无自由。而他要求僧侣与信徒平等的思想，也是对封建等级制的一种否定、一种抗争，是资产阶级“平等”口号提出的先驱者。

马丁·路德不仅攻击罗马天主教会，而且提出了新教学理论，建立了新教神学。新教神学认为：信徒信仰基督、上帝并不是慑于对来世惩罚的恐惧，而是甘心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不是威严的执法官，而是仁慈的天父；只要你具有真诚的对上帝的信仰，而且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违背信仰，那就勇敢地去做，上帝也一定保佑你做好。新教神学是资产阶级用以抗击罗马封建天主教的有力武器。

路德的新神学是资产阶级用神学语言表达他们要求的一种方式，其矛头直指罗马教皇和教廷。马丁·路德则是身体力行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尽管路德的思想与改革运动给封建统治

以巨大的打击，但又不可能不蒙上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马丁·路德是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阶级并不具备与封建势力决战的实力与准备，于是他们只反对僧侣的封建主义，而又不反对世俗的封建主义。他们害怕人民革命，更显示了其改革的局限与阶级的本质。在农民战争中，他们与世俗封建主、罗马天主教联合在一起攻击人民革命，说明他们与人民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他们的改革也仅限于上层。

路德的改革不仅不反对世俗封建主，而且依靠世俗封建主。萨克森选帝侯一直是他的保护人。他的改革在诸侯们的支持下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不仅建立在反罗马的基础之上，而且也是建立在德意志人民的鲜血之上。

路德以改革宗教的形式向以罗马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发起挑战，但他不会代之以理性、以人的思想为中心，而仅只是以神学代替神学，这是时代的局限，是超越不了的。马克思说：

“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

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人的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马丁·路德不是打碎旧的罗马教会，而仅是给它涂上一层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油膝。这是他宗教改革的实质所在。

马丁·路德与他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并称为16世纪西欧反封建斗争的两朵并蒂的思想之花。

这个时代另一位巨人是托马斯·闵采尔，他领导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提出了另一条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人民革命之路。路德是剥削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闵采尔则是农民、平民中最优秀的代表。

16世纪初，德意志面临统一民族国家的重大抉择。这时，德国虽然仍是封建为主的国家，但其经济发展及资本主义水平绝不在15世纪已完成民族统一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家之下。形成中的德国资产阶级代表马丁·路德首先发难，把矛头对准了封建社会的世界代表

——天主教会，为争取德国的民族独立而呼号。路德的反罗马教会运动使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

但先进的德国人发现：仅反罗马天主教会，而不反对分裂割据的主要代表诸侯势力，反抗手段也仅只是语言，武力不许采用，这样的运动不会使德国统一。于是就有了胡登与济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但终于也失败了。

这时，德国人民的优秀代表——托马斯·闵采尔认识到：只有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德意志才会统一。

托马斯·闵采尔有比他同时代更为高尚的理想。他不但主张当时的德国，而且认为统一后的德国不应再有皇帝、诸侯，而是普通人掌权的共和国。他不仅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且要求消灭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剥削。总之，他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行财产公有，按需分配。

路德只反对罗马教会、教皇，不反对世俗诸侯。托马斯·闵采尔却坚决要求消灭封建社会的另一半——世俗诸侯。路德神化贵族诸侯政权，闵采尔却尖锐地指出："诸侯的政权不

是来自上帝，他们是魔鬼的同伙，他们的主子是撒旦。推翻这个妖怪——才真正是符合上帝意志的事业。”

在托马斯·闵采尔的社会理想中，人人平等、消灭剥削成为其显著的特征。他的这一思想，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他不是号召人民回到过去，而是提倡平均主义。闵采尔的理想不是偶然的，是平民中无产阶级萌芽的利益的反映。

闵采尔的理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并未成熟的时候凭他自己的智慧而创造出来的。他的理想与莫尔、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共同之处，他们的理论均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他们都还预见不到共产主义需要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只是幻想以“大震荡”形式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闵采尔比同时代的许多人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更有革命的实践精神。闵采尔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准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闵采尔却跨越了这个时代去寻求社会发展之路，使他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越发地遥远。他超出了当时的物质条件与大多数农民

的直接要求，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他的实践必然失败。

闵采尔的远大理想及他领导的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们对封建社会的猛烈攻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必需。它是用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即平民方式进行消灭封建制度的一次伟大尝试。所以，德国农民战争不能算作一次纯粹的农民战争。

正因为他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时代，所以时代没有认识他，时代误解了他，许多人嘲笑他、轻视他。但他们高估了自己，忽略这样一个真理：凡是有充满生机的东西能够继续在世界发生作用。闵采尔的思想在几个世纪后，获得了极大的荣誉，他自己也获得了很多信徒。

闵采尔的思想在几个世纪后已有很多付诸实现，带来了民族的强大与繁荣。如今世界上对宗教和政治起作用的很多因素，都可以追溯到闵采尔身上。

托马斯·闵采尔，不仅是农民战争的领袖，而且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